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
北京大学港澳台办公室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fice for Hong Kong, Macao & Taiwan Affairs
Peking University

www.oir.pku.edu.cn



独家策划

P34

科菲·安南

改革者眼中的战争与和平

P20 一个品牌暑期项目
的十年征程

P49 ANU:聚焦亚洲，聚焦中国
——专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伊恩·杨

P87 东国公主与蚕种西传：
一个丝绸之路上的传说

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介绍

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Stanford Center at Peking University）坐落于北京大学未名湖北岸的朗润园，是斯坦福大学在北大设立的教育研究中心，也是斯坦福师生在中国执行研究、教育项目的基地。中心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举行揭牌仪式，是美国大学第一次在中国重点大学校园内建立的实体建筑。

作为北大和斯坦福协同创新的新平台，中心致力于整合两校现有的合作资源，将继续开展学生实习、学者访问、学生交换等合作项目，并进一步为斯坦福大学与北大及中国其他高校提供深入交流、资源共享的机会，以期成为中美人文交流的新桥梁和新纽带。

中心面积 3350 平方米，采用传统中式建筑样式，结合西式建筑的特点，室内横梁上装饰着中式传统风景画及斯坦福校园风景，同时在地下两层设有一流的教学设施，现代化的教室、办公室及会议室等，折射出中心中西合璧的独特风格。



2014 年 3 月 22 日，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发表演讲

本刊声明

《合作与交流》所有内容,未经许可,
禁止以任何方式复制、改变、摘编、转载和传播。

主 办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
北京大学港澳台办公室

编委会主任

夏红卫

编委会

夏红卫 严 军 郑如青
王 勇 李洪权 康 涛

执行主编

韩 笑

执行副主编

陈 娟 刘 东

编 辑

李晨希 冯子涵 刘世琪 艾新雅
张伊妍 张金金 叶陈宁 林雨晨

美 编

易格设计

电 话

010-62759098

传 真

010-62751240

电子邮件

hanxiao@pku.edu.cn

网 站

<http://www.oir.pku.edu.cn>

上期 | 内容提要



奏响新的时代序曲 ——北大留学生教育工作专题

为落实全国留学工作会议精神,推动《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的实施,继续改革北大留学生工作,2015年1月10日上午,北京大学在中关新园科学报告厅召开留学生工作战略研讨会,时任校长王恩哥院士出席并讲话。

北京大学是新中国最早开展留学生教育的高校之一,多年来,学校留学生工作始终坚持服务国家大局、服务学校中心工作,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校情的留学生工作发展道路。百年校庆以来,伴随北大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进程,学校不断创新培养模式,积极推动趋同管理,初步建立完备的奖学金体系,稳步推进留学生校友工作,留学生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达者论道,育人为本 ——亚太国际教育协会 (APAIE) 2015 年年会在京举行

亚太国际教育协会 (APAIE) 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大学组织。2006年由韩国高丽大学发起,旨在推动亚太地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国际组织。协会成立十年来获得了迅速发展,其每年的年会更是吸引了来自亚、欧、美、大洋洲等各国高校校长和代表参加。协会目前已发展成为与美国教育工作者协会 (NAFSA) 年会、欧洲国际教育协会 (EAIE) 年会并列的全球三大著名地区性教育国际交流盛事。该协会自成立以来每年3至4月间组织一次年会与展览,2015年,APAIE年会移师北京召开,作为东道主的北京大学圆满完成本次年会的各项活动。



◀ P34

独家策划

科菲·安南 改革者眼中的战争与和平

尽管已经卸任联合国秘书长之职近 10 年,但当科菲·安南出现的时候,他依然被认为是一位“不需要介绍”的人物。2015 年 4 月 21 日、22 日,作为科菲·安南基金会的主席,安南到访北京大学,入选“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Peking University Global Fellowship),与北京大学学者和学生座谈,并发表了以“构建更加和谐的世界秩序”为题的演讲。即便已不再亲自斡旋于风云际会的国际舞台,但安南有关国际秩序、中国和青年议题的见解,依然吸引了“挤满一屋子”的学者和青年学子侧耳聆听。



▶ P20

热点聚焦

一个品牌暑期项目的十年征程

2015 年是北京大学 - 伦敦政经暑期学校 (LSE-PKU Summer School) 开办的第十一年。2004 年 8 月,由北京大学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合作,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办的暑期学校项目正式开设,第一批暑期学校同学在这里交流思想,观察世界。从那时起,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子齐聚燕园,在这里学习经济、管理、国际关系等基础知识,探讨重大国际问题。众多优秀学者在这里传递观点,教学相长。

时 事 CURRENT AFFAIRS

04 新闻概要

19 辞海拾英

热点聚焦

20 一个品牌暑期项目的十年征程

燕园盛事

29 “一日北大人,终身北大人”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一行来访北京大学

独家策划 SPECIAL REPORT

34 科菲·安南:
改革者眼中的战争与和平

人 物 PEOPLE

未名嘉宾

46 国际法视野下的全球安全
——专访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
高级顾问拉明·西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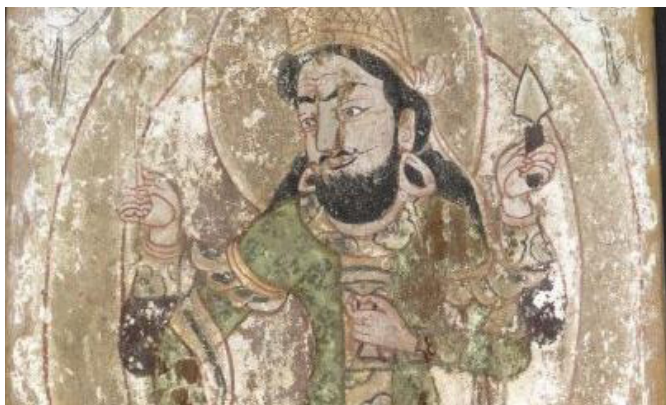


P49 名校掌门

ANU: 聚焦亚洲, 聚焦中国

——专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伊恩·杨

2015年4月14日, 伊恩·杨校长率领由数学及物理科学学院、工学及计算机科学学院、药物, 生物及环境学院、医学及健康学院等4位院长及相关领域近20位专家代表团来到北京大学, 介绍其相关学科建设发展情况, 与我校对应领域师生代表进行学术交流, 并举办“北京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日”活动。



P87

学者视角

东国公主与蚕种西传: 一个丝绸之路上的传说

所谓丝绸之路, 指的是古代起始于中国, 向西延伸, 连接中亚、西亚、欧洲, 乃至东非的商路。这些商路, 最早主要是陆路, 后来也包括海路, 于是又被分别称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名校掌门

- 49 ANU: 聚焦亚洲, 聚焦中国
——专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伊恩·杨

东风桃李

- 54 如何进入非洲: 非洲与我们
——专访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非洲研究专业
博士生程莹

- 59 王越: 人生需要“自定义”

交 流 COMMUNICATION

全球舞台

- 62 难忘之夏: 走入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

游 学

- 66 用一颗爱心走进哥伦比亚
——AIESEC 哥伦比亚海外志愿行

游学日记

- 69 走出去看世界
——爱丁堡大学游学记

两岸三地

- 72 燕园: 新的起点
——记2015年港澳台优秀高中生体验营
- 75 两岸三地的同一个梦想
——记第八期“北大-台大-云大学生
社会服务计划”

院系发展

- 78 北大考古队海外探寻先人足迹
——肯尼亚考古侧记

观 点 VIEWPOINTS

学者视角

- 84 “道不同”, 更需“相为谋”
——中美人文对话的空间与进路
- 87 东国公主与蚕种西传:
一个丝绸之路上的传说

域外心影

- 91 美国大学没有围墙?

合作与交流
COOPERATION & COMMUNICATION

2015年 第二期 总第三十期

【学术前沿】

Science 发表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室在人类干细胞衰老机理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4月30日, *Science* 在线发表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汤富酬实验室、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刘光慧实验室、以及 Salk 研究所 Juan Carlos Izpisua Belmonte 实验室在干细胞衰老机理方面的一项突破性研究成果。该研究结合多能干细胞定向分化技术、基因组靶向编辑技术、以及表观遗传组分析技术首次揭示了异染色质的高级结构失序 (disorganization) 是人类干细胞衰老的驱动力之一, 为延缓衰老及研究和防治衰老相关疾病提供了新的潜在靶点和思路。研究人员首先提出“组织干细胞的加速衰老 (耗竭) 可能是成年早衰症的病因”这一科学假设, 并通过基因组靶向编辑技术使得人类间充质干细胞 (MSC) 中的 WRN 基因发生纯合缺失突变, 在实验室创造出人类早衰症特异的间充质干细胞。

地空学院刘瑜课题组提出时空大数据在社会科学领域应用新框架

在地理学研究中, 传统遥感技术长于自然地理特征的获取, 却无法有效感知社会经济环境。大数据的出现, 为人们定量理解社会经济环境提供了新的契机。近日,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刘瑜教授类比遥感 (Remote Sensing) 技术, 提出了“社会感知 (Social Sensing)”这一概念, 并梳理了相关研究框架和研究议题, 从而为地理和社会科学学者利用大数据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一成果近日以“Social Sensing: A New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Our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s”为题在线发表于地理学旗舰期刊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深圳研究生院化学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学院黄湧课题组在有机方法学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近日,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化学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学院黄湧课题组发展了一个 1,2,3,4- 四取代丁二烯的合成方法。该反应条件温和, 不需要任何催化剂或添加剂, 具有高度的原子经济性。他们进一步发现, 这类分子不同于其他双烯, 相邻的双键不是平面共轭结构, 而是以近 90 度的二面角扭曲。因此, 该双烯并不参与常规的环加成反应。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 这类炔二烯胺结构在不同的亲电试剂作用下, 可以发生一系列新颖的环化、重排反应, 生成多种环系 (4 到 7 元环) 骨架, 为双烯在非环加成中的合成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策略。研究结果发表于《自然通讯》杂志上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5, 6, 6913)。

生命科学学院蒋争凡、苏晓东课题组破译天然免疫重要信使分子 3'3'-cGAMP 的降解之谜

天然免疫是有机体应对于病原微生物感染而进行反击的第一道屏障，与人类的许多感染性及非感染性疾病密切相关。生命科学学院蒋争凡课题组于 2009 年发现一个定位于内质网的分子 ERIS（也称为 STING/MITA），并与苏晓东课题组合作于 2012 年解析报道了 ERIS 的晶体结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ERIS 在哺乳动物抵抗 DNA 病毒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最近，蒋争凡课题组利用巧妙设计的真核筛选体系，首次发现并系统研究了三个在霍乱弧菌中负责降解 3'3'-cGAMP 的磷酸二酯酶并将其命名为 V-cGAP1/2/3 (Vibrio cholera c-GAMP phosphodiesterase)。V-cGAPs 只能特异性地降解 3'3'-cGAMP，而不能降解其它构象的 cGAMP (2'3', 2'2', 3'2'-cGAMP)。体外生化实验发现 V-cGAPs 能通过其拥有的磷酸二酯酶活性，将环化的 3'3'-cGAMP 特异性地剪切其中一个磷酸二酯键，从而形成线性产物 5'pApG；开环后的双核苷酸即丧失其生理功能。进一步的体内实验发现，V-cGAPs 的表达受到 3'3'-cGAMP 的强烈诱导，而这些降解酶的应激表达一方面能促进霍乱弧菌的趋化性，同时也能够通过抑制霍乱弧菌在宿主小肠中的增殖从而控制其感染宿主的能力。这是人类首次发现报道的降解环化 3'3'-cGAMP 的磷酸二酯酶。该重大突破不仅填补了基础研究中新全第二信使如何被降解的空白，也为临床应用上抗霍乱药物的研发提供了新的作用靶点。



数学科学学院胡俊课题组在有限元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近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国际数学中心研究员胡俊及其课题组提出了一个理论上最直接、内蕴的设计弹性力学问题混合有限元方法的全新框架，取得突破性进展，解决了长达五十余年的公开问题即弹性力学问题混合有限元方法。

胡俊及其课题组基于他们自己获得的分片多项式 $H(\text{div})$ 空间一个内蕴的结构和两个基本代数结果，提出了一个设计弹性力学问题混合有限元的框架。这一框架与文献中已有框架完全不同，其最突出的一点在于，基于它设计的混合元应力严格（强）对称，应力与位移多项式次数匹配自然合理，有最优收敛性。针对胡俊的研究成果，有限元方面的专家许进超教授评价其“解决了用于求解弹性力学方程组有限元方法的一个多年来悬而未决的基本问题，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许多世界一流的计算数学专家都为解决此问题做过努力，但胡俊最终得到了最优的算法及其完美的理论分析”。

化学学院雷晓光课题组在天然产物化学生物学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

天然产物及其衍生物一直以来是创新药物的主要源泉，也是生物医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分子。目前超过 50% 的临床应用药物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天然产物。因此针对具有重要生物功能的天然产物的合成及生物作用机制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日，北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化学生物学系雷晓光课题组一直致力于活性天然产物的全合成以及后继化学生物学研究。他们成功地完成了 Ainsliadimer A 和相关类型天然产物的首次不对称全合成 (*Org. Lett.* 2010, 12, 4284–4287; *J. Am. Chem. Soc.* 2012, 134, 12414–12417)。在此工作的基础上，该课题组进一步开展了对于复杂天然产物 Ainsliadimer A 的探针化与化学生物学研究。相关成果已于 2015 年 3 月 28 日在线发表于《自然·通讯》杂志上 (*Nature Commun.* 2015, 6, 6522)。此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编号: 21472010, 91313303, 20122209, 21072150)，国家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的资助。

《自然·通讯》发表城市与环境学院李双成研究组研究成果 揭示森林对局地气候影响

森林在气候变化中扮演重要作用，除了通过碳循环影响全球气候以外，还可通过生物物理机制对局地气候产生显著影响。森林对局地气候的影响与林业和农业管理密切相关，但受到研究手段的制约，对其仍缺少足够的认识。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李琰、教授李双成与美国马里兰大学学者合作，利用全球高分辨卫星遥感资料，克服了传统方法在空间分辨率和覆盖范围上的制约，精确地量化了全球不同位置上森林对温度的调节作用。论文“Local cooling and warming effects of forests based on satellite observations”于 3 月 31 日在线发表在《自然·通讯》上。

研究表明，大部分森林 (除北方高纬以外) 在白天具有降温作用，在夜晚具有增温作用 (除热带外)。因此，低纬度的热带森林具有最强的降温作用，而北方高纬森林具有增温作用。位于二者之间的温带森林，其白天的降温效应被夜间增温效应所抵消，具有中等程度降温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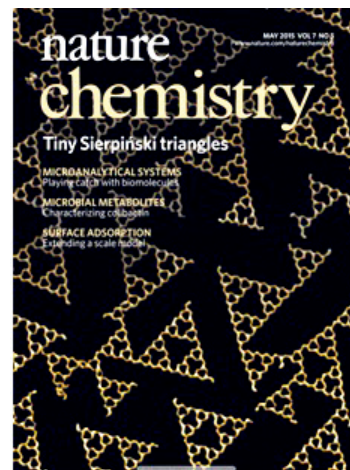
工学院力学与工程科学系陶建军课题组关于槽流亚临界转捩的研究取得新进展

Physics of Fluids 最近刊发了工学院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湍流与复杂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陶建军课题组的论文“*Turbulent bands in plane-Poiseuille flow at moderate Reynolds numbers*” (27, 0417022, 2015)，报道了他们在槽流亚临界转捩研究上取得的最新成果。

流动的层流态与湍流态的动量、能量输运特性有很大差别。人们至今仍难以准确预测粘性剪切流从层流向湍流亚临界转捩的位置和临界参数，其中的主要困难在于该转捩过程对外部有限幅值扰动有很强的依赖性。这种不确定性给人们的航行器、发动机及化学反应器的优化设计造成了障碍。存在亚临界转捩的一种典型流动模型是 plane-Poiseuille 流 (PPF)，即两平行平板间的压力驱动流。陶建军课题组与瑞典 KTH 的 Linné 流体中心合作，对压力驱动槽流的转捩过程在大计算域上进行了系统的数值模拟。计算在国家天津超算中心的天河-1(A) 上进行。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吴凯课题组在分子分形结构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

分形结构因其特殊的数学和美学意义受到科学家们长期以来的广泛关注。化学家们更是试图利用共价键和配位键等来合成各类分子分形结构体，但由于受到合成方法的种种制约，始终无法实现高级别、无缺陷的系列分子分形结构的构筑。最近，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吴凯教授课题组与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物理电子学研究所王永锋特聘研究员及其他合作者协力合作，实现了谢尔宾斯基 (Sierpiński) 分形结构的分子组装，并利用超高真空低温扫描隧道显微镜 (STM) 对这些由分子间弱相互作用驱动形成的分子分形结构进行了亚分子水平的详细表征。这一研究成果于 2015 年 3 月 30 日以 “Assembling molecular Sierpiński triangle fractals” 为题在线发表于《自然·化学》杂志【*Nature Chemistry*, 2015, 7, 389–393 (DOI: 10.1038/NCHEM.221)】。该论文同时被选为 *Nature Chemistry* 当期封面文章。



北大第一医院药剂科发表首篇关于临床药学质量评价的 SCI 研究性论著

近日，美国著名临床药物治疗学杂志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y and Therapeutics* 接收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论文 “*Impact of pharmacist intervention on antibiotic use and prophylactic antibiotic use in urology clean operations*”。该论文是临床药学服务的成果评价研究新成果。论文认为，2011 年至 2013 年，临床药师通过参与抗菌药物管理工作及在临床开展实时干预，有助于促进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并降低患者抗菌药费用支出。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师团队发表的首篇关于临床药学质量评价的 SCI 研究性论著，标志着该院临床药师与美国临床药师发展模式接轨，在经历制度建设、工作模式和流程建设各阶段后，全国率先进入成果评价阶段。

【国际舞台】

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成功举办“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学术研讨会

3月28日至29日，来自中美两国著名智库、高校的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教育部基地）和美国著名智库全美亚洲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协办。本次研讨会是北大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与全美亚洲研究所联合进行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项目的首次会议。

本次研讨会涉及中美关系中的诸多重大议题，在为期一天半的研讨会中，中美双方专家学者围绕人文交流、海洋问题、太空问题、网络问题、核问题、两军关系等几大主要议题展开了坦诚而深入的讨论，力图消除认识差异、增进互信、凝聚共识，充分发挥智库交流在中美关系中所起到的桥梁和渠道作用。

此次会议邀请曾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美国驻华大使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芮效俭（J. Stapleton Roy）以“中美关系的发展”为题与与会中美代表致晚宴演讲。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副代表徐步司长应邀以“中国外交”为题发表午餐演讲，并与参会中美代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此次研讨会是一次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受到中美两国学界和政策界的高度关注，对于推动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第三届汉字文化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4月11日上午，2015年汉字国际学术会议暨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AEARU）第三届汉字文化研讨会在我校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本届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中文系承办，邀请了东亚地区众多知名汉字研究者出席，旨在推动东亚研究型高校之间在汉字及汉字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发展。李岩松副校长、中文系党委书记金永兵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文系杨荣祥教授担任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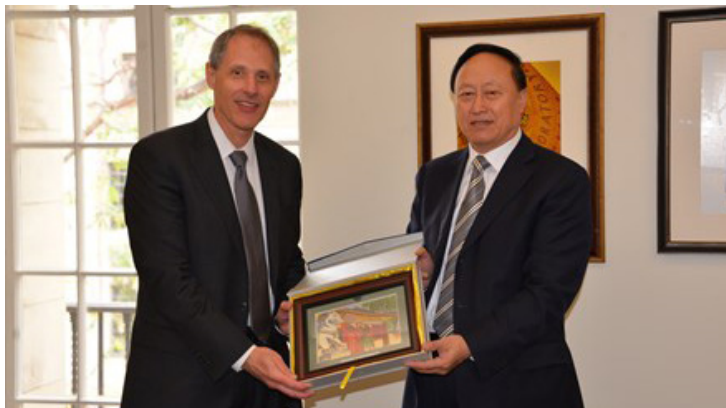
在持续两天的会议中，来自国内外的23位顶尖学者，如日本东京大学大西克也教授、大阪大学古川裕教授、复旦大学刘钊教授，以及我校胡敕瑞教授、董珊教授等就汉字的起源、演化及传播进行了热烈的发言与讨论。

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ies，简称AEARU）是创建于1996年的区域性大学联盟组织，至今已走过了十余年的辉煌历程，现有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17所成员大学。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AEARU）主要活动有年度全体大会、半年期理事会会议，以及不定期会议和活动。

▮ “亚投行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圆桌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4月15日晚，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亚投行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专题圆桌讨论会。应邀演讲嘉宾包括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亚洲研究院院长、中国委员会主任肖逸夫（Yves Tiberghien）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全球治理中心主任庞中英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博士，以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绍锋博士。北京大学国关学院师生、外国驻华机构代表90余人出席讨论会。研讨会由王勇主持。

圆桌报告会围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兴起、动因及其对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影响展开，对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进程有重要意义。



▲ 北大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向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托马斯·罗森鲍姆（Thomas F. Rosenbaum）教授赠送纪念品

▮ 北京大学代表团访问美国、墨西哥

2015年5月6-13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率团访问美国及墨西哥交流院校。北大代表团先后访问了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南加州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墨西哥学院和蒙特雷科技大学，并出席了与南加州政商侨界华人代表的交流活动及北京大学南加州校友会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此次访问旨在了解美国及墨西哥大学的管理制度，借鉴各校在高校治理领域的成功经验，并在原有交流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双边或多边合作。

此外，北大代表团一行还分别拜会了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驻墨西哥大使馆，就进一步开展中美、中墨高等教育合作进行了交流。

▮ “中日考古学论坛”在北京大学举办

2015年3月28至29日，由中国考古学会和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主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承办的中日考古学论坛在北京大学举办。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国内多个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日本东京大学、九州大学、京都大学等日本多家学术机构的近200位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为期两天的论坛由中国考古学会和日本中国考古学会联合举办，所发表的论文与演讲体现了中日两国在中国考古学研究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论坛涉及了中国历代都邑性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以区域为中心的长时段的社会研究；以手工业生产为主的特别研究和跨学科综合研究等议题。中日两国在考古学上的交流，从学术史角度看，一直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日本考古学者细致的研究方法以及对材料的全面收集，以及学术研究的专题化值得中国同行学习。而中国的新发现、新研究、新方法，也正是在交流中向世界进行传播。只有中日两国学者不断合作，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一代代地传承下去，才能持续不断地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前进。



留学生校友返校参加母校 117 周年校庆

5月3日，一批留学生校友返回北京大学，参加母校建校 117 周年校庆系列活动。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校友们组队参加了首届校友羽毛球联谊赛，校友们出席了建校 117 周年校庆纪念交流会，观看了首届北京大学草坪音乐节和北大学生合唱团的精彩演出。留学生校友们还就母校未来的发展、120 周年校庆活动安排等积极建言献策，共同祝福母校的明天更加美好。

留学生办公室组织日本同志社大学项目学生开展文化之旅

同志社大学是日本关西地区最为著名的私立大学之一，自 2012 年签署合作协议以来，同志社大学已派遣三期近 70 名学生来校，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汉语学习。为了丰富留学生的校园生活，帮助留学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北京大学留学生办公室组织日本留学生开展为期四天的江南之旅。4 月 23 日下午来自日本短期项目的留学生身背旅行包，面带微笑踏上了期待已久的江南旅程。在留办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坐上了开往杭州的火车。

江南归来，留学生深深感谢留办组织这次苏杭文化之旅，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文化交流活动。愿两国友谊长存，愿每个留学生在北大收获知识和幸福。

2015 年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暨北京大学金融校友联合会年会召开

5 月 16 日，2015 年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暨北京大学金融校友联合会年会在英杰交流中心召开。论坛由上午主论坛和下午三场分论坛组成，千余位金融北大人回到母校，在讨论金融热点的同时，共同庆祝北京大学金融校友联合会成立一周年。

主论坛首先由六位来自学术、实务和政府领域的重量级嘉宾围绕近期金融界热点政策、理论和实践展开主旨演讲。三个平行分论坛主题分别为创业投资、二级市场投资和互联网金融，北大金融界参会校友与嘉宾就新三板与投资新生态，互联网 + 的创业机遇，二级市场投资，P2P 的未来，大数据助力新金融等热点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君威集团总经理、京东天使投资人宋宇海，北大企业家创投基金执行合伙人杨岩，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创始人、秘书长易欢欢，深圳互联网金融协会秘书长曾光，申万宏源证券计算机行业分析师冯达分别主持分论坛圆桌，对话相关领域内的重量级嘉宾。

【北大荣誉】

量子材料科学中心王健研究员 荣获马丁·伍德爵士中国物理科学奖

2015年4月1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低温物理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上，2015年马丁·伍德爵士中国物理科学奖（Sir Martin Wood China Prize）举行了颁奖仪式。今年的奖项经过评奖委员会的严格评审，确定了王健研究员获颁马丁·伍德爵士中国物理科学奖，主要表彰其在二维极限下界面增强超导方面的研究和对拓扑超导的探索。

马丁·伍德爵士中国物理科学奖由牛津仪器在2013年设立，旨在发掘和奖励国内年轻科学家在低温或强磁场环境下做出的突破性研究工作。该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奖励1到3名获奖者，奖金总额为10万元人民币。

北大校友于敏获“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由凤凰卫视和凤凰网发起，联合海内外十余家知名华文媒体和机构共同主办的“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2015年春天推举及表彰2014-2015年度在不同领域成就卓著、对世界具影响力并受全世界关注的华人典范，颁受年度“影响世界华人大奖”以及“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北京大学校友、“中国氢弹之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因在核物理领域的巨大成就，获得由凤凰卫视联合海内外十余家知名华文媒体和机构评选的“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于4月3日举行。

于敏在我国氢弹突破中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2015年1月9日，“中国氢弹之父”于敏荣膺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于敏的一生淡泊名利，对于“氢弹之父”的美誉，他表示，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取得现在的成绩，他只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百人计划”研究员林金泰获美国科学院院刊2014年度科扎雷利奖

4月26日，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林金泰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身份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的论文，获美国科学院院刊2014年度科扎雷利奖（Cozzarelli Prize）。该奖项从每年美国科学院院刊所发表的约3500篇论文中选出6篇，并颁发奖励证书，以表彰这些论文在各自研究领域所作出的“杰出科学贡献和研究成果的原创性”。这是迄今国内研究机构首次作为第一单位获得该奖项。

获奖论文是由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领衔的一项国际合作研究成果，主要探讨国际贸易对全球大气污染传输的影响。林金泰研究员和物理学院本科生潘达为共同第一作者，林金泰及清华大学贺克斌和张强教授为共同通信作者。论文于2014年1月份发表之后，被《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纽约时报》等国内外数十家媒体广泛报导，并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迄今论文下载量超过12万次。今年4月26日，林金泰和潘达应邀参加美国科学院院刊及美国科学院（NAS）年会并接受颁奖。

北大学生丁立人率领中国国际象棋队再夺男团世界冠军

北京时间 2015 年 4 月 28 日下午，第十届男子国际象棋世界团体锦标赛在亚美尼亚的特萨夫卡德佐市落下帷幕。在最后一轮比赛中，由北京大学法学院 2012 级本科生丁立人坐镇第一台的中国男队以 3:1 的局分战胜印度队，凭借 6 胜 3 平的不败战绩、领先亚军乌克兰队 3 个场分的巨大优势，夺得本次大赛的冠军，从而一举打破了欧美人对冠军长达 30 年的垄断。这也是中国男子国际象棋队继去年 8 月夺得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冠军后，再次获得团体世界冠军。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队两次实现历史性突破的比赛中，北京大学丁立人同学均以中国队等级分第一人的身份出战，在取得连续 19 盘不败战绩的同时，多次在团队紧要时刻攻城拔寨、攻坚克难，取得了多局关键性胜利，为中国队两次夺冠作出了最大贡献，被教练和队友誉为中国队的“定海神针”。

据北大国际象棋队领队老师介绍，近年来，丁立人同学的棋艺进步很快，不断攀登竞技新高峰，连续刷新中国棋手大赛成绩的纪录，为国家争得了很多荣誉。这些成绩的取得一方面与他在棋艺领域坚持不懈的勤奋钻研、创新求变以及良好禀赋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学校对于国际象棋运动的重视和对本校队员为国参赛的一贯支持。



北京大学校友吴皓新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北京时间 4 月 29 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公布 2015 年新增院士名单，新增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84 位，外籍院士 21 位，他们来自 15 个不同国家。在此次新增院士名单中，华人学者共有 7 人入选，其中哈佛医学院教授吴皓是北京大学生物学校友，是继谢晓亮、朱健康、邓兴旺、陈雪梅、郁彬之后第六位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北大毕业生。

吴皓于 1982 年至 1985 年在北京大学接受医学预科教育，主要研究方向是天然免疫相关蛋白的结构与功能，主要通过 x-射线晶体衍射和电子显微镜解析免疫相关蛋白结构，从而阐释免疫受体尤其是天然免疫受体信号转导的分子机理。

据悉，文革后大陆毕业生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总计不到 20 人，北大毕业生截至今年达到 6 人而遥遥领先，其次是复旦大学（3 人）、中国科技大学（2 人）。来自北大生物学领域的人选者有 4 位，超过我国其他学校不分学科的总数。

2015 中国大学各学科门类专业排行北大专业实力最强

5 月 18 日，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编制完成《2015 中国大学本科专业评价报告》，报告公布了 2015 中国大学各学科门类最佳专业排行榜等榜单，北京大学问鼎理学、医学、法学、历史学、文学等 5 个门类第一。

报告指出，2012 年，教育部颁布了最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 年）》，文件公布本科专业划分，按所属类别划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和艺术学等 12 个学科门类。

生命科学学院谢晓亮教授获颁阿尔伯尼生物医学奖

2015年5月15日，生物动态成像中心主任谢晓亮教授在美国纽约州的阿尔伯尼希尔顿花园酒店获颁美阿尔伯尼生物医学奖，成为获得该奖的首位华人学者。

谢晓亮教授今年52岁，他的获奖理由是他的工作可以帮助科学家们确定单个细胞中的基因突变，这项研究工作在癌症及试管婴儿等领域有重要的应用前景。谢晓亮教授在接受颁奖时说：“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的基础研究工作终于能够为医学应用作出些贡献。”

自2001年来，阿尔伯尼生物医学奖每年授予一次，是美国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医学及科学类大奖。谢晓亮教授是该奖的第一位华人得主，他是国际著名的生物物理化学家、公认的单分子生物学领军人物。这一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仅可以满足重大遗传病基因携带者希望拥有健康后代的愿望，同时可以大大降低婴儿出生缺陷率，逐步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

北大两名优秀博士生获选赴德国出席今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

为使优秀的科学接班人跻身或活跃于世界科技舞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德国德意志研究联合会委托中德科学中心在中国挑选优秀博士研究生赴德参加在德国林岛举办的第65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北大物理学院郭静、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杨烽两位同学经过层层选拔，从全国众多优秀博士生中脱颖而出，获得出席第65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的资格，并将于2015年8月赴德国林岛参加该会议并访问大学和研究所。

自1951年起举办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每年都会邀请世界各国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与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的优秀博士生和青年科学家，一起探讨相关学科的话题，研讨未来科学的发展。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已连续举办64届，是一项世界有名的、对世界各国的优秀博士生们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学术活动。北大研究生院承担了项目宣传，组织申报、推荐和办理出访等工作。近十年来，北京大学已有超过30名优秀博士研究生经选拔赴德国参加该项重要学术活动。

2015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公布北京大学有22个学科入选全球学科排名前50

4月30日，英国“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在4月29日公布，显示中国大陆有58所大学入选全球顶尖学科前400名，北大和清华仍然在大陆大学中领先。

排名显示，北京大学有22个学科入选全球学科排名前50，为中国大陆大学之最，清华大学则有15个。北京大学排名最高的学科是现代语言，列全球第五。

QS声称它的排名来自于全球100多个国家85062名顶尖学者和41910名雇主的专业意见，以及1730万学术出版物和超过1亿引用的数据分析。QS全球教育集团智库的中国总监张轶博士（Dr. Christina Yan Zhang）表示，中国的大学排名“充分证明了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教育改革是成功的”。

【五洲宾朋】

▮ 泰国诗琳通公主殿下访问北京大学

2015年4月4日，泰国诗琳通公主殿下（HRH Maha Chakri Sirindhorn）来到北京大学访问，泰国驻华大使醍乐堃·倪勇（H.E. Theerakun Niyom）、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披隆（Pirom Kamolratanakul）等陪同访问。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在英杰交流中心贵宾室会见了诗琳通公主殿下，并与朱大校长续签了校际学术交流协议及合建孔子学院协议。副校长李岩松，相关院系和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见。之后，诗琳通公主殿下还参加了在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举行的“泰学研究在中国——庆祝中泰建交40周年暨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公主殿下60华诞”学术研讨会开幕式，访问了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中午，北大在中关新园为诗琳通公主殿下隆重举行欢迎暨生日宴会，泰国驻华大使、朱大校长、朱善璐、李岩松等出席。

接着，诗琳通公主殿下参加了“泰学研究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开幕式。李岩松代表北大致欢迎辞。诗琳通公主殿下为研讨会致开幕辞，她表示非常高兴在中泰建交40周年和自己60岁生日之际出席该研讨会，希望泰中两国关系持续顺利发展。

随后，诗琳通公主殿下在李岩松的陪同下来到了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参观，结束后诗琳通公主殿下欣然提笔写下“春华秋实”四个大字。

朱善璐代表北大全体师生对诗琳通公主殿下致以诚挚的生日祝福，他总结回顾了诗琳通公主殿下到北大学习与北大师生结下深厚友情的历程，以及友谊与合作、促进两国高校间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副总裁一行来访

4月17日上午，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副总裁哈立德（Khaled Al-Buraik）一行来访。副校长李岩松、工学院院长张东晓等在临湖轩接待了来宾。

李岩松副校长首先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副总裁哈立德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他表示，我校密切关注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合作。如今，全球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生产等业务走向转型，需要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链条。我校希望在未来与沙特阿美公司加强合作、密切联系。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副总裁哈立德首先对我校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对我校在学术发展和科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并希望进一步加强合作，开展独特而有实效的合作项目。随后，双方就合作议题开展了深入探讨，表示将更重视学生交流，加强在企业研发中心的合作，这些建议将有助于提升双方在相关领域的进一步合作。

沙特阿拉伯阿美石油公司是一家全球性的一体化能源公司，是原油开采和生产、原油炼制、分销、国际运输、市场营销和化工产品生产的全球引领者，公司管理着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可采储量。

成均馆大学校长代表团访问北京大学

4月23日，韩国成均馆大学（Sungkyunkwan University）校长郑圭相来访。林建华校长在临湖轩会见了来宾，副校长李岩松、原常务副校长迟惠生、韩语系主任王丹出席会谈，双方就如何进一步加强两校间的全面交流合作深入地意见交换。

林建华校长对郑圭相校长一行表示了热烈欢迎，并回顾了郑校长就任后两校的合作与交流。郑圭相校长介绍了成均馆大学的近期概况，同时回顾了我校与成均馆大学的合作历史。他用“老朋友”概括两校多年来的深厚友谊。经过两校领导、师生的努力，两所大学在教师、学生和科研合作等方面交流频繁，学术合作紧密。郑圭相校长表示，希望两校未来能在经济、法学、纳米等领域开展进一步合作，并就合作渠道进行实质性地磋商。同时郑校长还邀请林建华校长参加成均馆大学即将举办的中韩论坛。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访问北京大学

4月30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阿里·阿斯加尔哈吉（Ali AsgharKhaji）在伊朗驻华使馆参赞阿部法兹尔·欧拉马埃（Abolfazl Olamaei）的陪同下来访。校长林建华、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李淑静、西亚系主任时光教授、波斯语专业王一丹教授、以及国际合作部的代表热情接待了来宾。

林建华校长首先向阿斯加尔哈吉大使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回忆了大使2010年第一次来访的情景。林校长表示，伊朗有着悠久的文明，希望有机会进一步加强北大与伊朗高校的交流与合作。随后，大使先生表达了他对推动中伊双边关系向更好方向发展的希望。他指出，中伊双方在文化交流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为中伊友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这一点在伊朗孔子学院的建立和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的开设中可见一斑。但中伊合作不止于此，学生交换项目和研究项目也是双边交流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下，中伊双方必将迎来快速发展的宝贵机遇。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一行来访

4月8日中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校长阿温德·古普塔（Arvind Gupta）一行来访。校长林建华、副校长李岩松、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在临湖轩接待了来宾。

林建华校长首先对古普塔校长一行到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我校一直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今全球教育体系正在发生改变，我校希望通过交流寻找双方更多的共同关注点。

古普塔校长感谢我校的热情接待，对我校在学术发展和科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非常赞赏，并希望进一步加强两校合作，开展独特而有实效的合作项目。该校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肖逸夫教授详细介绍了该校新设立的公共政策和全球事务研究生项目的细节，该项目将为学生提供与国际合作和可持续发展政策方面相关的专门教育。随后，双方就北大的国际暑期学校、2016年中加校长论坛等合作议题开展了深入探讨。

会后，双方续签了两校学生交流协议并签署了国际关系领域合作意向。

加拿大不列颠大学与多伦多大学、麦吉尔大学和皇后大学共同组成加拿大的常春藤联盟，在加拿大国内位列前三，世界排名在35名以内，以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见长，是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来访北大并发表演讲

5月7日下午，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Michael Clauss）作为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特邀嘉宾，在外国语学院新楼501大厅发表了主题为“从德国角度看中国如何改变世界？中德两国可以进行哪些合作？”的演讲。演讲会由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主任黄燎宇教授主持并致欢迎词，近100名校外师生到场。

在长达二十多分钟的演讲中，柯慕贤大使将演讲分“中国的崛起”“中德两国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求同存异”“中德未来的交流与合作”三个部分来进行。最后柯慕贤大使总结到，在欧洲方面，德国是中国最主要的政治伙伴和经贸伙伴。我们不仅是拥有更加紧密的合作，而且趋势所致，我们不得不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默克尔总理将会于今年第8次访华；而在过去的一年中，两国就有三次最高级别的访问交流，让我们对未来两国的合作与发展拭目以待。



诺贝尔奖获得者杰克－绍斯塔克教授 应邀访问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并作学术报告

2015年5月6日，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杰克－绍斯塔克（Jack W. Szostak）应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主任谢晓亮教授的邀请，到中心访问并作了题为“The Origin of Cellular Life”的学术讲座，校内外约300名师生认真听取了报告，并与杰克－绍斯塔克教授热烈互动。

在报告中，杰克－绍斯塔克教授为师生们详细介绍了细胞生命的起源。由于现代生物的复杂性使得人们难以了解生命是如何从地球早期的化学反应中自然产生的，杰克－绍斯塔克教授和他的团队试图通过合成简单的人造细胞探究化学反应向生物过渡的合理途径。他们发现，化学反应丰富的环境为膜、核酸和多肽的组合物提供了化学能量来源，这可能会导致可复制和进化的细胞出现。

杰克－绍斯塔克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生物学家，因发现端粒保护染色体的机制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外他还获得多项国际大奖，包括2006年获得拉斯克奖（Lasker Award）、1994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科学奖（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ward in Molecular Biology）等。

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代表团 来访问北京大学

5月6日上午，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教务长、学术副校长安迪·范斯坦（Andy Feinstein）在该校工学院院长安德鲁·许（Andrew Hsu）和电子工程学系系主任瑞·陈（Ray Chen）的陪同下来校访问。李岩松副校长，软件与微电子学院常务副院长杜鹏、副院长吴中海以及郁莲教授等在临湖轩接待了来宾，并针对两校的合作进行了谈话。

安迪·范斯坦副校长表示，此次来访将是北京大学和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之间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一个新的开始。

圣何塞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是美国的一所著名的公立大学，成立于1862年。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鉴为美西排名第45名的大学。

意大利帕维亚大学校长一行来访

5月18日上午，意大利帕维亚大学（University of Pavia）校长法比奥·鲁杰（Fabio Rugge）教授与主管国际合作的副校长伊拉里亚·波乔里尼（Ilaria Poggiolini）教授率团访问我校，副校长李岩松、继续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张虹、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舒忠飞、国际合作部副部长郑如青等在临湖轩接待了来宾。

李岩松副校长首先对意大利帕维亚大学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并向代表团介绍了北京大学与意大利大学以及欧洲大学的合作情况。随后，帕维亚大学校长法比奥·鲁杰教授简单介绍了帕维亚大学的基本情况，包括该校的规模、学科设置、历史、知名校友等，副校长伊拉里亚·波乔里尼教授则对该校的国际化战略进行了阐述，指出加强与我国高校的合作是其战略重点之一，同时为了提升国际化水平，该校也在英文课程的设置、双学位和博士生联合培养等项目上进行了投入。

李岩松副校长高度评价了帕维亚大学在国际化中的努力和尝试，希望随后帕维亚代表团与继续教育学院的会见能够愉快、顺利，并能够以此为契机推动继续教育学院与帕维亚之间的合作，同时也欢迎帕维亚的学生和学者能够来中国、来北京大学交流。

诺贝尔奖获得者 Klaus von Klitzing 教授应邀访问量子材料科学中心并与本科生进行座谈

2015年5月11日，诺贝尔奖获得者、德国马普学会固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克·冯·克利钦（Klaus von Klitzing）教授应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院长谢心澄教授和量子材料科学中心主任杜瑞瑞教授的邀请，到量子材料科学中心进行学术访问并与物理学院五十余名本科生举行了题为“Meeting the Nobel Laureate”的座谈会，会议现场气氛热烈。

座谈会由杜瑞瑞教授主持，克·冯·克利钦教授与大家分享了关于他发现整数量子霍尔效应的经过以及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时的趣闻。

墨西哥驻华大使温立安先生访问北京大学

2015年5月5日上午，墨西哥驻华大使温立安先生访问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副校长李岩松等在临湖轩接待了大使先生一行。

朱善璐书记首先对大使先生来校访问表示感谢，同时也表示5月中旬他将首次率北大代表团访问墨西哥友好院校，加强与墨西哥高校的交流与合作。北京大学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墨西哥学院及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学等墨西哥著名高校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此次北大代表团访问墨西哥，希望可以巩固与这些院校的友好关系，开启两校合作新局面。

温立安大使感谢朱善璐书记的热情接待，他表示很荣幸朱书记将率团访问墨西哥。墨西哥非常重视与中国高校的交流，尤其是与北京大学的合作。随后温立安大使提到，现在是中墨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习近平主席和恩里克·培尼亚·涅托总统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之内分别有四次交流。两位领导人均表示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合作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方面。两国关系不仅仅依赖于经济，从长期来看，两国关系更加依赖于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交流。



巴黎政治大学副校长来访

5月18日上午，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 Po）副校长弗朗西斯·威尔兰德（Francis V é rillaud）到访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元培学院党委书记孙华、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助理许雅君、燕京学堂外方院长约翰·霍顿（John Holden）以及国际合作部副部长郑如青在临湖轩接待了来宾。2010年，巴黎政治大学联合12个法国高校及科研机构成立了索邦巴黎西岱大学联盟。威尔兰德副校长此次来访主要目的在于代表联盟商讨与北大的合作事宜，此外，双方还就在多个领域加强校际合作交换了意见。

索邦巴黎西岱大学联盟（Universit é Sorbonne Paris Cit é , USPC）成立于2010年，是法国政府为提高法国大学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在巴黎大区组建的高等教育与研究联盟，集合了法国最优秀的八所高等学府及五所研究机构。该联盟的研究及教学覆盖几乎所有领域，并尤其以以下六个方向为研究重点：公共健康与卫生、自然政策、未来能源、全球化、身份（identity）及风险管理。旨在成为世界第一流的研究及教学系统，为成员提供最丰富的研究合作资源及服务，并在各种领域创新发展。

拉脱维亚共和国大使来访北京大学

2015年4月1日上午十点，拉脱维亚共和国大使乐音（Inge ī da Levrence）女士及拉脱维亚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安杰斯（Andzejs Kasevskis）先生来访北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在临湖轩会面。

在半个小时的会谈中，李岩松副校长与拉脱维亚大使以双方合作为主题展开了丰富而深入的对话。李校长首先介绍了近年来北京大学和世界各地的大学的合作状态，并着重指出为加强北京大学的国际联系和交流合作，北京大学开展了以国际文化节为代表的系列特色活动。乐音女士也对深化拉脱维亚的高等学府与北京大学的友好关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她指出，拉脱维亚的一些大学已经和中国的某些院校建立起了交换学生项目。同时，拉脱维亚是艺术之国，发展艺术领域的交流合作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个极好的契机。乐音女士建议开展北京大学与拉脱维亚的大学联合开展合唱团交流项目，与此同时，她也希望有机会提供北京大学必要的支持，通过举办艺术展览来展示和宣传拉脱维亚的文化。



【辞海拾英】



西方社会在这三百年中，慢慢挣扎着形成许多复杂的制度，去调整“自然状态”，使其成为人们可以生活的社会关系。中国把西方三百年的历史压缩在二三十年里，因此我们对自然社会性带来的许多问题有着强烈的感受，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的伦理危机、权威危机、信念危机等，都是这三十年剧烈变动的结果。

——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猛近日推出新著《自然社会》，备受学界关注。他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表述中国当前面临的挑战。

▶ 我深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人不希望孩子们去接近马克思，阅读马克思，正像有人不想让哈姆雷特看到父亲亡灵所揭示的世界的真实，因为他们说：那种冷酷的真实不利于孩子身心的成长，但是，这些人似乎忘记了：只有学会面对真实，我们的孩子才能长大，只有孩子们立志去改变世界的冷酷，人类才会成长。

——2015年5月28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在纽约“美国书展”上推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著作的英译本 Karl Marx for Young Readers (《少年读马克思》)。韩毓海在现场发表上述感言。

▶ 30多年前，不惑之年的加莱亚诺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的存在真的能在他人身上延续、能在留存的事物中延续，个体死亡的概念就不再重要了”。作家终其一生都在不断抗争物质世界的异化，拼尽全力让人类的灵魂与肉体、思想与心灵再不断裂疏离。在他看来，写作既是反抗的武器也是拥抱的方式。

——2015年4月13日，享有世界声誉的乌拉圭作家、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去世。他著作的中文译者之一、北京大学西葡语系路燕萍老师撰文纪念。

▶ 我对“软实力”的提法不太认同。软实力是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来的。他明确提出，我们必须要有软实力才能够压服别人。这个“软实力”是征服别人的工具，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不一样。我们跟别的国家相处，不是要去压服他，不是要用我们的思想去覆盖人家的思想，而是大家多元共存，也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日前推出新作《涅槃与重生——在多元重构中复兴》，并在访谈中谈及她对“软实力”的看法

▶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各项经济和社会指标都和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韩国上世纪90年代初的指标非常接近，而且还在不断改进之中。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近日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国将通过持续的科研投入和不懈的体制改革，最终实现赶超，坐进科技革命的头等车厢。

一个品牌暑期项目的 十年征程

2015 年是北京大学 - 伦敦政经暑期学校 (LSE-PKU Summer School) 开办的第十一年。2004 年 8 月, 由北京大学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合作, 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办的暑期学校项目正式开设, 第一批暑期学校同学在这里交流思想, 观察世界。从那时起, 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子齐聚燕园, 在这里学习经济、管理、国际关系等基础知识, 探讨重大国际问题。众多优秀学者在这里传递观点, 教学相长。

▼夏天的学术之约

——记北京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暑期学校

▼在这里汲取新颖开放的思维

——授课教师眼中的LSE-PKU

▼互联互通的学术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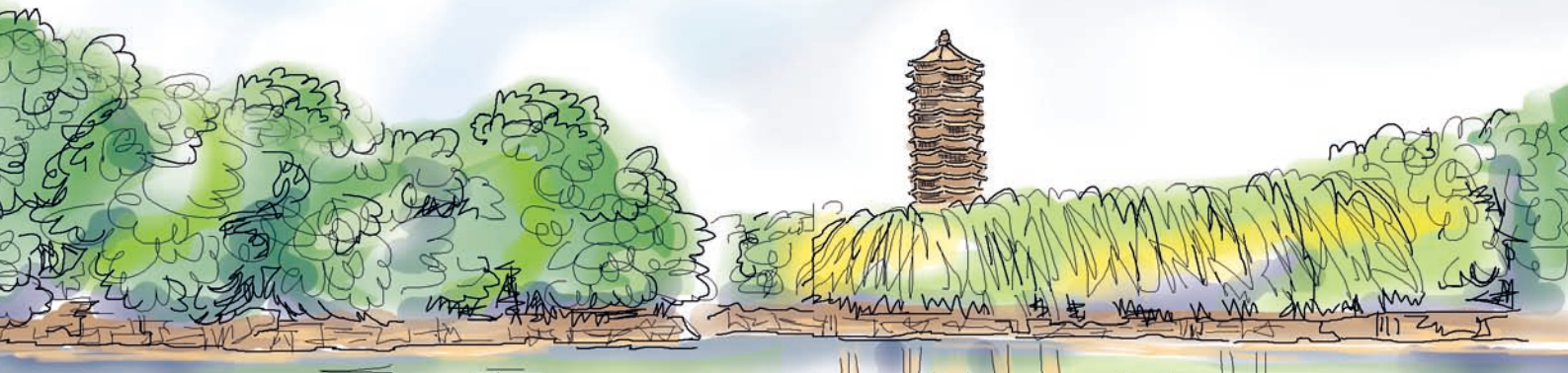
——学生眼中的LSE-PKU



夏天的学术之约

——记北京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暑期学校

整理 / 张馨蕊



北京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暑期学校，简称LSE暑期学校。该项目是由北京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合作，旨在帮助学生提高学术能力，拓宽国际视野，同时促进国际交流。LSE暑期学校主要开设经济学，国际关系学，法学，管理学等课程，全部由本领域国际知名教授用英语讲授，每年都会吸引来自包括LSE、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知名学府的优秀学子在此求学，是北大在建设国际一流大学过程中成功的探索和发展。

充实紧张的学术讲座

北京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暑期学校的课程老师全部来自这两所高校，因此它的课程设置和要求兼具北大的教学特色，同时也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授课风格。暑期学校的内容设置紧凑，课堂时光紧张而充实。虽然课程只有两周时间，但老师绝没有放松对学生的高标准和严格要求。教授通常都会为学生提供厚厚的英文阅读材料，作为每天教学内容的课前准

备。每一天的课堂上，学生们则会接触与阅读材料相关的新内容和主题。以国际关系的课程为例，教授选取广受关注的国际热点话题进行讲授，诸如中国正在崛起吗；为什么美国的地位可能并没有下降；如何批判地看待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所谓“亚洲的世纪”等。话题之多、内容之丰富让学生获益匪浅。不过，课堂讲授并不是让学生听取和接受教授的研究成果，而是对同学们来说充满挑战的探索过程。教授常常以问题引出每讲课程，鼓励学生以批判性思维倾听他的观点与证据，提出自我见解。在LSE的课堂上，学生不再被动接受一个既定的理论观点，而是主动探索一个问题的多样化解答。

互通互助的讨论平台

课堂讨论环节作为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同样使学生受益良多。在课堂讲授部分结束之后，课程安排学生结合阅读文献和课上内容进行英文讨论。课程助教由在该领域具备良好学

术积累的学生担任，由浅入深地提出问题，组织同学们积极思考，逐渐发散思维，运用所学知识和实践经验提出自己的证据和观点。参与课程的同学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同一个问题，得到富有创造力和洞察力的见解。

课程的课堂传授以及学生的自由讨论，是不断激发学生主动思考，互相学习和成长的有机整体。在这交流过程中，外国学生往往从中国学生的口中了解到一个真实的中国；而中国学生也在交流之中体会到文化的差异。学生们带着不一样的故事和目的而来，在课程结束时，对于两所学校学术水平的认可以及对两所校园的喜爱却是相似的。北大－伦敦政经暑期学校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聚一堂，接受来自两所高校的前沿学术训练，增进对国际多元的独立思考和沟通理解，这也就是暑期学校对于学生，对于新阶段教育发展的意义所在。合

在这里汲取新颖开放的思维

——授课教师眼中的 LSE-PKU



柯成兴：打破经济的傲慢与偏见

翻译 / 胡万亨

“我从邓小平和李光耀那里学到的非常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他们做成事情的方式。实用主义总是比教条主义高出一筹。”

柯成兴 (Danny Quah) 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和国际发展学系教授。从 2009 年起, 柯成兴教授担任北京大学 - 伦敦经济学院暑期学校 (LSE-PKU Summer School) 暑期学校的委员会主任。柯成兴教授最近一直关注中国及其他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动向, 但最初, 他从事的是与美国国内问题相关的研究。这种方向性的转变来源于一份学者的责任感。

在他看来, 美国经济议题大部分都是传统经济学中很学术的问题, 因而美国国内许多重要的政策问题从中衍生。但他又给记者做了这样一个简单的计算: “美国可能有 2 亿人的劳动力, 如果我们谈论的是 4% 的失业率, 那么基本上我们是在谈论 800 万人口的福祉。而在世界上其他 50 亿人口所生活的国家, 发展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而这些贫困人口的一

大部分都在亚洲。当我们转向亚洲, 我们必须转向中国——一个使 6.5 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的国家。” 从纯粹的数字上的计算来看, 这是比较 800 万人口和数十亿人口的福祉。但同时, 也让柯教授深感经济学研究在其人力分配方式上的严重失衡。“我们选拔有天赋的人、培训他们宏观经济学概念, 给他们设定一些经济问题思考。” 从全球范围来看,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将基础知识应用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才是柯教授的理想。

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人员通过横截面回归来了解人均收入的动态, 进行增长和收敛研究。但是, 柯教授想让更多同学们明白的是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和对思维、情怀的桎梏。首先, 它忽视了局部对规模的影响。其次,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 在横截面回归或类似的分析中, 很反常的个别国家, 比

如新加坡和中国, 需要被排除在外。当我们都在追求一个理想化代表性经济体的模型时, 我们实际上忽略的是无数人切身的利益。于是, 一种综合性的对于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计算在柯教授手中诞生, 这是一种把总体 (平均指标) 和局部相结合的尝试。这种研究的结论显示出世界经济中心已经从大西洋中部被拉向东方。在过去的三十年里, 该中心已经向东部移动了 5000 公里, 相当于地球半径的四分之三, 而且这种变化还将继续。

“实用主义”对于研究经济权力转移这一主题非常重要。世界的经济中心的转变将打乱世界政治格局, 任何学术的研究都不能脱离了国际关系。柯教授预言经济学者将在未来不得不重新思考单极模型。他偏好思考宏观经济学如何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国际宏观经济学到国际关系领域

如何自然地过渡等问题。我们所理解的传统的国际宏观经济学通常是关于某国，或关于某国与另国关系的简单的双寡头模型。然而对于国际关系诸多问题的思考突破了这一视野，国际关系使经济学成为基于许多不同的、互动的国家的动态观察。当然，这一观念后来也在向着大国竞争、软实力、单极霸权主义、和平崛起、全球权力转移、帝国主义等问题的讨论转变。这些在经济学语言中都有明确的描述，但传统上一直更多地处于历史的视角之下，而并不为经济学家们研究现实问题所青睐，这样就造成了古典经济学维护正统和难以直接分析社会问题的二难困境。

基于此，柯教授利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观念研究经济问题时，非常强调实用主义——人类需要了解全球经济体中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

因为需要实用，所以经济学应该“更具有包容性，而不是被男子气概所驱动”。柯教授在暑期课程中的教授总是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即超越经济学的界限、整合其他学科特别是国际关系的理念。他认为新加坡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都是很实际的。他们会观察周围的事物，并进行试验以评估哪些政策是有效的。对柯教授来说，从邓小平和李光耀那里学到的非常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他们做成事情的方式。“实用主义总是比教条主义高出一筹。”

因而在经济学中整合其他学科的想法，实际上是在遵循实用主义。经济学是极其有力的一套观念，其中最核心的一套是他在观察周围世界时必须不断回归、强调的原则，也是他在教“经济学概论”课程的时候要讲授的内容。这是柯教授在多年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而并非师长传授，他也希望把这样积极活跃的研究态度传递给他的学生，“我希望我同我的学生一样，都不是那样的本质主义或教条主义的研究者。”

在他眼中，经济学界的教条和偏见有时候会堆积如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者被禁锢以至于以为分析一组问题的方法只能是一成不变的。在他看来这样的态度对理解这个持续变动的世界毫无裨益。

柯教授认为在 LSE-PKU 暑期学校教学对于他持续研究十分重要。“在中国的每一年我都学到了很多。与来自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学生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从内部视角来看事情，听取新鲜、开放、寻求理解的思维之间的辩论。”他鼓励更多优秀的大学生要特别积极地参与到这种国际化的讨论中来。

几十年前，一位商业周期分析的先驱者曾对学界做出了警示：“一旦你自己停止工作，只是去指导他人来校准和模拟你的模型，而从来不去亲自接触这个模型，那么你的知识生命就结束了。”这句话也给柯成兴教授留下深刻印象并成为

柯成兴 (Danny Quah)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和国际发展学系教授，兼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负责人。同时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教授。柯成兴教授曾经为马来西亚国家经济建议委员会成员并先后在英格兰银行、世界银行，新加坡财政部担任顾问，在麻省理工担任经济学副教授，哈佛大学经济学访问副教授，清华大学经济和管理学院的经济学访问教授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教授。柯成兴教授主要致力于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发展、货币经济、宏观经济和失重经济。

他一直坚持的原则。一个人一旦停止接触新的内容，无论他在多少篇论文上署名为团队领导者，他再也不会取得进步。对于柯教授而言，来中国观察第一手的现实情况并亲自参与这些辩论都是他保持自己对其研究领域熟悉度的学习。“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不可信。我的研究需要我这么做。”

在每年的暑期课程中，柯教授都会对自己的教案进行调整和创新，融合最新的经济动向。例如今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的成立就成为我们 15 年课程的重要讨论内容。首次开设大数据与统计学等技术分析方面一个非常热门的课程。同时，在具体的课堂内容上，城市化、国际法律、管理和财务方面的课程均对中国有明确而着重的关注。这也是暑期学校的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发展。这样的更新还有很多，无论事件本身有何意义，我们都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观察讨论，由此观之的全球权力结构转变。合





秦雪征：中国模式、新常态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在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多西方的经济学家并不同意中国渐进式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他们当时更加认可“休克疗法”的模式。事后证明，中国模式有自身的特点，同时也是成功的。”

当问及将课程重点设计为“中国模式”的思路缘起时，秦老师一直在强调“新”的问题。他认为暑期学校的学生需求可以分为两类：一部分学生希望今后从事学术研究，并以中国经济作为研究的题材；另外一部分学生希望到中国来进行商业投资，与中国开展国际贸易，因此希望从商业的角度了解中国。无论学生有哪一种需求，他们都需要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因此，他开课的初衷就是向他们介绍中国；另外，秦老师也指出“中国模式”在经济发展中的独特性。在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多西方的经济学家并不同意中国渐进式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他们当时更加认可“休克疗法”的模式。事后证明，中国模式有自身的特点，同时也是成功的。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十八大以来，我国

在国内经济、国际贸易与投资，以及外交等方面上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近期比较热的就是“新常态”这种经济模式。新常态有几大特点：第一是经济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第二是经济结构要有所调整、提升；第三就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要有所改变，要以创新、人力资本、社会服务等动力代替投资与出口。在这种背景下，秦老师将今年的课程设置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中国的经济转型与未来发展”（Sustainable Economics?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重点关注可持续发展。他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环境领域提的比较多，但其实这个词并不受限于环境经济学。比如，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为了提高消费比重、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和加速创新都需要一个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从长远来看，投资于人力资本、

秦雪征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外事助理。自2013年起，秦老师一直担任北京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暑期学校（LSE-PKU Summer School）的任课教师。

投资于社会服务基础设施等都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中国模式”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强调创新，强调绿色，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因此，今年课程将更多的新型经济增长模式纳入讨论的范围里来。

这样的课程设置也考虑了学生个性问题。对一些非财经类的学生来说，他们之前对中国经济的理解可能比较片面，课程可以帮助他们从历史的以及整体的角度把握中国经济；对于经济学双学位的同学来说，秦老师会引入 Ohlin 模型和比较优势的计算等经济理论，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贸易逆差背后的理论根源。非经济与经济专业的中国学生都能从这门课程中找到自己需要的部分。

无论是从学术上，还是实践上，学生都很有必要从整体上掌握“中国模式”的思路，消解误读，深刻认识它的宏观战略以及微观执行。合

互联互通的学术平台

——学生眼中的 LSE-PKU



IR203 课程同学，第二排左三为本文作者

计明洲

国际关系学院 2011 级本科生

转眼间，2015 年北京大学 -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暑期学校已经开放申请。翻阅着项目手册里领域广泛而又各有专攻的课程信息，我好像又回到了去年八月，聆听教授讲课、同学间讨论攀谈的场景——浮现在我的眼前。

每一天都是新的探索

北京大学 -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暑期学校的课程老师全部来自这两所高校，因此它的课程设置和要求兼具北大的教学特色，同时也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授课风格。我在暑期学校中选择了 Michael Cox 教授的 Power Shift?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这是一门全英文课程，教授围绕着“权力转移”这一观点分析 21 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对我来说，这门课最具

吸引力的地方在于，课程标题之中的小问号（Power Shift?）——既意味着这是一个在学界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也暗示它将是我们的课堂讨论的起点。

暑期学校的内容设置紧凑而张弛有度，课堂时光紧张而充实。短短两周时间里，我们不仅要阅读两本厚厚的英文材料作为课前准备，而且要对教授上课所讲内容进行消化理解。除去双休日两天时间留给我们写作课程论文之外，其余的每一天，我们都要接触一个在 Power Shift 主题之下的新话题：中国正在崛起吗；为什么美国的地位可能并没有下降；如何批判地看待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所谓“亚洲的世纪”等等。话题之多、内容之丰富有时竟会让我们感到

有些应接不暇。不过，探索的过程并不乏味，相反却充满挑战。因为习惯以问题开始每讲课程的 Cox 教授，常常鼓励我们在倾听他的观点与证据时，主动反思并提出自我见解。如此一来，我们不再被动接受一个既定的理论观点，而是主动探索一个问题的多样化解答。

现在回想起来，真正使我受益良多的是课堂讨论环节。在上午学到新知识后，课上的三十几位同学被分成



轻松有趣的讨论环节

两个小组分别进行英文讨论。讨论由助教组织，从自由回答她所提出的问题开始，逐渐发散开来。这些平实而接地气的问题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话来说：有的同学在下课前做足准备，结合课前阅读材料和课上内容谈起自己对金砖国家的独到见解；有的同学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大家讲述印度城乡的发展与变化。不同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让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同一个问题，所得到的见解当然也就异彩纷呈并极富创造力。这是一个大家互相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外国学生往往从中国学生的口中了解到一个真实的中国；而中国学生也在交流之中体会到文化的差异。

我愿倾听你们的故事

好多不同个性的人，从不同的地方走过来，只为了在这两周时间里共用一间教室，共读一本书，一起在一个天气好的下午，为了一句会心的话，哄然地笑一次，然后，再逐渐分开，逐渐走向不同的地方，回到各自的生活轨道。“同学”是不是就是如此了呢？

我想“同学”之于我们，远不止此。

我所在班上的同学来自不同国家的各行各业。他们之中，有的正在国外读大学，希望利用暑期学校的机会走近中国，体味这里的风土人情；有的已经参加工作，希望暂缓自己的脚步重回校园充实自己，以备回到职场重新出发。无论带着怎样的目的相聚暑期学校，我们都十分珍惜这次交流学习的机会，愿意倾听彼此的故事。我还记得有一位正在杭州上学的美国姑娘，她曾经亲赴西藏感受中国，用自己的相机和笔记录下她眼中的美丽城乡。还有一位正在英国读研的中国



留学生，他在结束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暑期项目之后便来到北京参加北大－伦敦政经学院暑期学校。当我问及LSE-PKU Summer School的特色之处时，他说暑期学校专业而高水准的课程内容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极富英国风格的讨论方式又给了他隐约的熟悉感，仿佛回到英国大学校园。

每个人都带着不一样的故事和目的而来，因此在课程结束时的心境与收获也各有不同。尽管如此，我还是能够体味到同学之间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对北京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术地位和水平的认可以及对两所校园的喜爱和向往。而北大－伦敦政经暑期学校就是这样一个平台，它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聚在一个教室里，接受来自两所高校的专业学术训练，分享自己的文化经历和心得体会。从此，Summer School的IR203课程就成为我们三十几位同学的共同记

忆。当我们回到各自的生活轨道时，偶尔会发现书中的一句话有着Cox教授某一观点的影子，身边的同学也会在将来的某个角落里重新相遇，聊起2014年暑假课堂上的一段插曲。我想，这大概才是“同学”对于我们所具有的特殊含义。

两周时间无疑是短暂的。课程结束时，班上的同学纷纷感慨时间过得太快，收获很多而意犹未尽。“结课卷子上的问题又怎足以写下这几天以来的成长呢？”对我来说，北大－伦敦政经学院暑期学校带给我的绝不仅限于学科知识的积累和英语能力的提升。它让我收获到自信和主动探索的勇气，学会用更加包容的心态看待学业和生活。而暑期学校中特有的“英式风格”也使我愿望着，我的生活里能够有LSE更深的印记。说到这儿，我不禁对未来充满着期待。合



图本文为作者与暑期学校教授 Michael Cox 合影

在 2013 年的八月，我担任了北京大学 -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暑期学校的课程助理。39 个小伙伴，17 个国家，短暂而快乐的 14 天。

我还记得每一天的早晨，看着我的同学们一一走进课室，兴奋地跟大家分享他们各自在北京的新发现，新感受：在北京看到的风景，在北京品尝过的美食，在北京新认识的朋友。我看着 Professor Cox 每次课前都要跟大家讲几个笑话，我看着课堂上大家认真地做笔记，我看着这些好玩又有趣、聪明又刻苦的孩子的阅读材料上各种不同颜色的标记与满满的笔记。

我还记得每一个下午的 seminar，老师、同学围成一圈，激烈地展开讨论，我记得来自瑞典的 Sebastian 扮演中国的总理，带领各位由法国同学、比利时同学等不同国家的同学扮演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讨论虚拟的边界冲突的应对方案。我还记得短短的两小时的 seminar 仍不够，意犹未尽的我们在泊星地咖啡厅将几张桌子拼成一长桌，继续我们的讨论。我还记得，即使在咖啡厅两小时的讨

论仍不能使各位同学将其对“欧盟发展”、“中日问题”、“美国外交”等问题的讨论画上一个句话，我们又将“seminar”搬至晚餐，讨论在美味的生煎包香味里延续。

我还记得在去往长城的大巴上大家各种搞怪的自拍与合照，在攀登长城的途中大家相互的扶持与玩耍，在归来的路途中大家累得在车上呼呼大睡被偷拍。

我还记得在 Farewell Party 上大家的合照留念与不舍，在 KTV 里畅快的 K 歌与喧闹。我还记得，分别的那个夜晚，我们说好了“再见”，就真的在尔后的日子不断地重逢与相遇。

我不想去重复地告诉你这个暑期学校有多棒，课程有多欢乐，教授有多赞，同学们有多优秀和好玩。我只想告诉你们有这么一个夏天，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们聚在了北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并在尔后的日子仍一起成长，一起分享

张灵

国际关系学院 2011 级本科生，曾为 2013 年第 10 期北京大学 -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暑期学校课程助理。现已被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专业录取。

彼此生活的点滴。尽管相识只有短短的 14 天，但却使我们舍不得在彼此的将来抽离。它让中国的孩子注册了 Facebook，让外国的小伙伴玩起了微信。它让你在大年三十的夜晚收到不同语言的祝福。它让你在看到阅读材料时会想起在咖啡厅的种种讨论与辩论。它让你在再次吃到生煎包喝啤酒时会有不一样的幸福与甜蜜。它让你觉得在那两周的每一个日与夜都是那样的弥足珍贵。

我在 2013 年的暑期学校认识了一个德国女生。2014 年，她再次来到了 LSE-PKU 暑期学校。我想，这就是对 LSE-PKU 暑期学校是否值得你参加所作的最好注解。合



2013 年暑期学校 Michael Cox 教授班上的全体同学

“上一个时代，我们期待世界能够走进来；而这一个时代，我们应该自己走出去。”

“一日北大人， 终身北大人”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一行
来访北京大学

文 / 冯子涵

2015年5月4日下午，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问北京大学，并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师生座谈。中国国民党副主席黄敏惠，中国国民党主席特别顾问、大陆事务部主任高孔廉，中共中央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陈元丰等陪同来访。此次朱立伦主席来访正值北大117周岁生日，在这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陆之行中，朱立伦主席一行首先在英杰交流中心与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会面，随后又前往光华管理学院与师生座谈。在短短几小时的交流活动中，朱立伦回首往事，与旧友共叙“北大情结”；展望未来，与青年大谈“机遇挑战”。他幽默风趣的言谈，对两岸交流的密切关注，以及对青年学子的点滴关心，都给在

场来宾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一段北大佳话。

故地重游

“来北大是回家”

这是朱立伦第三次来到北大，也是他首次以国民党主席身份来访。二十年前，他曾作为来自台湾大学的一名客座教授来到北大，在光华管理学院为1994级本科生教授了一学期的财务会计专业必修课程。十七年前的五月四日，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朱立伦先生又作为台湾大学管理学院代表，与台湾大学的嘉宾一同来到北大进行访问，并且在光华管理学院大

楼门前剪彩，一同庆祝光华管理学院新楼的落成。十余年后再次回到北大，燕园里的一草一木，都让他倍感亲切。虽已完成了身份的转换，他却仍将自己视为一名普通的老师。正如原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王立彦教授所言：“来北大是回家”。他的此次故地重游，称得上是一次回乡之旅。

回想起二十年前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点点滴滴，朱立伦当年的同事和学生依旧印象十分深刻。在短短几个月的任教时间中，他在燕园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回忆。朱立伦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总是认真地写着繁体的板书；他的课堂作风十分民主，强调“师生治学”，提倡让学生在互动中成长，因此，课堂气氛总是活跃热烈，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重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并与师生座谈

他讲学风格幽默风趣，在课堂上讲述的许多“段子”，时至今日他的学生也能复述出来。朱立伦的个人魅力，深深地吸引了1994级的本科生同学，每每上课，教室总是“爆满”。

谈及二十年前的燕园旧事，朱立伦顿时滔滔不绝。他说：“那时的北大同学上课前就会把课本读三到五遍，非常认真、非常努力。”他仍然记得，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燕园学子的求学之路单纯朴素。那时候，同学们很少在教科书上写写画画，上一级同学用完的书，又接着传给下一级接着使用；那时候，同学们的生活都十分节俭，一个馒头就是一顿晚饭。二十年里，北京大学及其周边也发生了重大变迁。朱立伦印象中的中关村，还是书店、小旅馆、小餐馆林立的地方，而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变成了中国的高科技重镇。那时他居住的勺园，周边的街道，也已是沧海桑田。

在同事和同学眼中，朱立伦老师亦师亦友，是个爱护学生，和同学打成一片的人。1994级校友马越回忆到，那时朱老师常常请同学们一起吃饭，在校外“打牙祭”。她说：“在吃饭时，朱先生也讲诗和远方，也讲很多的笑话”，这些无疑都成为了她和同学们人生中难忘的回忆。朱立伦则说，他也很喜欢和同学们一起吃饭，到别的老师家里包饺子。那时候，同学们常带着他游览北京城。近至圆明园，颐和园，远至长安大街，都留下了他和同学们并肩走过的身影。甚至，同学们还与他一起去琉璃厂买古董，帮他“杀价”。这些温馨往事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光阴荏苒，朱立伦依然保持着他平易近人的学者本色。谈起得知朱立



朱立伦与北大校长林建华（右）在座谈会上

伦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的消息的那一刻，时任1994级班主任黄慧馨表示，她“又惊奇又激动”，有一种邻家兄弟成为大人物的感觉。而回到燕园的朱立伦，也对“老师”这个称呼青睐有加。他说：“在学校里，老师的称号是至高无上的。”以一名普通老师的身份再次来到燕园，这注定是一场满怀灿烂回忆的“回家之旅”。

两岸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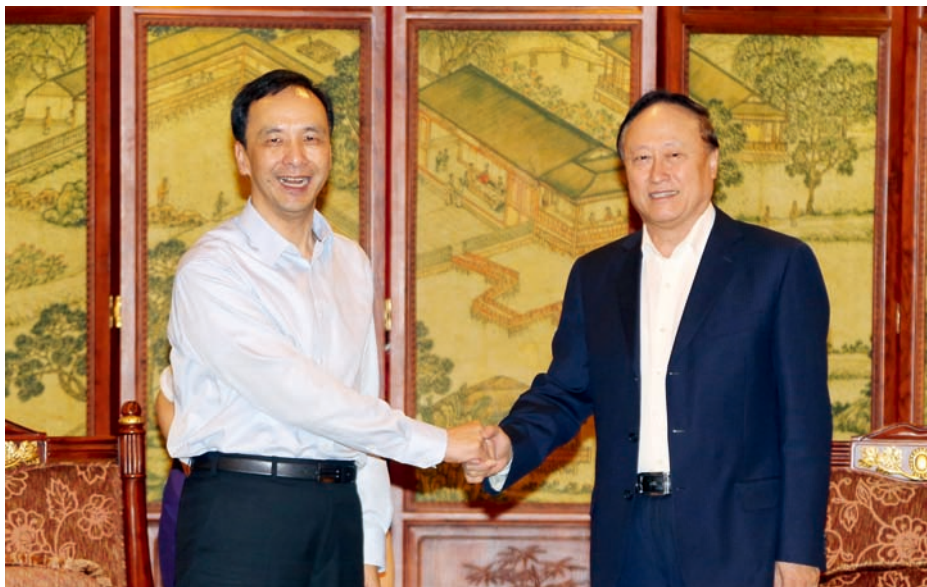
“友谊地久天长”

海峡两岸的交流问题，一直是两岸学子非常关心的话题。为了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和人民的共同福祉，两岸学生在多领域、全方位开展更多的交流合作势在必行。朱立伦从很早开始便一直致力于推动海峡两岸的合作交流，他关注北大建设发展，推进台大与北大的交流，并且多次接待了北大的交流访问团。他不仅是两岸青年

交流的见证者，更是领路人。此次，朱立伦主席访问北京大学之中，也表达了对海峡两岸学子合作与交流问题的深厚关切。

曾经在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两所学校都有任教经历的朱立伦先生指出，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的精神是极为契合的。北大校长傅斯年后来曾经担任台湾大学校长，并深刻影响了台大人的学术风气和精神品格。作为两岸高校中的杰出代表，两校有着共同的精神气质和学术追求。朱善璐书记指出，北大近年来与台湾各高校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合作，其中以与台湾大学的合作最为密切。两校在教育、科技、文化等众多领域达成了合作共识，形成了战略框架协议，紧跟世界潮流，同做华文“慕课”项目的领路人。朱书记也希望，在海峡两岸日益紧密的联系下，两岸能够有更多机会交流，让学生之间建立更深厚的感情。

在北京大学，海峡两岸教育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座谈会上，林建



北大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右）欢迎朱立伦主席来访

华校长指出，北大是最早面向台湾地区招收学生的高校之一。早在1979年，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台湾学生，也一直十分欢迎台湾学子来北大求学，而在1994年光华管理学院成立之初，两岸便开始了广泛的商学教育交流活动。其中，最早的交流活动便是从会计专业开始。谈及这些交流往事，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王立彦教授说到：“二十年前，这些老师能在较为艰苦的教学条件下来北大授课，并且一上就是几个月，真的非常不容易。”目前，共有468名台湾学生在北大攻读学位，每年还有近百名台湾交换生在北大交换学习，两岸交流合作成果初现。

近年来，两岸交流活动越发频繁。北京大学也与台湾各高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在光华管理学院的“状元营”交流计划，“北大—台

大—云大学生社会服务计划”等活动中，燕园学子与台湾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曾经参加过光华管理学院“状元营”计划的高煜丰回忆到，朱立伦先生曾经多次以老师的身份参加过“状元营”活动，亲自接待来自北京大学的同学。谈起那段愉快的时光，高煜丰坦言，那次活动中的点滴回忆，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朱善璐书记也回忆起他去年访问台大时，见过的那些参加“北大—云大—台大学生社会服务计划”的同学。他提到，那些同学回忆往日活动时，眼里都含着泪花，非常感动。

对于未来的两岸交流，朱立伦先生和北大的老师都有着共同的期待。两岸高校的老师均表示，希望今后两岸高校能够在学术上有更多的交流。来自台湾的光华管理学院金融

朱立伦

生于1961年，台湾桃源县人，中国国民党主席，新北市市长。曾任桃园县县长、国民党副主席、“行政院”副院长等职。曾任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助理教授，台湾大学副教授、教授；台当局“陆委会”咨询委员；“经发会”财经组质询委员；证券上市及上柜审议委员；高普特考典试委员。1995年，曾以台湾大学副教授的身份，到北大进行短暂的交流访问。1998年，他作为台湾大学代表之一参加北京大学百年校庆。2015年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系主任刘玉珍老师说到，“朱老师当年到北大教书，给我们来北京工作很大的启发”。当前，台湾和大陆在经济金融等领域面临着相似的发展状况，而大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在国际上也受到了瞩目。两岸在学术科教等层面的交流，对于学术的创新与发展都有着巨大的帮助。朱善璐书记也表示，希望未来北京大学与新北市能有更好的联系，开展更加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延续北大与台湾友好交流的悠久历史，续写更深厚的情谊。

展望未来

“为下一代而努力”

“缅怀过去，展望未来”是朱立伦一行此次来访北大的重要主题之一。他在北大举办的欢迎座谈会上表示，二十年的光阴恍若一眨眼就过去了，世界变化非常之快。大陆平均国民所得二十年前只有每人625元，到现在，国民的实际购买力已经超过一万元；而台湾的政治经济，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朱立伦表示，针对未来二十年的产业变化和市场经济走向，如今学术界正开展着激烈的争论，提出了很多论辩和看法。而他此次重回校园，也想和大家一起研究，探讨怎样才能达到全民共同发展的目标。

谈到中国现在面临的问

题,朱立伦也有着自己的见解。他指出,中国大陆经济兴起已是事实,怎样转型是现在的大陆所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近来一直在思考的社会公平、正义与民主的问题,与青年息息相关。朱立伦指出,过去我们在经济发展上片面地关注成长率,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但现在,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公平与正义的问题。他坦言,“怎样让社会达到富而且均”,已经成为社会重要问题之一。他也在努力为实现这一目标,造福青年一辈而不懈努力。

朱立伦此次来访大陆,表现出了对青年的高度关切。作为国民党主席,在谈起自己的政治理想时指出,他的努力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他殷切地希望“不但自己的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并且下一代会比这一代更好”,并且为下一代的幸福持之以恒地努力着。而作为一名老师的他,也有着众多老师的共同期盼——希望学生能够超越自己,希望青年们能够取得更为出彩的成就。

在师生交流环节,朱立伦也热情地回答了两岸学子提出的问题,给予他们一些人生的箴言。针对同学“如何决定自己的事业?从哪里开始自己的追求?”的问题,他表示:“人生就一点一滴积累,每件事都会充满美好的回忆。”他以自己为例子,提到自己本是一个幽默的人,却做了政治这样严肃的工作。这便是他为实现公平正义,为实现人民共同福祉而做的努力。谈及时代变化,朱立伦指出:“上一个时代,我们期待世界能够走进来;而这一个时代,我们应该自己走出去。”他表示,机会在全世界,世界之大,希望大家去闯。而他也会

通过日益发达的全球网络,密切关注着两岸青年在各地的矫健身姿。

而面对同学在众多学术研究、出国访学机会之间的犹豫——“想要体验更多,又想尽早定下发展方向,如何确定抉择的时机”的问题,朱立伦也鼓励青年果断而勇敢。他说到:“年轻就是资本,年轻的时候愿意闯一闯,愿意到各处学习,都是机会。下定决心,就勇敢去做,勇敢去闯。”朱立伦的一席话,让在座学生受益匪浅;而这字里行间,都是对青年学生的关切与

鼓励,是他永远的“老师情怀”。

“一日北大人,终身北大人。”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先生对北京大学怀着深厚的情感。此次大陆之行,朱立伦主席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北大访问,并与师生代表共叙旧情,畅谈理想,为北京大学117周年校庆增添了光彩。我们也由衷期待他所代表的北大人的精彩表现,能够为海峡两岸交流开启崭新的篇章。合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王立彦教授(左)与朱立伦亲切交流

独家

策划

SPECIAL REPORT



独家策划

▼ 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
来访北大并发表演讲

▼ 构建更加和谐的世界秩序

——安南北大演讲会精彩回放

▼ 卸任十年，再赴燕园

——科菲·安南印象

科菲·安南

改革者眼中的战争与和平

尽管已经卸任联合国秘书长之职近 10 年，但当科菲·安南出现的时候，他依然被认为是一位“不需要介绍”的人物。2015 年 4 月 21 日、22 日，作为科菲·安南基金会的主席，安南到访北京大学，入选“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Peking University Global Fellowship），与北大学者和学生座谈，并发表了以“构建更加和谐的世界秩序”为题的演讲。即便已不再亲自斡旋于风云际会的国际舞台，但安南有关国际秩序、中国和青年议题的见解，依然吸引了“挤满一屋子”的学者和青年学子侧耳聆听。



科菲·安南做客“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并发表演讲

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 来访北大并发表演讲

文 / 国际合作部 北京论坛秘书处

2015年4月21至22日，联合国前任秘书长、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科菲·安南基金会主席科菲·安南（Kofi Annan）一行到访北京大学，展开对北大的访问和交流活动。安南先生高级顾问拉明·西塞（Lamin Sise），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高级官员温佐（Zaw Win）陪同到访。

安南此次到访，是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和“北京

论坛系列高端演讲”的邀请，与师生座谈并发表演讲。“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设立于2012年，旨在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邀请各领域杰出人士和学术大师来校举办讲座、开设课程、合作研究等，增强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综合竞争力。迄今为止，已有包括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弗朗西斯·福山、王赓武在内的近20位学者入选。同时，“北京论坛

系列高端演讲”围绕“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的总主题，近年来已成功举办包括乔姆斯基、霍米·巴巴、迈克尔·桑德尔、傅高义等知名学者在内的演讲会。

4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在临湖轩会见了安南一行。柯杨对安南第三次访问北大表示热烈欢迎，她回顾了安南先生与北京大学之间的深厚渊源。早在1998年北大

百年华诞之际，安南就曾发来贺信，并委派代表前来祝贺。2004年，首届北京论坛召开之际，他又委派当时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约瑟夫·里德（Joseph Reed）携其贺辞亲临论坛。2006年，安南在他联合国秘书长任期即将结束前，首次访问北京大学，当时的演讲就曾引起知识界和社会公众的广泛讨论。2009年，安南又以联合国基金会董事的身份访问北大，与北大学者和学生进行了深入交流。柯杨感谢安南此次来访与北大师生分享他数十年来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和睿智观察。她

还将安南2006年访问北大时的照片赠送给他作为纪念。

随后，安南与北京大学学者和学生代表围绕“世界秩序的几个要点”（Some Key Points in the World Order）进行座谈。座谈会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袁明教授主持，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傅军、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王培玉、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安山、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吕植以及历史、法律等领域的学者代表和来自北京大学学生模拟联合国协会、北京大学学生国际交流协会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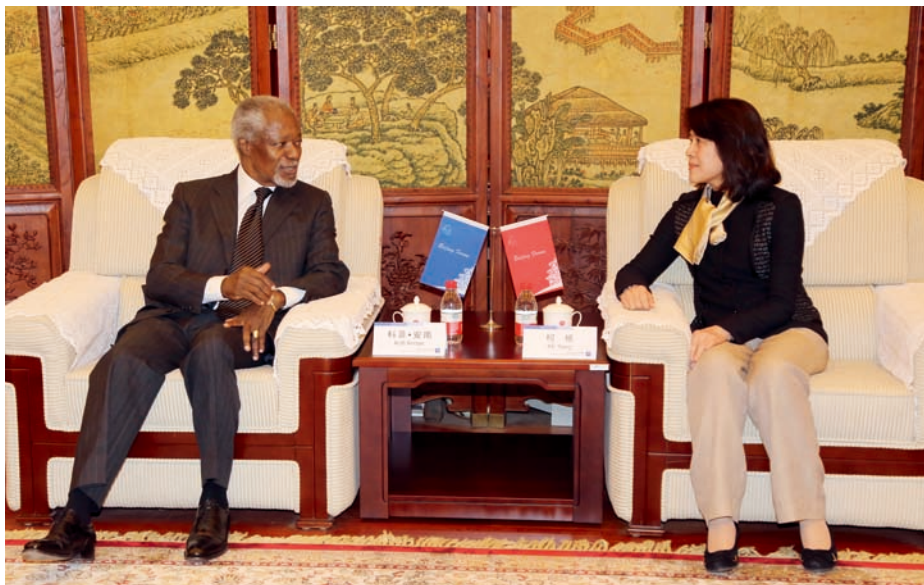
科菲·安南 (Kofi Annan)

1938年4月8日出生于加纳的库马西，是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也是出身联合国工作人员行列而当选的第一位秘书长。早年就读于加纳库马西理工大学，曾到美国和瑞士留学，先后获美国明尼苏达州麦卡莱斯特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通晓英语、法语及非洲多种语言。2001年，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与联合国一起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座谈会上，安南首先从个人经历出发，谈到近年来世界面临的巨变以及联合国为应对挑战而所作的努力。与会教授随后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兴趣，分享他们对当前世界秩序的看法，同时与安南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涵盖了全球治理机制的改善、中国在构建新秩序中的角色、非洲发展的前景、极端主义威胁的应对、青年领导力的培养等议题。安南结合自己在联合国工作多年的丰富经验，以及卸任后调解国际争端的经历，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强调了各国政府提升自身能力、加强国际多维度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同时他也表示，目前解决这些问题还存在着诸多困难，有待国际社会更多的合



北大校长林建华向科菲·安南颁发“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铜牌



北大常务副校长柯杨会见科菲·安南

作与努力。最后，作为未来世界秩序的塑造者，几位学生代表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安南回答了学生代表的提问，并表达了对北大青年学子的勉励和祝福。

4月22日上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会见了安南一行。朱善璐欢迎安南再次来到北大，同时感谢联合国对北京论坛的关心和支持，希望有机会邀请他出席今年北京论坛。安南表示，很荣幸受邀作为“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和北京论坛系列高端演讲的嘉宾，他对与北大师生的交流座谈印象深刻，学生的提问体现出21世纪青年对于国际事务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关注和思考。他表示，有机会一定常来北大，也希望北京论坛越办越好。最后朱善璐代表北京大学向安南赠送联合国邮政署、北京论坛和中国集邮总公司

联合发行的纪念邮封。

当天下午，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英杰交流中心会见安南，并向其颁发“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铜牌及证书。随后，安南作为“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学者，以及北京论坛系列高端演讲嘉宾，在阳光大厅发表了题为“构建更加和谐的世界秩序”（Towards a More Harmonious World Order）的主题演讲。演讲会由袁明教授主持，300余名北大师生到场参加。

在演讲前的致辞环节，林建华表示，安南怀着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注，重视大学发展与青年成长，并在此过程中，他与北大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10年中，安南为消除贫困、制止冲突和促进民主作出的重要的贡献，值得国际社会感谢

安南1962年进入联合国工作，先后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工作。1997年安南先生当选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并于五年后连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是公认的联合国历史上最富有改革精神的秘书长。在任职的八年中，安南一直在不懈地推动联合国改革进程，致力于将这个声望下降的庞大机构改革成为能够应对新时期新挑战的卓有成效的权威国际组织，赢得了全球广泛尊重。

和铭记。

演讲中，安南首先提到，中国与非洲在古代都有关于“和”的箴言，证明自古以来“和谐”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常常被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迷失了双眼。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门艺术，在联合国工作的几十年中，安南对其中的艰辛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认为，和谐的根基有三：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和兼容性的发展以及人权与法治。这三者共同为社会的和谐和繁荣发展奠定基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与非洲之间合作与往来日益丰富，双方都希望世界整体的格局是和平稳定的。最后，安南总结说，当今的世界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财富和权力不再是特定地区的特权，无论是国家、地区和机构都应该适应这种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其在国际事务中重新处于中心的位置，坚持和谐社会构建的三个基础，中国将会在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提问环节，北大的中外学生围绕气候变化与技术转移、维和行动得失等关心的问题，与安南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据悉，在此次访华行程中，安南还出席了他的两本著作中译本的新书发布会，分别是《安南回忆录——干预：战争与和平中的一生》及《安南演讲集：我们人民：面向21世纪的联合国》，并接受了央视国际频道“对话”栏目的专访。



构建更加和谐的世界秩序 ——安南北大演讲会精彩回放

谈 “和平与安全”

首先，和平与安全，没有和平与安全，没有秩序可言。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鲜有和平时期。几十年来，世界大国之间没有战争。人类平均寿命在增长。大体上说，我们不会像祖先一样死于战乱冲突。尽管有这些进步，但我们的生活仍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世界局势日新月异。在西方，2007至2008年金融体系的崩溃导致了金融危机。这场

“大体上说，我们不会像祖先一样死于战乱冲突。尽管有这些进步，但我们的生活仍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世界局势日新月异。”

金融危机加剧了阿富汗和伊朗的战争局势，也加剧了乌克兰国内分裂势力的冲突。同时，像中国、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也恢复了在世界事务中的历史地位。现在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购买力经济体。亚洲大陆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大陆，也承载着世界一大半的人口。这些财富和人口上的发展变化，将对地缘政治造成及其深远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的是，如果我们要应对这种变化的国际局势，国际合作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发展变化也为亚洲各国带来了挑战。

亚洲国家在自身和平与安全领域也面临着很多威胁：

- 1) 民族主义的复活；
- 2) 种族和宗教的紧张局势；
- 3) 领土争端，包括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
- 4) 军备竞赛。

这个时期的变化充满了风险，必须谨慎应对，需要解决问题的智慧和对方利益的协调。

谈 “可持续发展和兼容性发展”

和谐世界的第二个根基是可持续发展和兼容性发展。全世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已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多



的财富，在此过程中惠及了几十亿人民。但是，我们必须引起注意的是，经济的发展是以社会和环境的牺牲为代价的。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身处挑战中心的中国，在过去的三十五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有如此迅速的发展，让大量的人民脱离贫

困。通过原材料进口和国际投资贸易，中国也帮助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其中很大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来自非洲大陆。实际上，通过国内经济发展，减轻贫困，和对世界发展的影响，中国对联合国千年发

展目标的实现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是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后果：收入不平衡，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严重的收入不平衡国家之一；污染，对环境和公共健康产生了严重后果。幸运的是，中国也采取了措施来应对这两方面的问题。这点很关键，因为要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经济增长必须惠及人民，经济发展必须保护环境。

“非洲有一句谚语，是说智慧就像一颗猴面包树一人多智广。我解释一下猴面包树吧，猴面包树枝干粗壮，一个人无法环抱起来，几个人围起来，才能把树干环抱。像中国这样文明古老的国度在这方面肯定获益良多。”

谈 “人权与法制”

现在讲第三大根基——对人权的尊重和法制。国际关系经常是一场国际法律和强权政治的博弈。一个

世界法律规则体系的建立对世界秩序的维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得到全世界认可的。实际上，最近几十年一直存在的问题是很多国家都只是选择性地遵照和执行国际法律。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有一个误解，认为人权是西方国家的特权，人权是以牺牲发展为代价的。但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谬论。

1948年，联合国大会宣布《世界人权宣言》应作为全世界所有民族和人民关于人权的共同标准。我们不难发现，那些不尊重人权的国家和组织，或者那些人治高于法制的地区，都不太和谐。在长远看来，这样的政权也是不堪一击的。

非洲有一句谚语，是说智慧就像一颗猴面包树一人多智广。我解释一下猴面包树吧，猴面包树枝干粗壮，一个人无法环抱起来，几个人围起来，才能把树干环抱。像中国这样文明古老的国度在这方面肯定获益良多。

演讲会提问环节实录：



66

年轻人的可贵的品质就是不放弃、不后退，总是采取行动向前进的。对于年轻人我想说，年轻从来不会成为你们承担责任、担任领导者的阻碍。

99

Q：青年人对“领导力”这种品质常常感到好奇而迷茫。您印象最深刻的与青年人的对话是什么？

A：我的确跟很多青年人交谈过，不时会从他们那里听到很多富有创造力的提问或观点。经常人们会问我应该怎么做才能一步一步地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我想不断改进自己的错误，向自己的朋友学习也是好方法。还有年轻人问我关于领导力的问题，在闲暇时间组织活动，很重要的就是要采取行动，年轻人的可贵的品质就是不放弃、不后退，总是采取行动向前进的。对于年轻人我想说，年轻从来不会成为你们承担责任、担任领导者的阻碍。

Q：我们知道今年是二战结束的70周年，我想请教，您认为保持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政治体系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害国有什么意义？

A：我从来没有表示支持维持这个战后的国际秩序，这个国际秩序，众所周知是在二战后建立的，我们需要改变，是的它确实拯救了这个世界，但是如今时代变了。我想起了我之前在联合国提出的改革，6周后有人在“纽约时报”上抱怨说我们在

过去的六个星期里并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改革。我觉得6周的时间是有限的。俄国的一个外交官对我说：“上帝造世界只要了七天，你还有六周，所以你比上帝拥有更多的时间来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我只能回答他，说“上帝比我拥有一个独特的优势，他可以独自一人完成工作”（指上帝不必在众多国家间斡旋，而他很难获得其他国家的合作）不过，重要的是向前看。全球各国需要合作，建立和谐的关系。

Q：您一直以来主张一支常备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请问在您的构想中，这种部队和目前的维和部队应当有哪些区别？它将如何协助构建更和谐的世界秩序？

A：这是个好问题。这是我们联合国一直以来非常纠结并付出很大努力的事务。我过去主管了几年的维和行动。很多情况下，由于联合国没有自己专属的维和部队，调动部队需要经过安理会授权和主权国家的配合，首先这不一定得到通过，即使通过了，当维和部队被派遣到位的时候，我们所要处理的事态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控制。

我在此与你分享一下我们在维和事务上遇到的一些困难，在我主管维和行动的那段时间，我们通过了一个关于后备维和部队的安排计划。我们要求各国政府在出现危机时能够即刻贡献各方面资源，比如工程队、直升机、医疗设施等等。在1994年，卢旺达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此时我们开始检验这项安排计划是否有效，但事实很快让我们大失所望。说到建立常备维和部队，也存在相当多的问题，比如资金支持、部队规模应该多大、在哪里驻扎、执勤周期是多长、在哪些人当中遴选、谁来指挥……所以维和事务有非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主权国家更希望维和部队维持后备部队的性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人数过少、资源匮乏，远远不及我们的需求。拥有常驻的维和部队，我们维和力量至少在数量和机动性上会有所提升。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除此之外，我们能期待的是另辟蹊径，通过其他方式构建和谐的世界秩序，尽量终止、防范世界各地的冲突和不稳定，从而减少和消除那些需要使用更多维和力量的场合与危机。合

卸任十年，再赴燕园

——科菲·安南印象

文 / 陈靖夫

十年前，在他联合国秘书长第二任期还剩两年，科菲·安南（Kofi Atta Annan）先生到访中国，被学生问及在任期届满之后有什么打算的时候，他回答说“也许我想做个农民”。2015年4月，从秘书长卸任近十年的安南先生以科菲·安南基金会主席的身份，作为“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受邀者以及北京论坛系列高端演讲嘉宾，再次到访北京大学。在三天的访问中，安南先生参加了与北大师生的座谈，出席了中非民间商会的欢迎晚宴与《安南回忆录》中文版的首发仪式，并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发表了演讲。通过安南此次北大之行，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卸任十年来真正做了什么。

回到非洲做农民

离任前，安南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他想在结束联合国秘书长任期后回到非洲，做一个“农民”。在他卸任后刚回到加纳故乡时，安南在同时任加纳总统的约翰·库福尔会谈时曾表示：“过去印度和中国都遭受过饥荒的肆虐，但现在这种状况已经好转，在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我想要致力于联合国国际多方的力量将非洲的农业水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当然，躬亲垄亩并不能发挥这位前联合国秘书长对非洲农业发展的全部价值，而他的政治影响力才是推动非洲农业发展的关键。

在安南眼中，基础设施的不完善是非洲农业发展的重大阻碍之一。由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非洲一方面占据着全世界 60% 的未开垦土地，而另一方面，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每年却需要花费 350 多亿美元来进口粮食。在与北大师生的座谈会上，和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安山教授讨论要如何平衡“非洲的问题，非洲自己解决”的地方主义口号和呼吁全球治理的国际趋势这一问题的时候，安南认为，让非洲人民能够在粮食问题上做到自给自足，并减少对进口粮的依赖，这才是他所认同的“非洲的问题，非洲自己解决”，而在这一过程中并非要拒绝与外国的交流。

2007 年，刚离任秘书长职位的安南成为了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lliance for a Green Revolution in Africa,

AGRA）的董事会主席。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 2006 年成立，该联盟拥有一个涵盖了非洲政商领导人以及农业和经济发展领域专家的董事会。非洲绿色联盟希望在非洲农民、政府、农业研究组织、私营部分和非政府组织之间扮演催化剂的作用，通过吸引投资来提高非洲的农业设施水

“我有幸获得了这样一段几乎无人有过的经历，因此，我有义务将它与公众分享，尤其是与学生们，以及其他学术领域的人们分享。”

平，从而促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非洲粮食体系，并由此提高非洲的农业生产力和农民收入。在领导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的七年时间里，安南真正地履行了他“回到非洲做农民”的诺言。根据非洲绿色革命联盟发布的成果报告，这个组织在 2007 年到 2014 年之间，共让来自 16 个非洲国家的约 1530 万农民用上了非洲绿色革命联盟所支持的种子公司提供的优质粮种，而这些种子公司在这期间共计生产并销售了 34 万多公吨优质粮种。受益的农民们在这些种子的帮助下，成倍地提升了他们的粮食产量，也因此显著地提高了他们的收入。

2013 年离开时，安南表示他会继续支持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的工作，并将鼓励私人公司，鼓励非洲乃至世界各国政府来共同助力非洲的农业发展。在此次北大之行的第二天晚上，安南出席了中非民间商会为他举办的欢迎晚宴，并在那里发表了讲话，鼓励中国企业家投资非洲发展。他告诉在场的中国企业家，非洲的农业潜力是巨大的，因此非洲应该能在农业方面自给自足，而非洲农业却受到了能源开

发不足和基础设施缺乏两个问题的掣肘。“如果非洲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非洲的经济就可以腾飞。”他说。

四十载联合国服务成就的回忆录

1962 年，24 岁的科菲·安南作为预算干事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由此成为了联合国系统的一名官员。本来认为自己在这里干个两三年就会另谋他处，但没想到这一干就是 40 多年，而且一路做到了联合国秘书长的位置。这让安南的职业生涯与任何一位联合国系统的最高级别官员相比都颇为独特：鲜有他人从联合国系统的底层职位做起，历任财务、人事、政治、维和等多个岗位，直到被指派为助理秘书长进入最高级官员行列，并最终成为秘书长。这一段与众不同的经历，成为了安南在卸任之后要撰写一本有关自己在联合国工作生涯的回忆录的主要原因，“我有幸获得了这样一段几乎无人有过的经历，因此，我有义务将它与公众分享，尤其是与学生们，以及其他学术领域的人们分享。”他对北大的师生们这样说。

这本名为《干预：战争与和平中的一生》的回忆录在 2012 年五月完成，并于同年十月正式以英、法、德、西、葡等语言出版，而其中文版则由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翻译完成后于 2015 年四月正式首发。在向北大师生发表演讲的当日上午，安南先来到了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出席了他回忆录中文版的首发仪式。

回忆录追溯到少年时期的安南，并由此为他在联合国秘书长任上完成的最大成就之一提供了一种解释。出生于英国殖民下加纳的安南，在少年

时期经历了殖民加纳争取独立的过程，并得以见证了这个国家从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时发生的剧变。“突然的、巨大的变化

一下子席卷了整个国家，这里的首相成为了一个

加纳人，军队的首脑成为了一个加纳人，警察系统的负责人也成为一个加纳人……这在我的成长中埋下了一种信念：变革总是有可能的，甚至是剧烈的变革，所以一个人不能害怕变革。”安南在首发仪式上向

“这在我的成长中埋下了一种信念：变革总是有可能的，甚至是剧烈的变革，所以一个人不能害怕变革。”

在场来宾介绍回忆录的内容时说。1997年，在安南首次当选联合国秘书长不久之后，他即发布了两项关于联合国管理

事务改革的报告，内容涉及联合国管理机构的调整、设立常务副秘书长、削减联合国职位与行政

花费、加强与民间团体和私人领域的合作等多项调整。2006年，离任前夕，安南在一次公共演讲上再次提出了他对联合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愿景。

在回忆录的序言中，安南指出，“我们在处在全球重新

科菲·安南基金会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致力于促进更好的全球秩序和更加公平、和平的世界。该基金会于2007年在瑞士由科菲·安南成立。基金会有三个使命，即一个更加公平与和平的社会基于三个核心：和平和安全、可持续发展、法制与人权。基金会为这三个目标提供交流与协调的努力，也为科菲·安南对于和平世界的贡献提供分析和逻辑支持。

安排的十字路口，这种重新安排与1945年联合国创始人所面临的情况一样重要。”在此关头，他则希望通过这本回忆录，让读者们得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正在改变这个世界的动力，以及需要为此付出的代价。

科菲·安南基金会的使命

安南此次来访北京大学，除了他最为知名前联合国秘书长的身份外，还带着科菲·安南基金会主席的身份，而这则是他卸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近十年来最主要的身份。科菲·安南基金会由安南创立于2007年，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组织，



旨在促进更有效的全球治理，帮助各国人民和政府共建一个更加公平、安全的世界。自成立以来，基金会在安南的领导下，在推进民主政治、处理地区冲突、鼓励青年发展、应对饥饿问题和对抗毒品输送等方面开展了多项活动，并取得了显著成果。根据科菲·安南基金会的公开叙述，这一系列活动可以被归纳入基金会工作的三个重点方面：和平和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法治与人权。

此次北大之行，安南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向北大师生发表题为“构建更加和谐的世界秩序”的演讲。在演讲中，安南告诉在场听众，通过多年的国际事务工作经验，他认为世界各个国家、各种群体之间的和谐共处，要构建于三个相互依靠的支柱之上。这三个支柱正是科菲·安南基金会的三个工作重点。

安南的三大支柱其一是和平与安全，他在演讲中指出，尽管我们的世界已在近几十年内没有大国之间的冲突，人们的生活保障和质量也因此提高，但过去原有的国际秩序结构正在发生变革，而这就为世界局势的稳定带来了不确定性。面对这样的趋势，这位在黄金海岸的独立浪潮中度过童年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并没有这样的变革产生抵触，他向听众强调：“这次变革充满风险，因而要求各方的智慧和调

节来精心地管控它。”在科菲·安南基金会的支持下，安南在卸任后继续参与到了国际危机的处理中。2007年末肯尼亚危机爆发后，非洲联盟授权组建了一个由知名非洲人士组成的小组，这个由安南领导，包括坦桑尼亚前总统本杰明·姆卡帕和南非前第一夫人格拉萨·马歇尔的小组，通过外交斡旋，让发生冲突的肯尼亚两大政党达成了包括立即停止暴力冲突等四项内容在内的共识。

推进可持续发展，消除饥饿、应对气候变化也是安南及其基金会关注的重点。除了担任非洲绿色革命联盟主席一职之外，在基金会的支持下，安南在2008年和世界气象组织、爱立信公司一起发起了名为“Weather

Info For All”

（WIFA）的项目，旨在为世界上的贫困人群和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人群提供可靠的天气及气候预报信息。在演讲中谈到可持续发展问题时，安南也

告诉在场听众，中国在过去的35年间通过高速的经济发展，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带动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中国如今在收入分配、环境污染等领域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却也是巨大的。

安南认为实现和谐的第三支柱是法治和人权，他在演讲中批评了那些选择性地遵守国际法的大国，并强调

尊重人权和实现发展并不是矛盾的两端。在基金会的支持下，安南也在卸任后积极地参与到了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推进法治建设和呼吁尊重人权的活动中。

后记

卸任后的科菲·安南并没有忘记他多次向人们提到过的“退休后回到非洲做农民”的愿望。2006年末离开联合国秘书长岗位，安南和夫人在地中海沿岸的一处森林别墅中度过了三个月没有电视、报纸、收音机的“与世隔绝”的休养生活后，他又开始了工作。

2007年，他在自己二十来岁加入联合国系统的地方——日内瓦，建立了科菲·安南基金会，通过在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法治与人权三个领域发挥他的政治影响力来构建和谐的世界。同年，他担任了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的主席，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道致力于非洲农业的发展，推动非洲农业的增产与农民的增收。这一年，他也加入了由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组建的国际元老会（The Elders），和诸多国际知名政治人物一起在国际政治的调解、协商活动中发挥余热。

在三天的北大之行中，年近八十的科菲·安南用他在国际事务各个领域的丰富知识和深厚经验回答着每一个问题，为与他会面人们留下了一个充满使命感的老者形象。此行的一周后，安南率领国际元老会飞赴莫斯科，在那里与正因乌克兰问题备受西方国家责备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继续为世界的和平发展而奔走。合



国际法视野下的全球安全

——专访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高级顾问拉明·西塞

文 / 于文澜、谢伟健

2015年3-5月，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邀请，知名国际法专家、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高级顾问拉明·西塞访问北大并开展联合授课。拉明·西塞对北大并不陌生，但此次是他在北大待过最长的一次。他所参与的课程包括：全球治理、非洲研究、和国际组织与国际法。除了给北大同学们讲课，他在这段期间经常参与小组学术讨论。在北京大学2015年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上，拉明·西塞还应邀担任开幕式的主讲嘉宾。对此，他谦虚地表示：“我主要就是和学生们分享我的经验与故事，希望我们能相互学习、交流。”

不只是律师

尽管总会被以“科菲·安南的高级顾问”的头衔提起，但拉明·西塞（Lamin Sise）仍然愿意花上几分钟，解释他在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身边工作时的职责。“事实上，我并不是大家经常说的那种法律意义上的顾问，虽然说我的出身是一名国际律师。”

在联合国工作的三十多年里，拉明·西塞曾效力于多个联合国机构和部门，包括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法律事务办公室、和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也就是在维持和平行动部，他与当时负责维和事务的科菲·安南相识，并拥有愉快的合作经验。1997年，安南就职成为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安南看重拉明·西塞的能力，于是把拉明·西塞带到自己的执行办公室，继续他们之间的默契合作。

“因为我的背景是国际法，而且我也曾经在联合国法律

事务办公室工作过，所以在和安南一起处事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些法律问题，我会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拉明·西塞说。“但是正式的法律意见仍然由联合国的法律办公室负责提供。在秘书长执行办公室的所有人并没有明确的岗位职责，大家几乎什么事情都得做。”

当被问及自己职业生涯中推动一项政策实施的最得意的经历时，拉明·西塞最先想到的是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成立于2002年，主要对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的个人进行起诉和审判。

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成立于1946年；作为联合国的重要机构和国家争端的仲裁地点，长期以来使用其自有的体系判决争端。但是拉明·西塞表示：“对于刑事罪的处理，在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之前一直未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处理。”“冷战之前就有人提倡要弥补这一空缺，但是到了冷战，这一方面的努力都被暂停了。”冷战后，经过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后，国际社会终于在1998年7月于罗马召开了会议，并最终，以120票赞成，7票反对和21票弃权的结果获得了《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7月17日当天，我就在罗马，见证了这一规约的成功签订。”拉明·西塞情不自禁地在言语中透露了他对参与到这个历史事件的自豪和成就感。4年后，《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开始生效，国际刑事法院正式成立，至今已运行了13年。

“在我的职业生涯甚至是在我的一生中能看到这个法院的设立，是一件相当有成就感的事。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成功，而是全人类的成功。”

拉明·西塞说。

关于联合国常设军事力量

1995年，拉明·西塞曾在康奈尔国际法杂志（*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发表过文章，谈及“联合国常设军事力量”。时至今日，当被问及这个目标的可行性时，他仍然说：“我不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有办法实现这个目标。”

拉明·西塞表示我们应该在历史的框架下理解其中的现实困难。说到这里，他从胸前口袋把《联合国宪章》取出来，随身携带这本小簿子是他从开始在联合国工作时就有的一个习惯。他翻阅至《联合国宪章》的第43条，给我们解释：这一条规定所有的联合国会员国承诺提供军队供安理会支配。然而，这一条到了今天仍然没有实现。

《联合国宪章》是在二战刚结束后签署的，当时同盟国刚战胜了轴心国。但是，不久后，朝鲜战争开始了。曾在二战中并肩作战的国家成为敌对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理应在这时发挥作用，但实际上并没有——苏联强烈反对安

理会的介入。美国人最终在联合国大会通过了377号决议，即所谓“联合国一致共策和平”决议，绕开了苏联在安理会的否决权，成功地把联合国部队派到朝鲜半岛去对抗朝鲜部队。

冷战时期，联合国的作用更是跌至谷底。“几乎没人再提起，‘我们来搞个联合国军队或警队吧。’”因此，维和取代了常设军事力量。1956年发生了苏伊士运河战争——英法为夺得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与以色列联合，对埃及发动军事行动。基于当时的国际政治现实，联合国想出了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他们派出了“没有枪支，只有望远镜的人员，这些人员一旦看到任何一方的士兵越过停火界限就会呼叫总部，让他们撤退”。拉明·西塞表示由于有了这起事件，我们才有了现在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当然，现今的联合国部队有权支配枪支，也被赋予了更多的职责。”

“我要说的是，联合国宪章起草的背景很快就完全变了个样。”因此，当初设想的联合国常设军事力量并没有能够实现，反倒是被维和行动取代。直至今日，联合国常设军事力量仍然



拉明·西塞与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及美国总统奥巴马

缺乏市场。拉明·西塞以联合国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事件中的消极表现为例——虽然当时的加拿大籍的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司令达莱尔将军希望增加维和部队的数量，但是其他国家因为种种原因非但不愿意增加，甚至希望关闭整个行动，以致最终未能阻止惨案的发生。

关于国家保护责任（R2P）

国家保护责任理论（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简称 R2P）提出了国家与国际社会向处在危险中的人民提供生命支持保护及援助的预防责任、做出反应责任以及重建责任。继联合国无法在卢旺达和南斯拉夫阻止屠杀之后，R2P 理论开始流行起来。2005 年，联合国大会更是发表了一个文件表示支持 R2P。然而，许多观察员认为以目前来看，R2P 仍然处于理论层面，许多国家仍然都不愿意放弃传统的主权概念与权利。

拉明·西塞认为，R2P 成为国际准则甚至成为国际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R2P 最先的应用。“如果你在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之前问我同样的问题，我或许会给你一个更乐观的答复。”

在 2011 年的利比亚内战中，前任利比亚最高领导人卡扎菲当时在全国多处成功地在军事上击败了他的政治对手。“最后的大奖是（反对派武装大本营的）班加西。”卡扎菲还断言，利比亚可能会“血流成河”。国际社会大为震惊，认为卡扎菲即将攻击班加西的平民百姓。于是，在安理会上，中国和俄罗斯与其他三个常任理事国达成了一致，他们都同意保护平民。但是在拉明·西塞看来，中国

和俄罗斯并没有预测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干预。拉明·西塞认为，如果中国和俄罗斯事先知道的话，他们是不可能同意的。另外，卡扎菲在有多国军事干预行动展开后被迫下台，而对于中国和俄罗斯来说，促使另一个国家政权更迭更是一个禁区。因此，继利比亚事件后，他们坚持不再让相同的事情再次发生。

不久后，叙利亚也爆发了内战。拉明·西塞认为，此时的中国和俄罗斯的立场非常坚定，他们不愿意叙利亚成为下一个利比亚，不愿意看到北约再次的参与，也不愿意颠覆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权。

“R2P 的最终成功与否，和它最初如何被应用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令我比较担心的原因。如果从 R2P 自身来看，它是有可能成为国际法准则或国际法的一部分的。”拉明·西塞说。

如何促进非洲和平与发展？

非洲的民族问题十分复杂，大部分民族处于部族状态。有资料称，非洲的部族数量可达 3000 个，最保守的数字也有 250 个。有如此大的数字差别，是因为一些部族之间区别不大，既可分为多个部族，又可视为一个部族。这种复杂的部落组成，给许多非洲国家带来了部族矛盾，甚至冲突和格斗。

来自冈比亚的拉明·西塞却把这种多样性看作非洲的宝贵财富。关键是有好的领导者。好的领导者不会把刻意强调部落差异，反而会尽力排除语言等障碍，促使得各民族之“相互欣赏，相互往来”。

其实，民族差异在世界上也是很普遍的事，就像苏格兰人不把自己看作是英国人，他们甚至要求独立。拉明·西

塞指出，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继承的是一个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种族共同生活的小岛，但他为新加坡规划出良好的前景——新加坡将是一个多元种族和睦共处的国家。李光耀并没有为自己的一己之私利用民族差异。

好的领导者将有助于维持国家的稳定和建立起法制制度。相反的，在叙利亚等国家我们看到，教育、交通、医疗等设施在战争中是得不到保障的。非洲国家必须先放下战争与冲突，才能够建立起一个稳定、持续发展的社会。在这方面，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已作出了不少努力，也有了些微进展。如与上世纪 60、70 年代相比，今天在非洲的政变和内战的数量已有所减少。然而，拉明·西塞表示这个历程是艰辛的。非洲国家初获独立时的领导人并没有为国家治理做好准备。“他们在监狱里度过的时间比在学校学习如何管理和治理国家来的多。”但拉明·西塞认为这已经是 50、60 年前的事情了，不能把什么事都归咎为殖民主义的祸害，非洲人最终必须依靠自己来摸索出今后的发展道路。

拉明·西塞还被问起了中国和非洲的经贸关系。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随着近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非洲国家是否会受到影响？对此，拉明·西塞回答，影响是肯定会有，但是中国不是非洲唯一的贸易伙伴。另外，非洲事实上由 50 多个国家组成，但往往被外界当成整个非洲是“一个国家”。拉明·西塞表示事实上中国商人目前关注的是非洲的南部和东部，相比之下中国在非洲西部并不那么活跃。拉明·西塞认为，中国与非洲各国在许多领域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合

ANU:

聚焦亚洲，聚焦中国

——专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校长伊恩·杨

文 / 李威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位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是澳大利亚唯一一所国立大学，毗邻许多政府部门和国家文化和科学机构，科研课题聚焦国家政策，为国家的公共政策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一些用于专门从事国家和国际合作研究的重要基础设施都建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校园内，如重离子加速设施、全国计算基础设施、赛丁泉天文台等。

伊恩·杨教授 (Ian Young AO)，荣获澳大利亚功臣二级勋章 (AO)，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兼董事长。2015 年 4 月 14 日，伊恩·杨校长率领由数学及物理科学学院、工学及计算机科学学院、药物，生物及环境学院、医学及健康学院等 4 位院长及相关领域近 20 位专家代表团来到北京大学，介绍其相关学科建设发展情况，与我校对应领域师生代表进行学术交流，并举办“北京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日”活动。期间，伊恩·杨校长与我们分享了他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刻思辨。

Q&A

脚踏实地的合作

Q: 首先, 北京大学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ANU) (以下称为 ANU) 有着长期友好的合作, 而 ANU 与世界上许多顶尖大学都有着深入而广泛的交流, 那么在您看来, 北京大学与其他学府相比有哪些显著的不同么?

A: 的确, ANU 与许多国际知名的大学有广泛的合作。其中, 中国对澳大利亚, 对 ANU 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自从 ANU 建立以来, ANU 与中国有着长久的合作历史。对 ANU 来说, 我们非常看重对亚洲的研究, 特别是

对中国的研究。我们在国际上有着广泛的合作, 但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则是非常重要的。北大和清华是

中国 TOP2 的两所大学, 北京大学不仅在中国, 在国际上也是非常优秀的大学, ANU 也如此。ANU 希望与其他国家的顶尖大学合作, 这对 ANU 来说至关重要。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北京大学是一所发展非常迅速的大学, 扩张的速度很快, 教学和研究水平飞速提升。同时北京大学也非常幸运地可以从全中国挑选最优秀的学生。我想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

使得北京大学成为了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

Q: 此次来访, ANU 带来了众多各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 足见 ANU 对此次活动的重视, 那么双方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保证在接下来的各个领域相互交流的高效性呢?

A: 是的, ANU 与海外伙伴有着非常多的合作, 但是, 许多这样的合作最终只停留在了纸面上,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 我们从中获得的益处就非常有限。所以我们非常迫切地认识到, 必须确保此次与北京大学的合作与以往不同, 要将合作落到实处, 而达成此目的的唯一方法就是将我们大量的科研人员带到这里来。他们此刻正与北京大学的同行们密切交流, 并最终会在具体的各个研究领域上建立合作关系。林建华校长与我签署的合作意向并不能确

保合作会顺利进行, 因此必须将合作建立在两校科研人员的密切交流之上。特别是, 我们希望此行能够与北京大学建立两校间的 PhD 合作项目,

我们将相关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带到这里, 正是为了促进两校间加深有关这一方向的交流。

聚焦亚洲, 聚焦中国

Q: 自 2001 年起, ANU 设立了全球中国研究中心 (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 CIW), 其初衷是什么? 为什么将中

国放到这样重要的一个位置来看待? 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果? 未来将如何发展?

A: 澳大利亚政府在 ANU 建立全球中国研究中心, 其初衷是建立一个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多学科研究机构。政府希望该研究机构能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政策, 有关中国的一切开展研究。并且研究的对象也不局限于中国大陆, 而是扩大到整个大中华地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 汉语以及中国文化在亚洲的很多地区有着支配性的影响, 例如在新加坡等地区, 讲中文的人占大多数。中国文化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就澳大利亚来说, 虽然国土面积很大, 但是人口数量非常少, 中国是极其重要的邻邦。中国目前正在迅速腾飞, 尤其是她的财富、政策影响力、战略影响力等都在飞升。未来十年, 中国将在该地区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于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 不仅要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而且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澳大利亚恰好是位于亚太地区的西方国家, 但是平心而论, 多数的澳大利亚人其实并不了解亚洲, 也并不了解中国。所以全球中国研究中心的一个重要使命是让澳大利亚国内对中国, 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社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Q: 那么目前为止全球中国研究中心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未来又将会如何发展呢?

A: 全球中国研究中心到现在仅仅成立 4 年, 但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专注研究中国人文科学的研究中心之一, 研究重点是中国的政治、社会。我想, 设立全球中国研究中心的初衷是直接向澳大利亚的政府提供有关大

中华地区的建议，帮助政府制定外交政策。ANU 位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所以与澳大利亚政府的关系非常紧密。你会经常发现 ANU 的学者会直接向政府提出自己的建议。政府并不会总是采纳这些建议，但是这是我们作为一所大学所在公共决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果全球中国研究中心能够按计划成功运转的话，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的人民会对中国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比如中国发展的驱动力是什么，中国面临着哪些重大问题等等。

Q: 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瞄准了亚太地区强大的教育市场，那么您是如何看待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的教育资源以及教育市场的呢？ANU 有没有针对亚太尤其是中国开展特定的战略呢？

A: ANU 大概有 25% 的学生是国际学生，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如果你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观察亚洲，你会发现，亚洲在全世界越来越有影响力。而且在全亚洲范围内，进入高等院校的学生数量迅速增长，并且在未来几年里仍然会保持这一趋势。我认为在未来几年，亚洲发展高等教育系统，扩展教育合作力度的需求仍然会不断增加。现在，不仅仅是中国，亚洲许多地区的学生都将目光投向国外的教育资源，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承担海外求学的费用，这样，愿意选择海外留学的亚洲学生会越来越多。所以，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看，我们非常乐意参与到这一波高等教育系统迅速扩张的浪潮中，

教学与科研

Q: ANU 提出“科学研究是第一

位”，这一点从校训“Above all to find out the way things are（重要的是弄清事物的本质）”便可以看出。那么 ANU 具体是采用了哪些措施来平衡科研与教学的呢？

A: 一所优秀的大学必然是教学与科研并重的，不仅要做好传统的教育教学，也善于做科学研究。而且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可以彼此割裂开。我的观点是恰恰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更大的益处。我想举个例子，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大学生时，知识

是局限在图书馆中、教授的头脑中的，大家是鲜有机会接触到的。而现在，如果你上网的话，你就会发现信息到处都是。但是你不能确定你从网上搜索到的信息的质量，也就是说你找到的信息有可能是错误的。所以，时至今日，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仅要自己从网络获取信息，更要有能够判断这些信息质量的能力，而不是接受任何获得的信息。而这样的能力恰恰也是科研工作者必须掌握的。科研工作者要对各种假设进行判别，要对各种背景信息进行检索。我认为在未来，这种鉴别信息的能力对于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是尤为重要的。每个人在面临具体研究工作时，比如两页演示文稿摆在面前，哪一个信息是正确的，到底有没有正确的，两者的讨论中各有哪些优缺点等等，这是科研工作者必须具备的能力。

“如果你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观察亚洲，你会发现，亚洲在全世界越来越有影响力。而且在全亚洲范围内，进入高等院校的学生数量迅速增长，并且在未来几年里仍然会保持这一趋势。”

Q: 那么我们是希望将这些在研究中所必备的技巧让同学们在平时的学习中就不断强化运用吗？

A: 是的，非常正确。在研究生阶段，是需要掌握这些科研必备的研究技巧后才能毕业的。

Q: 那么 ANU 是如何培养学生这种能力的呢？

A: 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 ANU 的学生能够独立地运用越来越丰富的资源，比如图书馆、网络等来为自己寻找信息，而且还能搜索到这些信息背后还有哪些信息可以

挖掘，这些信息的来源有哪些，该如何评判这些信息等等。这也就是所谓的鉴别信息质量的能力，这对于每一个 ANU 的学生都是非常重要的。

Q: 那么 WATTLE（Web Access To Teaching & Learning Environments）在培养学生搜索信息的过程中是否是个有益的尝试呢？

A: WATTLE 是一个电脑管理系统，能够发布课程的信息，并且可以找到所有 ANU 课程的录像。利用 WATTLE，你可以反复观看你需要的教学录像。当然，WATTLE 也提供了许多其他的信息。并且，我认为在未来，我们的教学模式可能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我们传输信息的方式。我想在未来很短一段时间内，我们仍然会有许多传统的课程方式：教师站在阶梯教师前面，面对 300 多名



学生并与学生们对话。但我想5年之后就不会再这样下去了。因为你可以将你需要传达的信息用录像的形式记录下来。学生们只要坐在显示器前就能够播放观看，想看多少遍都可以。这仅仅是教学信息传递的方式可能发生的变化之一。你也可以召集起一个小组，与小组内的成员进行讨论，有更充足的与他人信息交互的时间。这种双向的信息交流比仅仅被动的收听会有更多的益处。

一所卓尔不凡的大学

Q: ANU 作为研究型大学，是如何促进研究成果转化的呢？

A: 尽管我们应该做，但是我们事实上并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想

问题的答案在于我们有一个隶属于 ANU 的公司，其中有很多的教职员工和研究生来研究如何将科研成果转化成某种产品或类似的工作。并且我们也尝试培养我们的研究生不仅将目光放在基础研究工作上，同时也要考虑到自己的工作是否有机会转化的商机。我们仅仅做到这个程度，但并不会去研发某种产品。公司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们研发某种产品然后尝试去生产。尽管产品可能是从高校的某项科研成果转化而来，但是作为一所大学，我们并不会致力于产品的研发。大学并不善于承担风险，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组织机构。我想在这方面，ANU，或者说大多数大学，会建立一个附属公司，用商业的运作模式来负责产品转化工作，这样小巧灵活的组织同时也

具备承担风险的能力。作为 ANU 的合资公司，我们可以为他们的转化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他们可以另寻资本注入。而这样的商业运作最好是与大学本身分离开的。

Q: 我们知道现在有多个有影响力的机构每年都在给世界大学排名，并且采用完全不同的评价标准，您是如何看待世界大学排名的？ANU 是否有制定长期规划来有针对性地提高 ANU 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名次？

A: 我本人是不太喜欢这种高校的排名机制的，我并不相信这样的方式。大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我并不认为仅仅用一个数字就能够全面的反应一所大学。但是，正如所说的那样，这种排名机制又非常重要。所

以客观来讲,我们关于排名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许多人重视这种排名,所以我们就不能忽视它。作为一所大学的校长,我必须严肃地考虑这件事,通过必要的方法达到一个令人满意排名。

Q: 那么 ANU 是否会为了提高在世界大学中的排名而专门制定特别的发展战略呢?

A: 事实上,我们学校内部有专门的一个小组来研究排名的机制,来确保我们提交的数据信息在当前情况下是对我们最有利的。但是我们不会为了提高排名而增设某些学科。我们不会让我们的学校为了排名而蒙羞。为了获得更好的排名,你可以制定学者的研究工作必须发表在哪里之类的政策来获得更好的排名,但是我们并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们认为这种排名并没有那么重要。如果排名确实能够如实反映一所大学到底有多么优秀,我们或许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我们并不这样认为。这只是一部分人会选择的评价指标。

Q: 在澳大利亚的大学中教职工队伍中,外籍人员约占 25%,教学科研人员中的比例更高。ANU 的教学科研人员的外籍比例是多少?

A: 具体的数字我不记得了,但是应该在 50% 左右,并且这些人都是在澳大利亚以外获得的 PhD。这说明什么呢?我的观点是,现在优秀的研究者是全球化的。澳大利亚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 0.3%。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限制我们自己只能从这 0.3% 中做出选择呢?如果想要选出最优秀的科研工作人员,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

进行搜索。所以,我寻找优秀的科研人员的时候,我并不关心他从哪里来,我只关注于找到最优秀的研究者。

Q: 选人的过程本身也是双向选择的,这么多优秀的科研人员为什么会选择汇聚到 ANU 呢?

A: 我想,这些优秀的研究者选择 ANU 是因为这里的研究文化。优秀的研究者总是希望能够和优秀的研究者一起工作。虽然现在你可以很轻易地在全世界建立研究合作关系,但是总比不上与隔壁就能建立合作那么方便。人们总是倾向于向能够与自己相似的人可以轻松交流的地方汇聚。而且,这里还有最优秀的学生可以交流,有非常好的设备可以用于科学研究。一所大学能够提供一流的科研条件,一流的研究学者,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平台,越来越多的人会希望到这里来,因为这里总是会令人兴奋的事情。

Q: 根据我们得到的信息,英国将会采取措施,通过提高学费来应对教育经费的不足,对于这种情况,您怎么看?

A: 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英国,这是所有西方国家目前都面临的困难,包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欧洲等等。这些国家国民的高等教育率过去是 10~15%,而现在 40~50%,甚至达到 60% 的人会选择去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在澳大利亚,目前有 50% 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这意味着什么?政府要为急剧增长的教育费用买单。并且所有上述国家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美国关于学生承担的贷款压力有非常多的争论,英国希望提

高学生支付的学费金额。欧洲的情况有所不同,欧洲根本不允许大学增加学生的学费,我想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些国家的高校学生爆发性的增长,学校的教育资源已经不足以维持这么多学生的教育了。而政府已经无力支撑这么庞大的教育支出,只能另寻他路。很显然,其中的一种做法就是提高学生支付受教育费用的比例。那么问题来了,学生们到底需要支付多少呢?

Q: ANU 是如何应对上述情况的呢?

A: ANU 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系统的一环,政府会决定究竟采用什么样的资助形式。我个人认为,有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需要澳大利亚来回答。首当其冲的就是到底国民的高等教育率达到多少是合适的?有种猜想是越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对国家的发展越有利,我个人并不认为接受高等教育是必须的。有非常多有意义的工作是完全不需要接受高等教育的,而这可能对学生和国家为学生教育投入的资金来讲都是一种浪费。所以首先澳大利亚要对这种情况进行思考,因为我们的国家有非常高比例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很多的学生从大学毕业后可以找到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并不需要接受大学教育。我想这是我们需要进行讨论的一点,第二点是,学生该为自己的教育支付多少比例的学费,政府该支付多少?因为这对两者来说都是受益的。国家会因为国民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而受益,而学生个人也会从中受益。所以问题在于如何对此进行平衡。当然,想要获得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是非常不容易的。合



程莹，北京大学亚非语言文学系硕士毕业生。2012 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攻读非洲语言文化方向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非洲戏剧，非洲大众文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先后多次赴西非与南非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在她刚刚结束她第三次田野调查、回国参与研讨会的这段时间里，我采访了这位非洲研究领域的年轻学人。



如何进入非洲： 非洲与我们

——专访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非洲研究专业博士生程莹

文 / 刘东

就像程莹自己在一篇文章的开头写到的那样，“世界上的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惯常模样。星期天上午的伦敦总是异常安静，而刚从拉各斯回来的时候我对这难得的安静感到有些无所适从。”拉各斯是片热土，伦敦则充满着清凉，两座看似充满张力的城市共同塑造着这位年轻的非洲研究者的现在与未来。非洲研究是门热闹的学问。或许程莹应该感到幸运，这座安静的城市带给她观照非洲的合适距离；而她更该感到幸运的是，

在这座多雨的伦敦城，非洲研究给了她照亮生活的“热带阳光”。

与非洲结缘： 文学视野下的“戏剧”非洲

Q：听说你刚刚完成你在拉各斯的又一次田野调查。这种手段可能对社会学科比较常见，但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还比较陌生。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手段？如何用这种手段来连接文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A：田野调查是我在博士期间进行研究的手段之一。我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读的是非洲研究系，实际上主张我们用综合的研究手段和视野来看待问题。这实际上是用什么视角来关注研究对象的问题。我在研究生阶段开始接触非洲文学，在北大亚非系接受的是语言、文学的传统训练，主要的研究方法就是文学正典的阅读与批评。后来到了 SOAS 读博士，开始研究尼日利亚的当代剧团，这些剧团的作品与原先的经典戏剧无论在

生产方式还是在表演方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而通过田野调查，我能够对论文中研究的文化现象所处的语境有更多切近的了解和体验。

Q：怎么会想到去研究非洲的戏剧？为什么不选择经典戏剧来研究呢？

A：非洲有着深厚的戏剧传统，这使得非洲的戏剧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研究非洲，戏剧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虽然大家对非洲文学比较陌生，可能不太了解，但实际上非洲文学也早已建立起了她的正典和经典文本体系。包括索因卡，非洲已经有四个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我个人相对于经典文本的解读来说，对正在发生的、未定论的事物更感兴趣。而且非洲当代剧团的话剧很能反映出非洲艺术的一些特点，具有独特魅力，所以我选择了当下的非洲。

Q：为什么选择当代剧团作为你的研究对象？

A：这与我在研究生期间的导师

费米教授(Femi Osofisan)所写的一篇文章有关。他写了一篇文章《非洲的戏剧死了吗？》，专门来探讨尼日利亚当代剧团戏剧文化日渐消亡的问题。当代剧团代表了非洲戏剧不同于经典作家的另一条重要的脉络。60年代以来，尼日利亚的剧团就一直非常兴盛，在全盛时期，在全国曾经达到

过一百家的规模。但是在90年代尼日利亚“Nollywood现象”兴起、尼日利亚经济衰退、货币贬值等一系列情

况出现之后，非洲的小剧团迅速凋敝，一百多家流动剧团迅速消失，或转而投入成本低廉、收益更快的电影和视频制作产业。费米教授针对这一情况发出了“非洲的戏剧死了吗？”这样的感慨。我看到之后觉得很有意思，我想看看非洲的戏剧现状到底如何，一个充满活力的戏剧传统，真的就这样消失了吗？…在经过几轮田野调查

之后，我认为这种传统正在城市地区逐渐的复兴。

Q：所以当代剧团也是你田野调查的主要对象。能与我们分享一下这几次田野调查的经历么？

A：我的三次田野调查第一次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和伊巴丹，第二次在南非的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第三次

主要集中在拉各斯。

最开始，我只是打算收集一些关于拉各斯戏剧、表演这些文化活动的材料，后来几名教授向我推荐了一个剧团，

几次跟下来我发现

这个剧团很有意思，后来也决定把它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我的几次在拉各斯的田野调查也都与这个剧团有关。我的第一次主要是摸索、了解尼日利亚的当代剧团情况，并把这个剧团定作了我的研究对象。而第三次，也就是上一次去拉各斯，是为了进一步地收集材料，细致地跟踪他们的排练，与他们谈话、交流，积累更多的素材。

Q：那在南非的田野经历呢？

A：南非和西非是非洲戏剧的两大传统，尼日利亚是西非戏剧的代表，因为希望拓展视野、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也想对南非的戏剧有所了解。这个田野大概分成两个阶段，第一段在开普敦，第二段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剧院很多，我的主要任务就是了解当地的戏剧表演文化。我先搜集了所有剧院的材料，接下来做的就是去不同剧院看戏。第二阶段去了约翰内斯堡，与戏剧界的人进行交流。其实除了这些计划外的日程，田野中还有





很多意外的收获，这些意外也是田野调查最迷人的地方。我在开普敦与其中一家享誉世界的剧团建立了联系，目前正在与国家话剧院探讨能否邀请他们来中国参加戏剧节等事宜。在田野时还能遇到意想不到的人。其实在南非的中国人是很少看戏的，尤其是晚上，出门的话一般不去剧院。所以一次我去看戏，有一个人看我是亚洲面孔就来找我聊天，聊着聊着我才知道他是本土的年轻戏剧家，并在金山大学接受专业的戏剧训练，还给学生开设写作课程。他之后带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后来我们也一直合作。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有关于有关南非华人的戏剧。我们争取把它在不远的将来放上舞台。

剧团何为： 非洲戏剧的传统与创新

Q：听你这样说，感觉非洲的戏剧现实性是很强的，各种社会问题都会进入戏剧文本。

A：确实是这样的，非洲戏剧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与现实联系的紧密程度和强烈的社会批判传统，无论是经典作品还是当代剧团。像我之前提到的费米教授，他还是尼日利亚第二代重要的剧作家，他的作品中就经常触及到尼日利亚的腐败问题、军政府问题等等。当代剧团继承并重新发展这一传统。

Q：当代剧团的戏剧实践与传统戏剧相比，有哪些特点呢？

A：经典作品还是以剧本创作为主的，有很强的文学性。另一个特点就是戏剧中包含了大量的传统元素，比如约鲁巴人（Yoruba）的宗教信仰体系等。因此，对这些解读必须要以

深厚的宗教信仰体系作为基础。一些当代剧团没有戏剧文本，直接排戏。演出地点也很多样，什么样的场所都可以演。有商业场所，高级派对上的演出，也有直接在社区里广场上表演的剧。这些剧团很重视与观众的互动，强调观众的参与意识。当代剧团的另一个特点是即时性和灵活性，总是能够迅速回应社会变化和重大的议题。

Q：这种参与的表现有哪些呢？

A：剧团的演出是很聪明的，他们的讽刺不是直接的挖苦。他们会灵活运用手中的道具和各种标志性姿势提醒观众。最近看的一个戏中，那个演员其实服装上挺普通的，但是带了一个标志性的黑色礼帽，结果观众看到后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这说的就是时任总统。他们除了讽刺之外还有呼吁。比如我最近看到的一个剧，背



景就放在最近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总统大选之前，这也是他们针对大选特别排练的作品。他就讲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去投票。“坏的领导者是不参与投票的好人们‘造就’的。”他们就是在回应年轻人因为政治黑暗所以拒绝参与政治导致政治愈加败坏的现象。这种呼吁力也是非常强的。

Q：之前听你说当代的这些剧团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目前正在恢复的状态，这些剧团现在是什么样的？

A：剧团有大有小，大多数都是小剧团，大多数是喜欢戏剧、喜欢表演的一群年轻人组成的。比如我关注的这个剧团，就是在戏剧“死亡”的背景下，为数不多的一直在演戏的剧团。都是年轻人在做。全世界做先锋话剧的很多也都是年轻人，不过搞先锋话剧的人往往是以探索戏剧艺术自身的价值为目的，而且往往经历了专业的戏剧表演训练和戏剧专业学习。小剧团们往往是没有考上大学的这群年轻人，同时他们更坚持地要让戏剧

接触到更多更广的观众，要维持这种社会批判得传统。剧团的排练、演出场地很多都不是固定的，有的即使固定，也十分简陋。他们为了维持生计，偶尔参与公司、私人聚会的商演。尼日利亚的贫富差距非常大，上层社会的“派对情结”和戏剧观赏情结又很强，这也是各个剧团谋生的方式之一。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剧团在运营，制作排演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灵活性。

Q：这样感觉当代的剧团们好像并不十分专业。

A：这也是最有趣的地方之一。用戏剧艺术的眼光来衡量的话，他们更像是个“草台班子”。他们会用简陋的DV拍摄一些简单的视频，又或者利用PPT，把这些元素加入他们的戏剧中，就叫它“多媒体创作”。但是他们会认为自己是专业的。演员大多数是兼职，要么是兼几个剧团，或者是上午排练，下午会有自己的“谋生手段”。比如上午排练，下午会当裁缝。但是他们从不说自己是专业的裁缝，但会说自己是专业的演员。“专业”这个东西是意味着标准的，我们衡量的标准是“戏剧艺术”，但是很多事情是要打破这个尺度来看的，我们也应该多关注本土的视角，用非洲本土的眼光来衡量他们自己的作品。

Q：这些剧团的社会影响力怎么样？

A：其实有时候我们总在探讨剧团演戏对观众的作用，我倒觉得演戏对演员自身的作用更大。所有人都说政府是非常腐败的，这已经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东西，演员的表演是一种“确

认”。我在剧团中的一个朋友，她在剧团演出了七年。最开始她的政治意愿是十分模糊的，到后来有一天她跟我说：“她要当一个政治活动家。”她建了自己的剧团，而且完全不卖票盈利，是完全公共空间的演出，这就是一个自我确认的过程。

中国主体： 如何谈论非洲？

Q：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聊了关于非洲文学、非洲戏剧的诸多话题，我们都涉及到一个前提性的东西，就是我们作为来自中国的观察者与思考者，一个外在于非洲的他者，以何种姿态介入有关非洲的知识生产。你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

A：这个问题是一个挺根本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常常反思我自己来到英国，来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目的。我是一个中国人、亚洲人，为什么会想到研究非洲？我通常这样回答别人：我有学习另一个地方的文化的自由。就像法国汉学家白乐桑曾经讲过的那个笑话一样：白乐桑有一次被问到为什么早在1970年代就想到要学汉语，他微笑着回答：“我学汉语的原因就是为了很多年之后你们问我这个问题。”当然，这里带着意气的成分和开玩笑的色彩。不过学习的自由是更重要的事情。

Q：北大中文系的蒋晖老师目前正在南非访学。他曾经有过类似的表述，由于中国与非洲历史状况的相似，所以用中国人的视角来观照非洲，恐怕我们的解读会更贴近。

A：我其实挺认同这个观点的。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就是老牌的非洲研究重镇，有着深厚的欧美研究传统，这种研究模式是建立在欧美文化的背景之下的。非洲长期的“自我缺席”使得欧美表述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权威表述。当我们在谈论非洲的时候，恐怕首先想到的就是大草原，是角马，是鳄鱼，是饥饿濒死的孩童。我们难以想象非洲的大厦林立，大城市里交通拥挤。只有多元视角去关注非洲，多种意识形态观照非洲，在博弈中，非洲面貌才可能有一个更加多元的呈现。

Q：你触及到了一个“非洲误区”的问题。这似乎是“常识”中出现的问题。

A：你说得对。我们很少关注非洲的现代化进程，拉各斯是一个急剧增长中的非洲大都市，这种爆炸性增长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者来研究。我们的常识中充满了刻板印象和盖棺定论。但置身非洲的日常生活，往往能丰富我们过于单一的视角。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非洲许多城市中都有的小巴。当地人一般乘坐的黄色小巴士一般就是德国的二手大众或奔驰车改装粉刷而成。一点不夸张地说，这些车不但破旧拥挤到车的后半段马

上要脱落，而且行驶起来连车门都不关。甚至还常常能看到公路上卖零食或碟片的小贩站在车尾的保险杠上“搭便车”。这种现象带来的应该是一种驳杂的、而不应该是一种单一的感受。当我们谈论“理解”的时候，要先想到：

进入非洲语境，才能有更深的理解。

Q：远方的人们，都与我们有关。你进入非洲的态度非常值得赞许。

A：进入非洲是一种偶然，但偶然之后便似乎有了一种更深的情感。不管是与剧团打交道，还是与当地朋友交往，我对他们都充满了敬意。经常觉得自己很幸运，就好像对这篇大陆的一知半解，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我有一个朋友叫James，他已经很大年纪，在我的学校读文学硕士。当时因为好奇他总坐在同一个角落里记笔记，就和他攀谈起来，后来发现他早在十年前就开始自己扛着机器在尼日利亚拍一个不知名剧团，当时也没有什么资金支持；到现在，他还坐着类似的事。

非洲研究是新学问，也是旧学问。它旧，所以期待新视野和新方法；它新，所以期待更多人的壮大与加盟。非洲的剧团带给我们一种感动：当他们用那么简单的道具，却用灵活的运用来演绎了那么丰富的精彩。我们对

“专业”这个东西是意味着标准的，我们衡量的标准是“戏剧艺术”，但是很多事情是要打破这个尺度来看的，我们应该用非洲本土的眼光来衡量他们自己的产品。

此真的就没有嘲讽的资格。他们也在努力，为非洲的更美好。研究者们也是如此。保持中立，进入语境，学会理解，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破除偏见易，建立认知难。视觉是我们的第一道权力机制。正像她在朋友圈分享关于肯尼亚动态新闻时的那句感慨：目光所及也是立场。合



王越：人生需要“自定义”

文 / 赵佳茵

FACES（斯坦福中美学生论坛）北大分会联席主席，芝加哥大学交换学生，元培 11 级 PPE 方向学员，2012 年陕西省文科第五……但王越不能被这些标签简单地定义。这个风风火火、果断勇敢的陕西女孩，像是计算机里的一个自定义函数，直截了当，功能强大。

学习生活：七年的“未定义”

王越毕业于陕西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附中学习氛围浓厚，相对课外活动较少，人人一心向学。但是王越却不甘于做一个只会学习的“学霸”。她说，“自己永远是那个

坐在墙角里张望的人”，听起来，似乎她不甘于被“好学生”这样的身份简单定义。或许王越和其他同学的差异，从中学起就开始显现了。

王越“走出去”的第一步，始于模联。高中时期，王越参加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模拟会议，当时她代表阿根廷。“那是第一次和那么多人在一起只讲英文，发现自己其实还挺能说，觉得和人打交道挺好玩的。”王越回忆。后来她又参加了 HARVARD-2010 UNEP 会议，和来自哈佛的代表们讨论有关化石能源的问题。这次活动让她见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拥有各异经历的人，“感觉到世界真的很大，一定要成为一个

国际化的人”。同时，她意识到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大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也为她日后为促进中美学生交流做出的努力埋下了伏笔。

高考结束后，在管理、经济等众多热门专业的选择下，王越坚决地选择了元培的政治经济哲学(PPE)专业。这是北大元培学院开设的一个前沿交叉专业，并不被很多人了解。“当时的初心是想要从政，报效国家，造成的直接结果是父母需要花上比别人多五分钟的时间来介绍自己的孩子是学什么的。”王越笑称。

当问及自己在元培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哲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时，王越



说，大概是——自由和思想。王越觉得，政治经济哲学是一个还在发展的、不能被完全定义的专业，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自己对它加以定义，并不断丰富创造。学生甚至可以参与制定自己的教学计划，不局限于政治、经济、哲学三个领域，可以广泛涉猎法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用自己的兴趣定义这个专业，以及大学四年的学术生活。正因为这种独特性与个性，每个人从这个学科中收获的知识、经验、体会都不一样，发展方向也非常自由，有学者、商界精英、家族企业接班人……未定义的学科，造就了自定义的学习体验。

对于王越来说，过去的两年多的学习集中在读书和讨论上。课上老师会介绍很多思想流派，课下王越就把这些流派的代表作找来看，其中不乏英文的大部头书籍，以补充课堂讨论。正是这种读书、思考、讨论的周而复

始的循环，铸就了王越的逻辑思维与独立思考能力。王越如此看重并珍惜自己这两年多的阅读经历，以至于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所有的人都接触到各种哲学的思想，掌握哲学家思考的方式和工具，开始阅读、开始思考。她说，这也是她以后想努力的方向。

未定义：FACES 的“重塑”

进入北大，似乎大家对于一个“国际化”的学生的期待，就是加入 SICA（北京大学学生国际交流协会），然后参与很多很多的交流项目。但王越不是这样，她看准了 FACES，就只报名了这一项目，并一直留了下来，直至成为了项目的副主席。

“FACES 整体上改变了我的气质。从前的我看上去活泼，但是交流时还是会发现我腼腆害羞的一面。在

FACES 的工作经历让我不再害怕和人打交道，让我发现每个人的闪光点，让我想要去了解观察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成为朋友，并把每一件事做的很有趣，有自己的特质在里面。”

斯坦福学生的乐观果断也对王越产生了影响。“刚开始我做活动时会有很多的顾虑，常常会想如果失败了怎么办。但是斯坦福的学生不一样，他们会更关注事情成功后产生的效果，而不会太多地被风险阻拦。和斯坦福项目主席徐川的交流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和勇气。”王越接手 FACES 后，对整个项目的组织架构做了改动，按照本年度讨论主题的特点重新划分功能模块。为了使中美学生更好地进行交流，她还创新性地设计出一个小型讨论会，分为三个主题：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民主、国家形象与爱国主义，每个主题均由教授主持，学生自由发表意见，进行思想交锋。交流的

效果非常好，根据活动后的反馈统计，讨论会是所有活动中得分最高者。

未定义：“我”是谁？

大三上半学期，王越被芝加哥大学的交流项目录取。“想到自己之后可能会出国，觉得应该提前适应一下。最大的原因，其实是对于美国的社会文化感兴

趣。” “在 FACES 的工作经历让我不再害怕和人打交道，让我发现每个人的闪光点，让我想要去了解观察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成为朋友，并把每一件事做的很有趣，有自己的特质在里面。” 尝试、

去认识美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在学习之余，她特别留心观察身边不同的人，观察这个不一样的社会。芝加哥大学的留学生宿舍有一个很大的厨房，王越并不是很擅长厨艺，但是她每天还是会去厨房晃一圈。“厨房是一个社交的好地方，可以了解很多国家和背景的人，和他们一起吃饭，听他们分享自己的故事和生活经历。我原来午饭都是十分钟就吃完，但是那段时间我经常一顿饭吃一个小时。”

在交换的时候，王越一个人踏上了 10 天的环美背包旅行。“旅行的时候，我时刻都能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外来客，是和那些住在这里、长在这里

的人不一样的人，从头到尾都能感觉到深深的孤独感——虽然孤独，又很平静。”王越将这次经历概括为一次“封闭的自我成长”。没有网络，看着地图到处走走看看，遇见不同的人。在一个青年旅社，王越的下铺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奶奶，满头银发，但是整个人容光焕发，她和王越说她很喜欢和年轻人旅游，在王越眼里，

她是旅途中千千万万拥有“卡里斯马”气质的人的一个。“交流的意义应该是走出去，去看外面的世界，去看那些拥有完全不同轨迹的人的生活。”

王越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曾有过很多思考。最初的思考起源于大二暑假参与的一个由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组织的 NGO，Symposium。在活动中，王越关注成员各异的个性。“组织中有很多国外的学生，他们的经历和我们那么的不一样，思考问题的方式也那么独到。我开始关注每个人的个性，思考那些有趣的人是通过什么样的环境，才终于成长为这样的人？这样的成长模式可以复制吗？”

这个组织致力于将国外大学的博雅教育引入中国高中，主要的活动形式是读书讨论会，王越是活动的“助教”，

除去组织讨论之外，还要设计讨论后的思考问题。“我第一次成为了教育的施予者而非接受者，这种反向的经历让我感觉到，原来我可以用自己的想法去感染、引导甚至塑造别人的想法。”例如在进行关于《孟子》讨论时，王越设计的思考问题是：自我和他者的界限在哪里？在什么程度上我们是完整拥有我们自己的，而不单单是与他者的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王越希望通过这样的问题使学生开始思考自身，向内寻求，每个人究竟从什么角度可以算作“一个人”，而不是别人的附属？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究竟有没有自己，我们如何定义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学生表示，这个问题自己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在思考的时候关注到了很多之前不曾关注的问题，思考的时候很有启发。

当问及以后的计划，王越说自己大学毕业后会先去工作。王越说，一个人之所以会发光，是在于你和别人不一样。个性不是奇装异服、愤世嫉俗，而是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并敢于实现。当我们都开始关注自己的发展，而不是被某种社会固化的发展道路束缚捆绑，遏制了个性的发扬，我们便不必时刻被朋辈压力、机会成本困扰，东张西望、左顾右盼、瞻前顾后，而是能够以豁达的、欣赏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或者身边人的成功或者失败。“我们需要知道，生活还有很多很多的可能。”合

FACES（斯坦福中美学生论坛）是由斯坦福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等五所学校的在校生作为组织者的，每年通过举办大型交流论坛以及相关校园活动的交流项目。它致力于促进中美对话，连结中美未来的领导人，提高双方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在过去的十年里，FACES 致力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加强中美优秀学生领袖之间的交流和相互了解，化解中美关系中历史、现实等多方面的误解和信任缺乏的局面，为建设更具实质性的良好关系奠定基础。



走入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

文 / 吴悠 谢天 李海桐

斯坦福大学本科生访问研究项目 UGVR (Undergraduate Visiting Research Program) 自 2008 年启动以来, 已成功举办六届, 入选学生可在斯坦福工学院教授实验室进行为期 10 周的暑期研究项目。科研领域涉及材料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机械工程、生物工程、电子工程及化学工程等。

2014 年暑期, 北大共有 18 名同学入选该项目, 成功赴美开展科研实习。从以下三位同学的总结报告中, 我们可以发现中美两国科研文化的碰撞, 以及他们收获的成长。

吴悠

2011 级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UGVR 访问研究项目，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在跟随 Chuck Eesley 教授进行科研学习的这两个月中，我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框架有了初步的认识，在纷繁现象中探寻规律，在实证研究中探讨方法，在不断尝试中探究知识，过程中有艰辛，回味却是甘甜。

探寻

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是研究的起点，对现象背后规律的解读形成了假设，基于已有理论研究和实证数据对假设进行验证，就形成了一个内容有趣论证严谨的故事。这个暑期，我的主要工作是修改一篇论文，根据审稿人意见，从理论框架、研究假设到实证模型和研究结论几乎都需要修改，不断修改的版本和原来论文在内容上的关联越来越弱，最后可能退回到起点——现象本身。当实证数据不能很好地支持假设，或者替代性的解释无法很好地排除，或者不同理论的解释结果相互抵牾而又难以调和的时候，回到原点常常是一种艰难而勇敢的选择，重新观察现象、提出假设、构建模型、验证猜想。我暑期的前半段时间主要用于读文献、修改理论部分，后半段时间用于跑回归、修改实证部分，按照预期在月底能够完成最终修改稿。但事实上，回归结果并不理想，花了一个月修改形成的理论框架并没有得

到足够的数据支持。这让我觉得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在和导师、学长的交流探讨中，我才逐渐意识到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常态，而研究的进程并不是在原地打转而是在螺旋上升。

探讨

虽然大部分时间是在独自探寻独立思考，但科研并不是一个人的战斗，组会上和导师、学长们的探讨对整个暑期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理论学习过程中，导师和学长会先给出一些经典文献作为基础阅读材料。研究中遇到的有些问题在经典理论中没有明确的阐释，通过交流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并且讨论到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思路往往为下一周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同样，导师和学长对于实证思路方法也会提出很有价值的建议。我之前学习过初等计量，但对统计方法的应用并不是很熟悉，学长在实证方法上的一些指导也让我受益匪浅。此外，MS&E REU Meeting 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REU 是斯坦福本科生的暑期科研项目，每周会邀请 MS&E 的教授或者博士生进行讲座，为希望进入学术界的本科生答疑解惑。

探究

探寻中的彷徨可以通过共同探讨找到方向，但探寻中的困惑却还要靠独自探究找到答案。尽管是在暑期，教授和学生也都相当忙，所以绝大部分问题都要靠自己查资料解决，在不断尝试中摸索出路。更重要的是，社科研究不同于理工科，化工系的小伙伴能每天和学长一起做实验，机械系



的小伙伴能经常和导师一起搭仪器，但我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在办公室看文献，搭框架，跑回归。所以心态浮躁的时候会感觉有些寂寞，但沉下心来思考的时候却很享受这份宁静。虽然说两个月的暑期实习多少有些闭门造车的意味，没有走到现实中去观察生活，没有下功夫去收集数据，也就算不上真正的社会科学探究。但通过分析文献资料中抽象出的社会现实，思考现象背后的问题，不断提出猜想并试图验证，我初步体会到了尝试构建知识的乐趣。

谢天

2011 级
化学分子与工程学院

我的 UGVR 项目导师是斯坦福大学化工学院的鲍哲南（Zhenan Bao）教授，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基于碳材料的太阳能电池。下面简单谈谈我参加这个项目的几点收获。

首先是对实验室成果与产业化的了解。作为北大化院的本科生，我们接触更多的是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而对于这些成果与产业化之间的环节知之甚少。虽然在 UGVR 项目中，我所在的组也是一个比较学术的组，与化院大多数组一样主要关注于科学问题。但是，仍然有一部分课题在关注如何将组内之前的成果进行放大，利用工业生产常见的一些流程来实现原先只能在实验室内达到的成果。另外，UGVR 项目还会组织参观一些在硅谷的公司，体验硅谷独有的公司文化。我认为这些经历对于将来想要进入企业或者创业的同学能有很多启迪。

然后则是对于海外生活实际情况的了解。相信不少同学对于美国的生活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加州作为海外华人的聚居地，这个项目使得我们能够与在当地生活的人，包括学生与定居的华人，有很多的接触和了解。毕竟，对于将去美国进一步学习深造的同学，很多人需要面临毕业后去向的抉择，这些信息对于研究生项目的选择会有不少的帮助。另外，在美国生活的两个月，我也深深体会

了国外相比国内的孤独之感。在北大，很多时候我们的夜生活要到晚上 10 点之后才正式开始，小西门外的食街也是在凌晨 2 点之后才会渐趋平静。而在美国，常常到了 6 点之后街上的人就很少了，绝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夜生活只能在宿舍里度过。

最后是能够认识一些不同领域的牛人。每年 UGVR 项目的 18 个课题组都包含了各个不同的专业，参加这个项目让我认识了 17 个不同领域的大牛同学。通常我们的社交圈被局限在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范围之内，这让我们丧失了很多了解新事物的机会。与他们的交流让我能够跳出原有的专业，从一些其他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所作的工作。比如，在与清华化工的一位同学交流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有时候即使我们能够将原有的反应效率提高一倍并工业化，工业界也不会选择新的方法，因为重新积累工业生产的经验本身，就是一项耗时数年的工作。相信这对于大多数学化学的同学来说是很难想象的。这个项目给我东西还有很多，相信这些收获也会是因人而异的。



李海桐

2011 级
微电子系

在 UGVR 项目中，我以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 Philip Wong 教授课题组成员的身份，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关于下一代存储技术的研究。感谢北大国际合作部和斯坦福工学院提供的宝贵机会，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感想和经验。

一是关于个人未来的选择。我想有一部分关注海外科研和交流项目的同学都有出国的意愿，希望借此提高竞争力。我在这个暑期项目开始前，在申请项目的前后，最开始的想法也是如此。我暑假的课题是继续我们和这位教授之前的合作研究，我的目标是整合我自己之前在北大的部分工作和斯坦福课题组的已有成果，做到领域内的 state-of-the-art，并投稿顶级会议。随着暑假飞快地过去和工作接近尾声，我

“北大相比清华一个重要特点，个人认为，是价值的多元化。”

最后回顾来整个项目带给我的思考，觉得远比实际的成果更为有价值。北大相比清华一个重要特点，个人认为，是价值的多元化。而这种价值多元化，是需要建立在个体对自身和未来清晰冷静的思考和规划上的。对于想出国的同学，不管最初简单的目的如何（我相信最初的目的大多是很简单的某个想法），都需要有个契机让自己进行更深度的思考。对我来说，参加这个项目就是这样一次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应该鼓励更多同学去申请或自己联系暑期海外研修的机会，所谓的开阔视野并不是核心，最有价值的是在新的环境中审视自己对未来的规划。

作为一个工科学生的体会和经验：如果想清楚了个人选择的问题（怎样有助于达到这一点呢？比如，我建议大二暑假有机会就出去走走，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工业界，都去体验下），并且对 Stanford 很感兴趣，那么尽早准备，提升实力，强烈推荐 UGVR 项目。北大的工科不如文科学

世闻名，也不如理科历史积淀深厚，但我觉得并不乏一些世界上最好的课题组、老师、学生在带领着年轻的工科飞速成长。身在北大，能参与进这个进程是令人激动的，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UGVR 是一个最看重科研能力和经历的项目，所以尽早进入一个合适的实验室，尽早开始独立研究，甚至在不同实验室积累多方面的技能和经验，总之条条大路通罗马。对于工科来讲，我并不认为做科研就意味着你以后就认定要去学术界。这是个科技改变生活的时代，我所从事的新型存储器研究，对未来的展望是个人电脑、移动设备未来能够实现超高速数据传输，在毫秒的时间内完成开关机，断电数据原样停留……所以对于工科院系的同学，尽早接触最新技术的研究，如果有和国外高校的合作更好（暑假前的一年时间我们和这位教授完成了四项课题的合作）。

最后，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高效的项目组织工作。感谢斯坦福大学工学院提供的宝贵研习机会。以上只是我们所经历的 UGVR，18 位参与者心中就有 18 个 UGVR。合



福利院的孩子们

用一颗爱心走进哥伦比亚 ——AIESEC 哥伦比亚海外志愿行

文 / 李金珂



孩子们的作品

寒假对大学生而言，是个释放自己的好机会。有的在旅途中，有的在亲朋好友的聚会中，还有的在酣畅淋漓的游戏中。但是也有人，漂洋过海，带着一颗颗爱心去往另一个国家，在陌生的国度里，他们和来自不同地方的青年学生一起，开展志愿服务，接触人生百态，体味文化风俗。

2015 年寒假，北大的张韵凝、孙倩楠两位学生就参加了 AIESEC 组织的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 We Speak 海外志愿者项目。

有这么一群孩子

大洋彼岸的波哥大，在无秩序的 22 街区，有着一栋干净的小楼，这是一个福利院。被遗弃的六十八个孩子便聚集在这栋三层小楼中，他们或是孤儿，或被入狱、吸毒、从事性工作的父母寄养在这里。他们每天吃的是政府补助的食物，每天清晨需要小心地穿过六个街区上学，在政府支持的公立学校里完成直到高中的学业。于是便有了这样一群志愿者，远渡重洋，

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些孩子。此行哥伦比亚，她们的工作便是教这些孩子们学习英语。

每周工作日的下午两点到四点半，便是她们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那是一群天真活泼、毫不设防的小孩子，“我也感到很幸运，在抵达这个南美国家的第三天，就遇到了这样一群孩子——他们比我见过所有的人、甚至所有小孩子都要热情，见面的第一天就向你展开小小的臂膀，给你一个比暖阳还要灿烂的微笑。甚至还没记清

你的名字,就扔给你一个足球——‘喏, profe, 你来帮我们守门吧!’”当西语系的张韵凝回忆起当时的画面时,脸上还挂着幸福的笑容。

“其实这里 NGO 项目的系统性还是有所欠缺的,没有教学的规划,全部需要我们自己设计教案。”虽然福利院来来往往过许多的志愿者,但是却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体系,每一

次的志愿者们都试图使福利院运转得更科学,但似乎并不成功。很快,她

们便感到了棘手,如何教这些孩子?有人可能以为,教小孩子英语,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真正的面临这一问题时,才发现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孩子们的年龄各不相同,每一个孩子的英语基础也相差甚远,没有教学设备,甚至没有固定的教室,有的只是一块小黑板。语言的障碍使孙倩楠与孩子们的交流都成为问题,哥伦比亚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对于从未接触过西语的她来说,孩子们口中的外语使得一切都变得更为困难。

但是这些并不能难倒她们。项目团队里还有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志愿者们,他们一起从最基础的 abc 开始,会西语的负责组织孩子们坐在一起并下达简单的指令,不会西语的就用最简单的英语配以肢体动作来教孩子。虽然她们的教案不够完美,她们还缺乏教学的经验,但她们在努力,孩子们更努力。“大一点的几个女孩很聪明,每个单词跟读了几遍后就能

完全掌握下来;而剩下的孩子虽然年龄小,也总是看着我的唇语,扭捏地一遍遍重复着读音。”对于那里的孩子来说,英语发音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她们惊讶地发现,孩子们总有问不完的问题,似乎总想趋近于完美,一遍一遍的问,不厌其烦的问。下午的福利院中总是飘荡着一个又一个扭曲的英语单词,虽然孩子们几乎无法标

准地读出每一个单词,但是每一个人都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用心记着。经常就在这一遍遍的对着一个单词的上百次重复中,太阳已然悄悄西斜。

就是这么一群孩子,像天空那抹最纯净的蓝,那抹蓝里飘荡着对远方的向往。

有那么一些时候

除去每个教孩子们学习的下午,

其它时间便都可以由她们自由支配。在空闲时漫步于波哥大街头或许是一场不错的体验,但是,陌生的城市加之曾经听说的或经历的不安全因素偶尔也会让她们有点畏而却步。她们在波哥大丢过钱包,也丢过手机,所以每次走在哥伦比亚的街道上,她们总是空着手,看看风景聊聊天,不敢玩手机、不敢听音乐。虽然这是一种麻烦,但同样也带给她们更多的观察这个城市的时间,她们的视线从手机中解放出来,更多地落在了波哥大街头。因此,她们便能更加深刻地体会,走在哥伦比亚街头的乐趣。

在她们有限的时间里,她们尽可能地玩耍着,体验着哥伦比亚的文化。孙倩楠的 host family 做得一手拉美风味的好菜,趁着在家的时间,她总会在厨房打下手,学一学这种做饭的方式。难得的周末,她们更会好好利用,去附近的城市看一看,玩一圈,感受一下其他城市的风采。Medellin、Cartagena,临海的城市似乎总是能够让人放松身心。蓝天、白云,整洁的街道,绚烂的色彩,浓烈的拉美风



⊗ 夕阳下的学姐们

情，一望无际的大海。海滨城市大概有一种能够让人忘却烦恼的魔力。把配乐调到 Sarah McLachlan 的 Angel，细细走着，欣赏着，品味着。跳下 Cartagena 的古城墙，迈进加勒比海，看日落；乘着缆车在夜里掠过 Medellin，看路灯将远处的山峰一一点亮，于寂静中看一切贫穷消匿，平和蔓延。

在那些时候，风是甜的，梦是跳跃着的。

有那么一点期待

每次的志愿者们离去后，便会存在一个空档期，没有人来到这里，没有人帮助福利院里的孩子们。在看见了当地 NGO 存在的缺陷之后，张韵凝便拉起小伙伴们，做起了微信公众号。

最开始总是最艰难的，选题、建立平台，每一步的推进都需要精心的考量，都有着繁琐的工序。然后，iChildren 微信平台成立了。有了平台，他们的计划便慢慢走向正轨，每天必有的推送，向外界宣传着 NGO 的故事，介绍着哥伦比亚的风土人情；撰写众筹的文案，筹集资金以改善孩子们的住房条件。一步步的，平台的关注数量一天天增长，众筹里的筹款也一点点累积。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公益是可以有影响力的”，张韵凝如是说。虽然每天都是如

此忙碌，但是学姐的内心是快乐的。白天需要工作，晚上才能够抽出时间去维护平台，每天的推送使得他们几乎天天熬夜到凌晨四点。对着微信公众平台的网页探索每一个按键的功能，跟着教程学习如何制作视频，他们一步步摸着石头，终于从磕磕绊绊走向平稳。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他们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每天发布有关孩子情况、教学成果、志愿者心得、哥伦比亚风土人情的推送；发起的众筹一共筹集了善款共 5096 元，这些筹款被用在了改善收容所的卫浴设施、厨房设备，并为孩子们购置了新的学习用品。

“也许我们走后留给孩子们的只是一座修缮过的福利院、几句磕磕绊绊的英语而已，还有更多的需要他们自己承受——不完善的教育制度、低标准的生活保障、不安定的生长环境。”确实，一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特别是当现实残酷地呈现在面前时，人们才会察觉自己的渺小。但是她们还是在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希望能够给那些孩子们带去更多的帮助。

“有一天，一个孩子跟我说，她想到这个她以前未曾听说过的地方去闯荡呢。”这是一个孩子的期待，志愿者们也期待着，她们给孩子们带去的除了几句英语和一栋修缮过的房子，还有希望和梦想。

AIESEC 成立于 1948 年，是一个国际化、非政治、独立、非盈利组织，完全由青年学生和新近毕业生运作。在全球 113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86000 名成员，是全球最大的由青年学生独立运作的组织。AIESEC 致力于提供一个供青年学生发展领导力的平台，为年轻人提供文化对话、公益实践和商业实习的机会。其海外志愿者项目致力于为在校大学生提供为期 6 周左右的海外志愿者活动机会。

有那么一丝感悟

生活在哥伦比亚的这 5 个星期，给她们留下的最深印象，是文化上的冲击。第一次亲眼看见社会的贫富差距、第一次走在无序的街头、第一次近距离体验拉美文化等。

张韵凝说：“作为西语系的学生，这次项目给了我一个能够和第三世界的西语国家以及人民接触的机会，能够近距离地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以及社会问题。这些大概比真正的志愿经历更有震撼力。”的确，体验不一样的文化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也许会在过程中心生惶恐，但之后回想，可能更会觉得这些是珍贵的经历。每一种文化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一面，每一次的体验都会带来不同的人生思考。当广阔的世界以一种原始粗粝的姿态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可能才会让我们更加确切地感受到生命的美好，才会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也才有可能激发出内心深处的思考和行动。孙倩楠就感叹，“我觉得生活在中国真的很幸福”。

除了哥伦比亚，其他地方同样存在着海外志愿者的身影。在 2015 年寒假，AIESEC 共将 10 位北大同学送往斯里兰卡、印尼、埃及、哥伦比亚、加纳、菲律宾等国家，参与了海外公益项目。不同的地方也许经历着不同的故事，但他们都用脚丈量着世界的距离，用心轻叩着社会的大门。合



李佳凝到达爱丁堡



苏格兰公投

走出去看世界 ——爱丁堡大学游学记

文 / 李田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也许是很多人心底的渴望，然而只有真正迈出坚定的步伐，走出自己既定的生活圈子，才能亲眼领略这个世界的广阔和美好。

出国留学是新闻与传播学院2012级本科生李佳凝一直以来的打算，她选择在大三上学期参加交换项目，希望能够给自己一个体验的机会。一学期的爱丁堡交换学习之旅，让她更清晰地认识了世界，也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的内心。

交换生活：吐槽与收获

在国外学习生活其实并不容易，语言、食物、生活习惯……很多事情都与在国内大不相同，需要慢慢地适

应，吐槽也就成了初到爱丁堡的李佳凝的日常。

到达爱丁堡的第一天，身着薄衣薄裤的她就被爱丁堡的阴冷天气弄得措手不及。“我是北方人，没有经历过那种湿冷，真的是又湿又冷。”她感叹道。

英国的食物是出了名的“黑暗料理”，英国人通常吃生冷的东西比较多，这也折磨了她了好一阵子。李佳凝住在学校的学生公寓，食堂仅提供早晚餐，午餐需要自己解决。英国的餐馆价格十分不亲民，大多数留学生都会选择自己带三明治、面包等简单的午餐。有时候李佳凝也会去校外的餐馆改善伙食，“有一次在一家中餐馆吃到了麻婆豆腐，简直感动哭了。”她说，吃饭虽然不是不能将就的大问题，

但也着实让她吐槽了一个学期，并且非常想念北大的食堂，“回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各大食堂吃个遍”，她开玩笑道。

李佳凝住的公寓有很多大一的学生，她们刚上大学，精力充沛，经常在宿舍里举办派对，喝酒狂欢，还会在半夜敲别人的房门。更有甚者，还会偷吃她放在公共冰箱里的面包，对此李佳凝也是十分无奈。

当然，除去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槽点，这一个学期带给她的更多是收获。李佳凝的交换生活过得非常充实，她说，感觉这四个月过得特别快，刚刚进入状态就已经结束了。

在李佳凝看来，爱大的学习比北大要更紧张。每人每学期虽然只选三门课，数目少，但压力大。不仅要尽

快适应语言环境，听懂老师上课的内容，每周还要读长长的书单。每门课后还配备了讨论课，需要在小组里进行讨论和发言。她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三门课程，分别是社会学课程、艺术史和影像中的中国社会。李佳凝感受颇深的是，如果真的想做学术，还是要少而精地去做。爱大教授和学生的批判性精神和活跃的思维也让她印象深刻。她说，在爱大学习和在北大是两种不同的风格，不能说哪一种更好，但她确实很享受国外的这种学习氛围。

谈到对苏格兰和爱丁堡的印象，李佳凝说，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画风非常不同。苏格兰充满着中世纪古堡的气息，爱丁堡最新的建筑都建于17-18世纪，爱大上课的地方也是古堡一样的建筑。爱丁堡整个城市的节奏很慢，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都是慢而精的样子。习惯了在北大忙忙碌碌的她，很喜欢爱丁堡的慢节奏，“在那边，你能静下心来想一些事情，学一些东西，或者静下心来跟别人交流”。

在课余时间，她会参加爱大的社团活动，也会自己出去走走看看。

李佳凝刚到爱丁堡的那段时间，

恰逢苏格兰独立公投。第一次真正地置身于世界重大政治事件之中，让新闻专业的李佳凝十分兴奋。她和同学一起去了爱丁堡的议会广场、投票点等地，见识了很多场面，如排队投票的人们、长枪短炮的媒体和互相对垒的两大阵营等，拍下了很多现场的照片，还在朋友圈直播了公投的情况。公投那天报摊上的各种报纸，她也悉数买回去研究。当时她还接受了北大青年关于公投的采访。李佳凝说，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这种国内体会不到的政治氛围，作为一个有新闻理想的人，她特别新奇而兴奋，“觉得不算白去一趟”。

学期末的时候，李佳凝来了场一个人的旅行：12天走了9个城市，把英国几个重要城市由南向北走了一遍。这是她第一次独自策划、自己搞定路线和食宿的旅行，她感到收获颇丰，“学到的不比在学校少”。旅途中她在青旅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有中国人，有台湾人，还有思想极左的英国老太太。“对我自己来说，这可能比较大胆，比较有趣的一次经历，以后有时间就多到其他地方去看看。”李佳凝如是说。

在爱丁堡交换的一个学期，李佳凝接触了很多对她来说特别新鲜的东西，这也更坚定了她以后要出国读研的想法。她认为，短短半年的经历虽不足以对她个人或者其他产生多深远的影响，但能够通过这一次经历看清未来几年内要走的路，就已经很宝贵了。

中外交流： 那些误解依然存在

在旅途中，李佳凝曾在青旅遇到一位打扮非常新潮时尚的英国老太太，她是英国比较激进的报纸《卫报》的忠实拥趸。在和李佳凝的对话中，她极力宣扬“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现在的GDP增长，构成了对西方的威胁。为此李佳凝和这位老奶奶展开了辩论，然而最后还是没能说服她。

“这是我第一次跟持有这么鲜明的‘中国威胁论’观点的人讲话。他们的想法让我挺吃惊的。”李佳凝说，其实在她所接触到的英国人里面，不乏持此论调的，有时跟别人说自己是从中国来的，还会有异样的眼光投来。

近年来，中国出国留学的学生越来越多，然而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却未能同步增加。

李佳凝说，在一起去交换的同学中，有沉默寡言的，也有开朗积极的，但在讨论课上整体表现都不活跃。中国人习惯深思熟虑之后再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外国学生则有什么说什么，观点经常比较随意和激进。所以中国学生有些融不进那种讨论的文化。

李佳凝在一堂400人的大课上认识了一个在爱大读本科的中国女生，她说，中国学生虽然可以和外国学生玩得很好，但却很难交到知心的外国



朋友，因为整个的价值观不同，所以很多事情无法向他们倾诉。根据李佳凝的观察，很多中国留学生是“抱团”的，他们会主动结识中国的交换学生，约出去玩或者谈心，而不太会跟自己的外国朋友或室友讲自己的心事。

李佳凝认为，现在到外国去的中国人很多，然而人虽然在那里，但我们的观点却由于种种价值观或者交流上的障碍没有表达出来。西方人很少能够通过与中国人的接触来有效地了解现在中国的青年一代是怎么想的，中国的现实是怎么样的。他们不问，中国人也不说，没有一个有效的沟通，西方人所了解的中国就还是他们想象中的中国或者媒体报道中的中国。

其实正如中国人也时常会对英国有一些刻板印象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倾向于把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用一个形容词来描述它，这其实是不科学和不准确的。在旅途中，李佳凝一边读一本名叫《Watching the English》的讨论英国国民性的书，一边回想这一个学期所见的人和事，她说：“我觉得真的没有所谓英国人是什么样的，包括这本书，也都是刻板印象。我在学校里接触的年轻人、老师和售货员是不同的画风；我走出苏格兰到伦敦，在伦敦的景点、地铁上、旅馆里，接触到的伦敦人和爱丁堡人又是两种画风。”伦敦教堂的守门大爷是

俨然皇家卫兵的高冷，而爱丁堡的人们则更加随和亲切。苏格兰公投时，苏格兰最大的城市格拉斯哥发生了多起暴力事件和流血冲突，而爱丁堡则一切平静，同样是苏格兰的城市，这两个地方的人在面对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这些差异，只有身处其中才能够体会，非要把英国看作一个整体，就好像要把北大、把中国看做一个整体，是无法准确概括和描述的。所以，在国与国的交流之中，需要更多置身其境的体会，更多打破隔阂的了解。

李佳凝为此也做出了一些自己的努力。在她的极力邀请下，她在爱大的一个语伴将在今年秋天来北大交流。

李佳凝说：“我觉得全世界的青年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那么循规蹈矩，都有一些自己新的想法。”所以，我们年轻的一代应该承担更多增进交流和消除隔阂的责任。

向外的脚步， 向内的心灵

英国的下午五点，是北京时间晚上零点。下午五点到晚上睡觉的这段时间，对初到爱丁堡的李佳凝来说是最难熬的——国内的同学们都已经进入梦乡，一个人住的她总是感觉自己进入了真空的环境。

李佳凝是个性很独立的女生，从来不会过度依赖某个朋



李佳凝在爱丁堡的草地上

爱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成立于1583年，位于英国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市，全校分设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科学与工程学院、医学与兽医学院三大学院(College)，下设22个小学院(School)。时至今日，曾就读、曾任职或现任职于爱丁堡大学的校友中，共有2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3位英国首相。

友，也不恋家。然而到了英国后，她才发现，家人、朋友和她所熟悉的环境原来是那么重要。如一个同学朋友圈所写：

“母语就像盖在你身上的一床温暖的被子，有它的时候你不觉得，但是当把它拿走的时候，你才觉得刺寒入骨。”

在采访的最后，李佳凝说：“出国交换给我最深的感受是，你越往外去看世界、去闯荡，看到的東西越多，你越觉得你是你自己。越是在英国，你越能认同自己在北大所学到的东西，越能认同你作为中国人的东西，越能发现那些‘当时只道是寻常’的东西有多么宝贵。”

脚步越向外，心灵越向内。所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珍惜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就是最好的状态。合



燕园：新的起点

——记 2015 年港澳台优秀高中生体验营

文 / 潘冠维 董怡楠 董言

初夏，晴空。燕园迎来了港澳台的19名优秀高中生，他们将作为“2015年港澳台优秀高中生交流体验营”的营员，进行为期四天的“燕园之旅”。

在四天的交流体验活动中，远道而来的同学们将在校港澳台学生志愿者的陪同下，了解北京大学的历史、环境、学术氛围和生活气息，为大学生活提早准备，在今年九月翻开自己属于北京大学的人生篇章。

初入燕园 触摸北大

5月12日中午，北京大学体验营开营仪式暨欢迎午宴在勺园7号楼燕园厅举行，参加仪式的嘉宾有北京大学副教务长、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关海

庭，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副院长张飞舟，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何姝，招生办公室主任王亚章，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王勇，招生办公室副主任李喆、伶俐，以及部分招生办公室和港澳台办公室的老教师们。北京大学本科生、两岸文化交流协会主席张颢骞主持仪式。

开营仪式由关海庭教授致欢迎词。在讲话中，他对来自港澳台的优秀学子表示热烈欢迎，同时简要介绍了北京大学的教学和工作情况。关教授认为，北京大学有三个最鲜明的特点，一是对本科教学工作的极大重视，二是对培养有思想的学生的深刻理念，三是越来越国际化的校园交流平台。他援引校长林建华的话，强调北京大

学致力于培养“引领未来的人”，并对在场的港澳台学子表达了他的鼓励与希冀，勉励他们今后为自身发展努力，也为北京大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在主持人的倡议下，在场全体成员共同举杯，庆祝交流体验营正式开营。席间，北京大学的领导老师与港澳台同学亲切交谈，了解对岸的基础教育情况，并向大家介绍内地高校的特色及北京大学的教育理念，在校港澳台学生志愿者也分享了他们在北大生活学习的感触与乐趣。笑声，谈话声，以及酒杯轻碰的回响，都传达着北大对这群年轻学子的欢迎与接纳，仿佛在轻轻地告诉他们，这是北大，有着可以触碰的真实。

远涉千里 不忘初心

本次交流体验营成员是来自港澳台的19名高中生，其中香港地区6名，澳门地区3名，台湾地区10名。然而，港澳和台湾地区同学在燕园的体验却不尽相同。港澳地区的同学已经拿到了北大的录取结果，他们此前通过所在高中推荐，参加了北大校方组织的面试，并获得了录取资格，因此他们的心态很轻松，携着对自己未来大学的期望和向往，感受燕园；而台湾来的同学可能更为紧张，他们在今年2月份完成了台湾地区的大学学科能力测验，凭借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到北大面试的机会，但按照往年50%的录取率，他们其中半数的人最终将与北大擦肩而过。然而，当记者问及在开营仪式前进行的面试时，同学们却表现得很轻松，“面试一组五人，每个人根据老师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教授们都很和蔼，就像聊天一样，我觉得我答得不错”，说罢，这位台湾男生露出了自信而阳光的笑容。

来自香港的陈佳庆是一个长相帅气的小伙子，已经确定被元培学院录取。他的兴趣爱好非常广泛，也参加过很多高中的社团活动，给人的印象开朗健谈、自信稳重。当提及高中时的经历，他特意强调了他在高中时参加了辩论队，并且在其中投入了大量时间，甚至可以说高二以后所有课余时间都用在了自己热爱的辩论上。他坦言，加入辩论队是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决定。在此之前，他一直是有些内向与腼腆的，但心中一直喜欢辩论，便鼓起勇气一试，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现在他也在准备大学前最后一场在澳门举行的辩论比赛，并且下决心提高自己用普通话辩论的能力。除此，

他也表达了对自己未来四年大学生活的展望。当初梦想来北大读书的原因就是，北大有很多非常出色的人才，希望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并成为永远的知己，在这坎坷的荆棘遍布的人生路上，携手向前。北大的图书馆也非常吸引他，

他表达了自己多读书读好书的决心。

席间还有几位来自港澳台的学生，现在虽然分布在北大各个院系各个年级，但一听到家乡的学弟学妹要

来北大，便都主动来当志愿者，在他们眼中，看到这些学弟学妹就仿佛看见了当年的自己。由于来自台湾的同学这次是来面试，还在等待一个未知的结果，那份忐忑与不安是那样熟悉；曾经的自己也是这样执着地坚持着，努力着，拼搏着，也终于冲出重围得以与燕园相依相偎。而如今虽然会有挫折与坎坷，也会有孤单无助的时刻，

笑声，谈话声，以及酒杯轻碰的回响，都传达着北大对这群年轻学子的欢迎与接纳，仿佛在轻轻地告诉他们，这是北大，有着可以触碰的真实。

但一想到当初勇敢的自己，便从心底鼓起了勇气。其中来自台湾的邱琼仪和我们分享了她的志愿者感受。她是来自元培学院大一的学生，主修古建筑方向。她坦言一开始还会担心要怎么和这些同学们熟悉起来，如何才能

不存在距离感。后来发现自己的担心完全就是多余的，这些学弟学妹都非常活泼，并且不停地围着她和她聊天，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让琼仪觉得非常幸福。短短几天

时间，已经让他们彼此熟悉。

“为什么要来内地上大学？”这可能是所有港澳同学都会被问到的问题。在与这些高中生交流的过程中记者发现，与内地的一些学生不同，他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喜好和未来的规划都有着明确的想法，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抱定宗旨来到北大。虽然只有19个同学，但他们专业选择的范围却很





北京大学从2014年开始举办“港澳台地区优秀高中生交流体验营”，营员为港澳地区的北京大学预录取学生，以及台湾地区即将参加免试生面试的优秀高中生。交流体验营为营员设计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如参观实验室和图书馆、参加校内知名学者专场讲座、参加品牌社团领袖交流会、参观北京名胜古迹、探索文化遗产等，致力于让营员全面了解北大生活。

广泛，法学、物理、数学、政管、历史等，几乎涵盖了北大的所有专业。他们或许不了解当初红楼的辉煌，但他们看得到如今燕园的成就——“我想做物理研究，北大物理的排名是亚洲最好的”，“我的专业是历史，众所周知，北大历史系可能是我最理想的学习之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名独自赴京的香港男生，他选择的专业是政府管理，“我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出一份力，因为我们的国家需要更多优秀的人才在世界发声”。

在他们讲述的时候，世界都在聆听他们的梦。

社团文化 如梦如歌

北大的社团生活之丰富众所周知，每学期开学“百团大战”盛况，是所有北夫夫都难以忘怀的。

为了使营员更深入地了解北大生活，校方特意策划了品

牌社团领袖交流会，五个社团的负责人——澳门文化交流协会（MCCA）会长梁俊杰、香港文化会（HKCA）会长黄子权、燕园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会长孙瑀蔓、模拟联合国协会（AIMUN）学术总监何雨辰和两岸文化交流协会（CCEA）主席张颢骞，分别介绍了各自社团的组织架构、社团理念和精品活动，虽然远不能全面概括北京大学源远流长的社团文化，但也让同学们初尝了北大社团的独特味道。

与港澳台学生交流的主题相适应，五个社团中三个都与两岸交流有关。一年一度的国际文化节上少不了他们的身影，每学期的粤语班成为港澳同学发挥作用的重要场地，更有异彩纷呈的美食节、化妆舞会、学术论坛等活动，丰富的活动不仅使来自港澳台的同学更有归属感，也使内地的学生有机会对港澳台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因为这些组织的存

在，北大像一个博大而温暖的大家庭，成为每个学子的灵魂依所、精神港湾。而让人倍感温馨的，莫过于三个协会在新生入学前开办的迎新交流营，它不仅为港澳台新生搭建了良好的交流平台，也成为一种传承，在一代代学生的努力下，社团的文化得以积淀、延展，使在这个集体的每个人都得到丰富和成长。而作为北大本土社团的一部分，模拟联合国协会和燕园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经过多年的积淀，成为北京大学学生活力与创造力、使命感与责任感的集中体现。

港澳台的同学对于社团文化其实并不陌生，他们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就体验了丰富的校园社团文化。大部分同学的疑问在于如何在学习、社团及其他各类中取得平衡，对此，几位社团负责人的回应几乎是一样的——合理分配、高效利用。

“社团能让你学到很多能力，从做最简单的事开始，到项目负责，再到引领团队，最后到协调各部门的关系、与老师和校外机构接洽，它会让你终生受益”，两岸文化交流协会主席张颢骞谈了他自己做社团工作的感受，从他的讲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社团深刻的爱与感恩。

每个人的大学生活都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和决定，“韶华不为少年留”，只要过得有意义、不虚度，就是属于自己的精彩青春。合

两岸三地的同一个梦想

——记第八期“北大－台大－云大学生社会服务计划”

文／黎拂言



服务团的大学生们与秀峦国小的孩子们的合影

2015年1月，来自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和云南大学的38名大学生因为一份共同的期许相聚在美丽的宝岛台湾，在这个美好的寒假时光里圆一个关于公益、关于成长、关于友谊的梦想。这些大学生都是“北大－台大－云大学生社会服务计划”的参与者，这个已经成功举办了八期的社会服务计划为两岸三地的众多大学生们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服务社会的机会。在这项计划中，服务团的大学生们从实地调研了解到民风民情、从自发募集物资到亲手设计教案、从传统意义上的支教到更为广阔的社会服务，不仅促进了三校学生的交流和合作，也逐渐

加深了彼此的友谊，拉近了两岸青年之间的距离，让两岸三地的大学生更加亲密无间、也更加倾情投身于社会服务。

一场“奇妙的体验”

1月18日，来自三个学校的社会服务团团员抵达台湾大学，开始了他们为期八天的社会服务之旅。在台湾大学进行了简单的破冰活动和相互认识之后，19日下午，团员们怀着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踏上了前往台湾北部新竹县秀峦国小的旅途，在那里，他们即将同一群可爱的孩子们一起度过

难忘的五天，并在这个淳朴、自然、原生态的村落中探寻社会服务的真谛。

每天早上6点，团员们就早早起床，开始准备一天的活动及教案。早上7点半，伴着活泼的音乐带孩子们一起做早操和各项活动。早上8点，开始给孩子们上教案。秀峦国小的教案通常与我们平常理解的教案不同，在这里，团员们会和孩子们一起进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或是在排练话剧、进行各种益智游戏的过程中教给孩子们一些相关的拓展性知识，或是在课堂上讲授经济、生态等方面的课程，或是在活动之中帮助孩子们探索自我、培养品格。在一天的教学活动结束之



台大学生和小朋友玩耍

后，团员们会对白天的教案和一天的教学活动进行总结和反思，并提前准备第二天的教案。

“当习惯于见到背着大书包挣扎着在北京的雾霾天里上学去的孩子后，在这澄澈的几天里在如此明静的大山里看着这群同样明静的孩子们澄澈的双眼，的确是一种难得的惊喜。”来自北京大学的陈扬曾有过如此感叹。如果说团员们给这些孩子们带来了不一样的记忆，这些孩子和这次旅程也同样给了来自三个学校的大学生们一段弥足珍贵的记忆。另一位来自北京大学的成员张荷把这次社会服务形容为“一次奇妙的体验”，有很多来自大陆的大学生像她一样，几乎没有过类似的社会服务活动经历。对他们来说，台湾原生态的泰雅族村落、原住民小孩的学校、与众不同的支教活动让这次社会服务成为一次全新的体验，在丰富着他们的人生经历的同时，更让他们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精彩的多元性和无限的可能性，改变了他们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和态度。

播洒公益的种子

在团员们给孩子带去知识与温暖的同时，那些童真的脸庞与澄澈的眼神用最简单真诚的爱同样让大学生们感受到了质朴与纯真。

同学们的支教地点秀峦国小是一所地处新竹县偏远山区的住宿制小学，这里的同学都是泰雅族的小朋友，也就是台湾的原住民。这些孩子们

大多来自中低收入家庭，且失亲、单亲与隔代教养的比例超过五成，一直以来都十分需要外界给予关怀和温暖。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生活背景，对团员们而言，同秀峦国小的小朋友打交道绝非易事。“原住民小孩大多都非常调皮，不太听话。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们都不服管教，完全无法控制，课堂非常乱；可是到了后几

天相处久了，孩子们越来越听话，深入接触之后才发现这些孩子其实是非常天真善良的。”初来乍到之时，团员们常常有这样的感受。这些孩子长期缺少关爱和陪伴，所以不太会表达自己，但其实他们只是希望以这种不听话、捣乱的方式吸引大家的注意。来自北大的张荷同学还讲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每当进行探索自我优缺点的自我教案时，尤其是说到自己的缺点的时候，那些平时调皮捣蛋的孩子都会听得特别认真。所以，我们不能以特殊的眼光看他们，而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爱和关注。

在课上最不听话最爱捣乱的那个“小霸王”、爱给哥哥姐姐们起各种奇葩的外号的“大高个儿”、惊为天人的 B-box “小帅哥”……对每一个孩子，团员们都尽量地给予呵护和关怀，希望能让这些充满野性与天真的孩子更加健康快乐地成长。从前期持续几个月的精心准备，到课前无数次

地修改教案，再到在五天的服务时间里每天晚上熬夜一遍遍讨论和反思，服务团的成员们为了给孩子们更多的知识和更好的关爱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在最后这5天的时间里，团员们用精

心准备的各种教案不仅给孩子们传授了知识，帮助他们探索了自我，更用自己的想法为孩子们打开一扇窗，和他们一起欣赏外面的世界。小小的支教活动在孩子们的心中播洒下一颗颗梦想的种子，期待它们发芽、成长，最终绽放出美丽的人生。

所谓支教，其实能给孩子们带去的太少，更谈不上“支”起孩子们的

小小的支教活动在孩子们的心中播洒下一颗颗梦想的种子，期待它们发芽、成长，最终绽放出美丽的人生。

明天。面对越来越多的支教组织和形形色色的支教志愿者，我们只希望这些支教活动能给这些最淳朴善良的孩子带去有关未来的梦想和改变现状的勇气，以及对大千世界一颗渴望的心。

与台大学生的深厚友谊

在这次服务之旅中，来自台湾大学的同学们给北大的学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荷同学告诉我们，台湾的学生都特别热情、开朗、活泼，甚至像秀峦国小的孩子们一样单纯。

“他们的热情和真诚，是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就像一阵风吹到你身边，让你感受到一种欢快和自在的气息。”和一般的大学生不同，台湾的大学生通常并不会考虑太多前途的问题，而是更专注于自己的兴趣和获得内心真正的快乐。他们大多有着发自内心的公益热情，会把公益组织看做最值得加入、最有归属感的组织，把公益事业看作是值得一生去奉献的、最重要的事业。同时，台大同龄人的专注、细致、严谨以及对服务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也让大陆的同学们印象深刻。从接机时的精心准备，对行程、生活细节的详细安排，到对教案的无数次修改，跑教案和总结讨论时的一丝不苟和毫无顾忌的发言指正，台大同学的认真付出让大陆同学深深地敬佩。

旅途中团员间温馨有爱的

“北大-台大-云大学生社会服务计划”由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和云南大学联合举办，并轮流在两岸各地举行。该计划旨在选拔三校学生分别于两岸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服务活动，增进三地青年学生之间的互动，培养两岸大学生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精神，提升其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自2011年7月以来，该计划已成功举办八期，服务团在云南和台湾留下了难忘的印迹。2015年1月，第八期“北大-台大-云大学生社会服务计划”在台湾顺利完成。

互相体贴关照、在一趟趟旅途中环绕在山重水复间的嘹亮歌声、八天的朝夕相处和真心交流让这些来自两岸三地的大学生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大家不仅一起交流每个人对社会服务的看法，还会聊音乐、聊电影、聊人生。在这些简单轻松的交流中，大家不仅加深了对社会服务的理解，也加深了对海峡两岸

文化和两岸青年人的认知。尤其是对于大陆的同学，这次在台湾的服务除了让他

们接触到台湾的小朋友，给他们带去知识和欢乐，更多的是了解到海峡另一边的风土人情以及那边的同龄人有着怎样的生活状态。服务计划结束后，两岸的同学们还保持着微信上的联系和交流，相信大家都会把这次寒假之行带来的这一份珍贵的记忆和深厚的友谊永远

保存在心底。

来自三个学校的大学生团员全心全意的付出、拥有同样初衷的两岸青年的诚挚携手、举手投足之间爱的传递、台湾大山村落里淳朴善良的孩子，这是对“北大-台大-云大学生社会服务计划”最好的诠释。将自己对社会的关怀付诸行动、为一群童真单纯的孩子传递一

“他们的热情和真诚，是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就像一阵风吹到你身边，让你感受到一种欢快和自在的气息。”

份真诚的爱心、在一段美好的假期时光里圆一个公益梦想、在最淳朴自然

的村落中探寻社会服务的真谛，或许这才是“北大-台大-云大学生社会服务计划”背后的意义所在，它不仅给大山深处的孩子们以梦想和勇气，也给两岸三地的青年们一次交流的机会，和一段关于公益梦想的无限珍贵的记忆。合



孩子们的泰雅舞蹈表演

北大考古队海外探寻先人足迹 ——肯尼亚考古侧记

文 / 丁雨



马林迪的达伽马登陆碑

如果我们想要认识自己，也许最好的方式并非苦思冥想，而是反思自己的行为，观察自己的过往。如果我们想要观察自己，也许最好的方式并不是照镜子，而是和别人一起照镜子。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自己，我们便不能只是自言自语，沟通和交流从不可少。如果让我来总结肯尼亚考古的真正动因和最终意义，无论具体到对个人的影响，还是延展到这场关乎中华文化的研究，我或许都要归结于，走出自我，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再重新回到自我，从而认识自我。我愿意相信这是六百年前郑和在印度洋流浪时内心的隐秘愿望，也是六百年后，我们奔赴肯尼亚开展一场探寻先人足迹的真实理由。

缘起

于千万人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
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
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那时也没有别的话，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张爱玲

考古队初到肯尼亚时，肯尼亚国家博物馆沿海考古部的分馆长请大家吃饭，以尽地主之谊。分馆长是伊斯兰教徒，按照伊斯兰教义，男人最多可以娶四个老婆，分馆长本人就有三个老婆，于是他在致辞中说，郑和的第一个老婆在中国，第二个老婆就在

肯尼亚的马林迪市，希望这次来到肯尼亚考古的中国同行们，都能够在肯尼亚找到第二个老婆，就像郑和一样！

肯尼亚考古之行的缘起确实和郑和下西洋中的基因故事有关，只不过这故事的主角肯定不能是郑和……早在1994年，美国女作家李露晔（Louise Levathes）出版了她为郑和撰写的传记《当中国称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书中叙述了作家自己在肯尼亚邂逅的传奇：一个黑人告诉她，自己是中国人的子孙，是数百年前在肯尼亚拉穆群岛中的帕泰岛沉没的一条中国商船遇难幸存者的后裔。1999年，纽约时报的记者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经过调查后，

在纽约时报提出一个大胆的推想：这些自称有中国血统的人，很可能是郑和部下的后裔，这神奇的血脉相连引起了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中国记者则在 21 世纪初开始了对这件事情的报道。2004 年 12 月，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郭崇立在对拉穆群岛途中，专门会见了居住在西游村的所谓“中国人”中唯一走出帕泰岛，到外面读书的女孩谢里夫（Mwamaka Sharifu）。在郑和航海 600 周年的 2005 年，这个基因故事掀起了高潮。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江苏太仓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大会，邀请了谢里夫和马林迪市长参加了大会。

而正是基于媒体和民间、政界的高度关注，2005 年夏季，国务委员陈致立指示文化部长孙家政和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要求组织学者介入相关研究。正好肯尼亚国家博物馆濒海考古部也提出希望开展合作考古发掘和研究。于是国家文物局派出了张巍、秦大树、阎亚林组成的专家组前往肯尼亚，于 2005 年 7 月 21 日到 30 日对肯尼亚沿海地区的部分古代遗址进行了考察。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齐里亚马（Herman O. Kiriama）全程陪同。专家组根据这次调查，基本确定了在肯尼亚进行考古研究的工作方向。

2006 年 10-11 月，国家文物局委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织考察团前往肯尼亚沿海地区进行了部分实地勘测工作和试探性的研究。除了再次对发掘地点是选在上加还是马林迪进行评估，还实际调研了拉穆群岛的上加（Shanga）遗址，塔那河流域的乌加纳（Ungwana）遗址和姆瓦纳（Mwana）遗址出土的中国瓷片进行研究，登记卡片，绘图和照像。另外，对曼达（Manda）遗址和帕泰（Pate）

遗址出土的部分中国瓷器进行了整理。根据这次勘测和试探性研究，专家组编定了在肯尼亚开展陆上联合考古发掘工作和合作研究肯尼亚沿海地区已发掘的古代遗址中出土中国瓷器的项目的工作计划。2007 年 4 月，贾庆林主席在出访期间代表中国政府与肯尼亚政府于 2007 年 4 月 24 日签订了中肯合作在拉穆岛开展合作考古项目的换文。经过三年的筹备工作，这一酝酿已久的肯尼亚考古行动终于得以在今年 7 月成行。是否能够和郑和有缘，轻轻问候他身后的遗物和传说呢？登上飞机的时候，我的心里画着问号。

工作，在肯尼亚

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哪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毛泽东

悄声说，刚下飞机的我对非洲极为失望，因为去肯尼亚之前老师向我们渲染说：蒙巴萨就相当于肯尼亚的上海。所以想象里的非洲就是现代文明与自然野性的结合体，内心觉得蒙巴萨不说要有上海淮海路的小资情调吧，怎么也得有点南京路的高楼气魄。然则行走于蒙巴萨国际机场，我觉得这“上海”的水平实在过于缩水，楼房低矮，街道狭窄，满大街跑着的都是丰田破车，看上去大多数车龄十年以上，而且城市大街居然坑洼不平，

而且待上两天，发现物价水平居然比国内还要高，真是岂有此理！作为一个以貌取人且囊中羞涩的男人，我登时起了思乡之心，心说还是我们伟大祖国好啊！然则考古工作并非旅游，当然没有间隙让我来挑剔工作的地方。领队秦大树老师和肯尼亚国立博物馆的沿海考古部主任 Kiriama 议定工作方案并解决相关问题之后，我们就直接进驻蒙巴萨北边的马林迪市附近的天使湾村。而马林迪市的市容市貌和天使湾村终于使我理解了老师所谓蒙巴萨相当于上海的内蕴……

这次赴肯尼亚发掘的主要目标首先是希望能够找到古代中非直接交流的物质文化证据，而另一个目标则是希望能够找到马林迪老城，因为根据文献的记载马林迪老城是一个与中国交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地点（《新唐书》《岛夷志略》《明史》《郑和航海图》等文献在论及海外诸国时，均有提及“马林迪”的



曼布鲁伊出土的中国龙泉瓷片



曼布鲁伊 A 区保存的墓柱

谐音地名)。因此我们在马林迪市及其附近的曼布鲁依村选取了四个地点进行发掘,这四个地点分别是马林迪市内的卡提布清真寺遗址区(简称卡区)、曼布鲁依柱墓区(曼A区)、曼布鲁依滨海区(曼B区)、曼布鲁依清真寺区(曼C区)。

我本来被老师分配在曼A区,但是由于我手气太好,挖着挖着,在我负责的探方里就发现了重要遗迹和重要遗物,譬如说,全工地唯一的“永乐通宝”铜钱就是被我不经意间挖到的,同时当时邻近地区的发掘区域已经发现了房屋遗迹。老师担心我经验不足,把

重要遗迹挖坏,同时也是心疼我年纪最小,怕我吃不了苦,就把我调到了当时还没有清理完表土层的卡提布清真寺区。卡提布清真寺位于马林迪市内的一个海滩度假村里,每天都可以坐专车兜风前去。通往城里的公路是我国帮助修筑的,十分平整,两旁则是热带稀树草原,稀疏落落,仿佛非洲人的头发,打开车窗,海风猎猎,景色宜人,甚合我意。度假村名字是 White Beach(白沙滩),大门上就简写为“WB”,这对于爱看大片来说的我当然不啻为一个美好的想象。度假村里绿树成荫,别

中肯合作考古项目是根据 2005 年 12 月 22 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和肯尼亚共和国国家遗产部关于在拉穆群岛开展合作考古的协议》和 2007 年 4 月 24 日两国政府签订的中肯合作在拉穆群岛开展合作考古项目的换文内容而确定的。项目内容分为两部分:在马林迪市周边地区开展考古发掘的陆上考古项目和肯尼亚出土中国古代瓷器研究。北京大学考古队肯尼亚考古发掘项目于 2010 年 8 月 2 日正式启动,并于 2012 年 7 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活动。

墅林立,发掘地距离白沙滩有五十米的距离,位于椰林的阴影之下,时不时还有海风从碧蓝的海面吹来,时不时还有穿着比基尼来度假的意大利老少美女们在眼前晃荡,我禁不住每天跟同区的师兄抱怨:这实在是太消磨社会主义革命战士的革命斗志了!要是有个冰箱就更好了!在卡提布区我运气更好,总能挖到遗物,而师兄则比较抓狂,因为总能挖到遗迹。挖到遗物和挖到遗迹的区别在于,挖到遗物登记就可以了,整理的时候才会挑选重要遗物画图,而挖到遗迹必须现场画图,因为结束发掘之后,就会将发掘地点进行保护性回填,如果不重新发掘,遗迹就很难再现了,这是提取遗址信息的必要工作。而师兄发现的遗迹还不是一般的灰坑或者墓葬,而是错综复杂的墙,而且师兄运气旺到,所到之处无墙不欢,他一连挖到了二道不同时期的珊瑚石墙墙基遗迹,和一个柱础,结合赴肯尼亚之前刚看的《枪王之王》(Triple Tap,即三枪均中同一点之意),被我戏称为“墙王之王”。这个师兄是一个新加坡人,秉承新加坡人一贯一丝不苟的精神,画遗迹图极为细致,细致到一个柱础画了三天,丝毫毕现。老师估计要是让他画那两道数十米长的墙,他可能得在肯尼亚安家了,于是当即抓住了在一旁幸灾乐祸的我,命我为师兄分忧一道墙……Oh, My Gosh!(哎,糟了!)画



北京大学、肯尼亚国立博物馆联合考古队在曼布鲁伊遗址

墙画得我整整两天没抬起头来。

好不容易完成了我的画作，曼B区人手吃紧，老师随即把我又调了过去。别了！我的白沙滩和比基尼！曼B区位于海滩向上的一层阶地上，毫无遮挡，阳光强烈，我这人对自己甚不经心，不听老师学长的建议，天天穿着短裤短袖上工，结果成功被晒蜕皮，游泳时被大家讥为脱壳乌龟。曼B区上层堆积都是各色沙子，极易塌方，而因为距海较近，堆积速度又非常快，因此古代遗迹被沙子埋得非常深，我的非洲工人们下挖到接近两米的深度，才接近挖到较早的文化层。曼B区并无特别的发现，而且我所负责的一小片儿地方并不与其它的发掘地点相连，孤零零的，曼B区只有我一个华人工作者，其它的地点都由肯尼亚学者负责。我终于在旷远的海滩感到了孤独的滋味。幸好师姐和一位技工师傅负责的曼C区离得不远，于是我便常趁休息的罅隙前去串门，曼

C区毗邻着曼布鲁依村里的清真寺，村里经常有人在附近放牛，然后午间便来做祈祷，所以来来往往的牛络绎不绝，煞是热闹。曼C区的发现也颇为有趣，本来清理后以为是挖到了从前的水井，后来肯尼亚学者来看了以后立刻说，这就是斯瓦西里文化里的厕所！然后

师姐拿出一滩绿色的物质来说，难道这就是粪便么？

Kiriama小心翼翼地取了样本，说，这很重要，

要拿去内罗毕化验！粪便的发现确实很重要，它对于分析古代人类的饮食结构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而厕所的发现，显然激起了肯尼亚学者极大的热情，在以后我们每次出去参观其它

遗址时，他们都会故作神秘地带着我们走到一个貌似水井的地方前，然后兴奋地说，看！这就是你们发现的厕所！

9月10日前后，随着曼A区回填工作的完成，本年度在肯尼亚的考古发掘工作基本结束，总体来看，确

实有很多重要的发现。在曼布鲁伊的三个小区，发现了房屋基址、冶铸作坊（可能是一个熔铸铁器的作坊）及厕所共9座，窑炉及灶7座，卫生设施2处，灰坑8个等一批古代遗迹。

如果让我来总结肯尼亚考古的真正动因和最终意义，无论具体到对个人的影响，还是延展到这场关乎中华文化的研究，我或许都要归结于，走出自我，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再重新回到自我，从而认识自我。

出土了大量当地产陶片，还发现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古代瓷器残片，有明清时期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片和龙泉窑青瓷片，最早的可达北宋时期；还出土中国明代“永乐通宝”钱币一枚，



曼布鲁伊 A 区发掘完工全景（西南—东北）

此外还有大量的玻璃珠，伊斯兰陶器，贝壳类饰品，铁器，骨器等丰富的遗物。从 9 月初开始，一部分完成田野挖掘的考古队员们就转入了室内整理，通过对出土遗迹和遗物的初步整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曼布鲁依村在早期阶段非常丰富的遗存证明此地在此地 16 世纪以前是一处人类活动频繁的居住区，是一处大型聚落遗址的中心部位。卡提布清真寺区的发现主要要归功于墙王之王的墙基，这两道墙基的重要意义在于，一道墙基及柱础与卡提布清真寺的地上遗迹大体同时，对于复原这座古老的清真寺的完整建制提供了资料。另外的一座墙基则明显早于清真寺，发现的部分环绕现存清真寺的东西北三面，南面也发现了墙基的迹象，但被现存清真寺序所迭压。推测这应该是一处面积稍大于现成卡提布清真寺的一个早期清真寺的基址，早期墙基的地层中出土了元代到明初的福建德化窑瓷器，为墙基的时代判断提供了依据。从这些发现的遗迹可以看出，在 14 世纪时这里是一个规模较大的聚落。为研究马林迪地区的历

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生活，在肯尼亚

The function of man is to live, not to exist.

——Jack London

人的真正使命是生活，而不是生存。

——杰克·伦敦

考古中真正的难事，并非工作，而是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地点，营造一群人的工作环境和基本的生活环境，营建一个积极工作的生活圈和生活模式，艰难与快乐，不如意和乐观，不适应到留恋，都被包含在“生活”这两个简简单单的字里。而融入当地现在的生活，才能够有可能理解当地从前的生活和种种选择。

说起来，其实吃饭是最不顺利的。肯尼亚当地的餐食总会放很多奇奇怪怪的调味品，其实说起来都是当年的出口香料，价值不菲，但吃起来真是颇不习惯，而且伊斯兰教是当地的主要信仰，所以想吃顿猪肉几乎没有可

能。同行的技工朱师傅刚到肯尼亚，问他要吃啥，朱师傅对待者说：“吃饼！”（河南话），非洲侍者当即露出不知所云的尴尬微笑。而经过两个月的训练之后，朱师傅再说吃饼，非洲侍者就会准确地端上朱师傅教会他做的牛肉饼，味道颇有河南之风。其实最不幸的是，开工没两天，进入了伊斯兰教的斋月，斋月就意味着，太阳出来的时候，都不能吃饭，为了尊重当地学者的宗教习惯，也是为了配合工作时间（我们的工作时间是早晨七点到下午三点，中间没有休息），我们每天只能吃到早餐和晚餐，所以我每天下工后都会饿昏在床上。也正因如此，我们的晚餐就特别丰盛健康且繁复，住所里有专门的非洲厨师为我们服务，把吃饭的一套程序搞得像模像样。平时在国内的工地就是几个菜一上，米一盛，大家一拥而上，一扫而光。这回到了肯尼亚，大厨对吃饭程序十分坚持，搞得我们一帮俗人也绅士起来，先是开胃餐，然后是主餐，餐后吃水果，吃完水果喝茶和咖啡。秦老师十分体恤我们，经常亲自去买各种各样当地特色的餐品，譬如螃蟹、大虾、尼罗红（一种大鱼，非常鲜美）、鲨鱼。由于临海，这些海鲜新鲜便宜，让南洋台湾的学长吃得十分开心。

有一天，老师跑到我的发掘地点，十分严肃地问我，丁雨，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我当时正站在两米深的地下，仰头看着老师说，不就是附近河口的那头河马跑到海里去了吗？我都听说了。

老师说，你这小子，也太 infer（猜测）了！不注意和本地人的沟通了！河马死了！

我说，啊？

老师说，叫阿巴斯（帮我发掘的

非洲工人)上来,我得跟他去买点儿河马肉……

我的嘴巴一下子就合不上了,最后知道真相的我口水掉下来……后来听说,因为河马入海进村后会把人生生撕成两块,对村民的生活安全造成了影响,村民就把环保警察叫来,把河马枪毙了,然后村民就开始疯抢河马肉和河马皮。当日晚上我们就吃上了河马肉。味道很像牛肉,比牛肉略略酥软,相当鲜美,但是大约由于村民们抢肉的地

点是沙滩,所以大厨把肉洗了三遍,依然比较馊牙,所以大家吃了一些,还剩下不少。朱师傅表示,吃肉呢,怎么能剩下这么多!太浪费了!于是,他

捧着肉盆,把剩下的肉都吃了,然后说,哎呀!我的牙都要被磨没了!

驻地距离考古工地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肯尼亚国立博物馆为我们找来了两辆车,一辆皮卡,一辆大面包车,都是丰田二手车改装的,有相当年份了。虽然我们坐日本车,但是如果有人猜测我们是日本人,我们就立刻不跟他玩儿了。譬如说,去买菜的时候,有时候商人为了招揽生意跟我们套近乎,就说“空你其哇”,只要一听这个,我们马上就换一家买西红柿。在拉穆群岛的时候,一哥们儿先说“空你其哇”,又说“啊你啊撒哟”,从而错过了他的椰子生意。刚去驻地的时候,村里的小孩儿习惯于在路边喊“ciao ciao”什么的,听说这是意大利语里

的“你好”,来度假的意大利人听到这个就会给他们糖吃,所以当地孩子见到车就条件反射般喊这个。等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小朋友见到我们的车就喊“你好”,说明我们的中国文化已经成功渗透当地。

驻地实际上是一个意大利人的别墅区,主人不在,管家便贱价出租给我们。这别墅区叫做 Angel's Bay (天使湾村),名字颇为浪漫,只是住进去一帮已婚男人,大家都惧内,

也没有人敢发生什么浪漫故事。

只有我是个小p孩儿,可是也没发现值得yy的天使般的美女。天使湾村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有一个小湾通向大海,这小海湾里有很多鱼,朱师傅就琢

磨着钓上来点儿鱼炸了吃,于是某天进城就买了个小鱼钩,晚上提着个水桶就去钓鱼,大家都前去观摩,那海湾里鱼满为患,朱师傅的速度基本上是一分钟一条,每条大约三寸长,不盈一握,钓了一晚上,弄了一桶鱼。然后就真炸了吃,可惜一帮男人不会做饭,两个师姐也不会,在烹调技术问题上也难以达成统一意见,最后吃下去的不多,剩下的鱼就又给放生了。驻地临海,晚间吃完饭,老师会带领大家先去散步,对印度洋一诉思乡之情,把每天的疲累抛进大海,然后再回去工作。临走的那天,我一个人跑到海滩边上,对着印度洋大喊大叫,海浪的声音把我的声音掩盖,月亮照着我沉默不语,像它千年以来一贯的

那样故作深沉,沙滩就像一面模糊的镜子,映出你的身影,映不出你的面目。回去,在城市里,在静谧的学校里,大概再也难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可以如此喧嚣,又可以如此安静,让所有的困难变得渺小,让所有的心事被淹没、沉淀、慢慢消失又永远铭记。那些抓住或者抓不住的历史和往事,那些我们所想要知道的故事,都藏在海洋的心里,它无时无刻不在倾诉,又无时无刻不保守着它对时间的约定和彼此的秘密。喜怒哀乐,总会在离开的时刻,突然间觉得不舍。

并未结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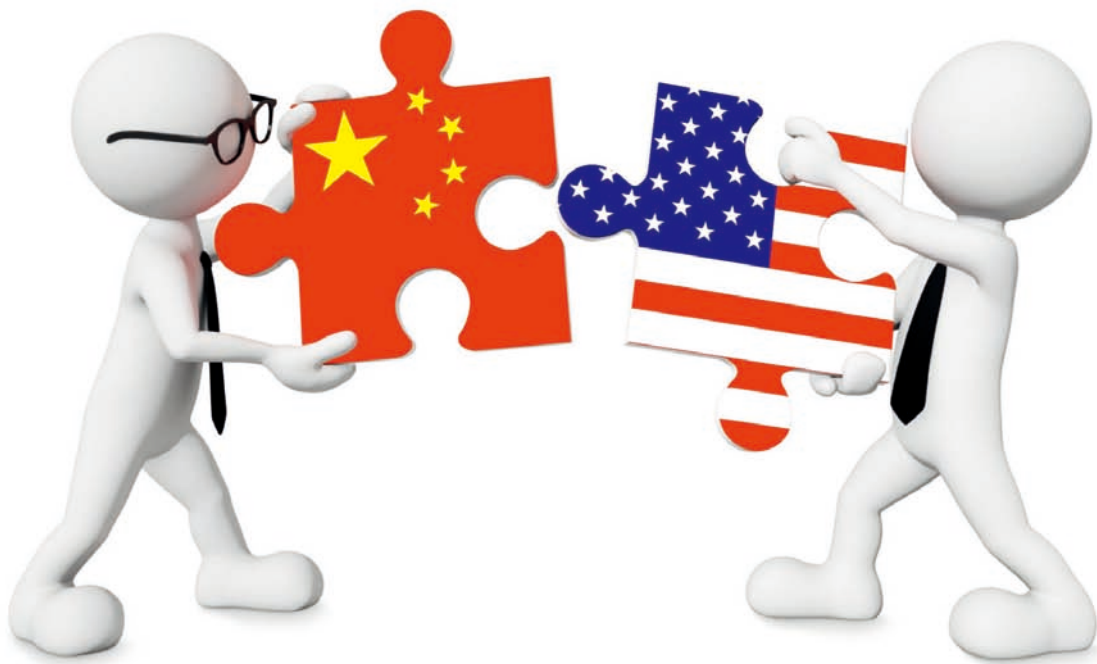
也许对于一个学习和探寻历史的人来说,历史是什么是最首要的哲学命题,也是一个难以厘清的问题。我以为它是曾经存在的真实,但那一种历史却永远消逝,无法为我们确知;我以为它是某种回忆,然则缺少证据,时时被自己怀疑;我以为它是某种书写,却将事件发生刹那时的庄重与严肃丢弃;也许它真的是一个神话——经过许多个体脑海洗练,经过分分秒秒的忘记,它变成一个被争相传颂的神话,而具有了某种仪式性的象征力量。而历史追寻的行为本身又构成了另一重的历史,肯尼亚的考古行动本身亦应被书写,亦具有仪式的里程意味。简短的记录,并不能尽述层层相套的历史,而只能留下最近的一环,而这一环或许正是梦中我们孜孜以求的想要盗回的最初的真实。肯尼亚的考古还将继续,结束的仅仅是一个精彩的开篇,而遗失的历史之卷正缓缓重新展开。合

(经作者本人授权,转自北京大学新闻网)

“道不同”，更需“相为谋”

——中美人文对话的空间与进路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论语》中有这么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道不同，不相为谋。”意思是说，立场、志趣或主张迥异的人，很难在一起共事或谋划。进一步延伸，那就是，既然“相为谋”，必定是道相同——即便现在不相同，总有一天也能走到一起的。但这只是理想的设计，正在（或曾经）“相为谋”的，很可能日后（或早就）反目成仇。谈论“志同道合”者的“对话”很容易，而我更期望的是，工作目标及评价标准很不一样、各有各的骄傲与坚持的群体，通过有效的沟通与对话，最终达成某种谅解与互信。

如此低调的陈述，是因为各国的人文学者，其思考与表达既受各自生活经验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又深深地植根于其使用的语言。不同学科的国际化，步调其实

很不一致。自然科学全世界评价标准接近，学者们都在追求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社会科学次一等，但学术趣味、理论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较容易接轨。最麻烦的是人文学科，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论述都跟自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联系，很难截然割舍。人文学科里面的文学专业，因对各自所使用的“语言”有很深的依赖性，应该是最难“接轨”的了。

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是努力倾听对方的表达、理解对方的思考，而不是一味争高低，或非说服对方不可。可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声音大，有人声音小，不存在绝对平等的对话关系。随着中国的逐渐崛起，除了政治与经济，在文化、思

想、学术、教育等领域，同样不再满足于“跑龙套”“当学徒”（参见《“不能总是在当代世界文学舞台上跑龙套”——余华谈这中国文学的译介与传播》，《中华读书报》2014年8月27日；吴晓明《中国学术如何走出“学徒状态”》，《文汇报·文汇报学人》2014年12月12日），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

可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思想、学术、教育，固然跟其经济水平及社会发展阶段有关，但不等于GDP，更多地关涉精神状态与文化自信。原哈佛大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的杜维明先生曾问我：中国的人文学者何时能在世界舞台上“轻松自如”地表演——即便不是唱主角，也不能总是跑龙套。我说十到二十年，他很高兴，说这是他听到的最乐观的回答。不少人说需要五十年，也有说一个世纪的，这让他很郁闷。我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在各个人文研究领域——包括中国问题研究，也包括人类未来的探讨，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倾听中国学者的意见。

但这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自然而然，有赖于中国政府及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这一努力，不妨就从著作、杂志以及学术合作三个层次略为陈述。

具体到中美人文著作的译介，很长时间内，中国是输入远大于输出。这里包含学界的专业评判，也有公众的阅读趣味，短期内不可能改变。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将此前政府行为的强行输出，逐步转变为资助有意愿合作的外国出版机构。只要有国外著名出版机构看中，中方出版社在输出版权的同时，可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同启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设立、委托中国编辑学会具体操作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以及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请翻译费用或出版资助。这三大计划/工程/项目都有严格的评审机制，能否公正对待每部提出申请的著作，会不会受意识形态或人情的干扰，目前很难评说。但这起码给中国学者不卑不亢地

“走出去”，铺就了一条颇为光明的新路。

之所以说“不卑不亢”，是因为当下中国大学，颇有以是否“走出去”为评价标准的。如此焦虑的心态，弄不好本末倒置，学者们会为了“走出去”而扭曲自己的学术立场。“为国际化而国际化”，那样会丧失自家阅读、思考、表达的主体性。过分强调进入人家的学术场域，若自我不够强大，很容易变得随声附和，或被人家的政治立场及问题意识所覆盖。依我浅见，当下的中国学界，不要期待政府拔苗助长，也别抱怨外国人不理睬你，更不靠情绪性的政治口号，关键是练好内功，努力提升整体的学术水平。若能沉得住气，努力耕耘，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等到出现大批既有国际视野也有本土情怀的著作，那时候，中国学术之国际化，将是水到渠成。眼下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种助力，但弄不好也会成为陷阱——很多原本不值得译介的图书或论文，因得到政府的资助而得以走出去，反而影响了中国学术的整体声誉。

作为研究中国文学、史学、哲学的中国学者，最好是学问好且精通多国语言，能用外语（主要是英语）在国际主流媒体及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如果做不到，则不妨退而求其次，做好自家学问，然后借助翻译“走出去”。对于大多数英语不够好的中国学者，这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通路。2007起，中国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德国的Springer出版公司合作，出版学术季刊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该刊遴选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及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及批评史等），全文译成英文，推荐给欧美学界。在该刊的《主编寄语》中，我是这么说的：“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锺书《谈艺录·序》），那基本是一种理想境界。理论上，做学问的人，都该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才是；可实际上，单是不同语言之间的隔阂，便多少限制了思想的沟通以及学者间的对话。这还不算那些隐藏在语言隔阂背后的文化偏见以及立场歧异。如何填平这些有形无形的鸿沟，达成跨语际的对话，‘翻译’



大概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见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Volume1, Issue1(2007)）五年间（2007—2011），该刊先后发表近 140 篇英文论文。前四年属于选文翻译，进行得比较顺利；第五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强烈要求下，逐渐改为英文原发。杂志下一步该怎么走，编委会和出版社意见不一致。我们的思路是：此乃中国学者走出去的重要窗口，应兼及国际性与本土性；若过分强调英文撰稿，必定变成汉学家或留学生的阵地。因为，即便留学归来，能直接用英文撰写专深的文学研究论文，且达到国外学术杂志发表水平的，微乎其微。而出版社的目标是尽快进入 A&HCI，这就要求编委以国外学者为主，全部英文撰稿，这样做，既省钱又好听，且容易“走向世界”。基于此理念上的差异，双方分道扬镳——第二年起，该刊改为与美国纽约大学合作。

在我看来，中国学者“走出去”的最大障碍，其实不是外语能力，而是学术水平。主编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的这几年，我阅读了大量编委推荐的优秀论文。说实话，让人拍案叫绝的好文章，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多。至于这个领域每年推出的众多学术专著（很多因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或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支持，可提供出版补贴），也都不见得精彩。以我对国外学界的了解，值得推介出去的科研成果，并非遍地都是。更何况，我们的愿望与人家的需求不一定合拍。若人家不需要，硬推出去，即便侥幸成功，也没有意义。

若着眼于自家学术水平的提升，而不是急于“走出去”，那么，与国外学者展开长期合作，或许是一个更为理想的

途径。从 2003 年起，我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合作，召开“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选择北京、西安、开封、香港等重要城市，邀请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地理、艺术、建筑等不同专业的中外学者，举行小规模的主题性研讨，并出版论文集，效果极佳。比起很多得到政府或企业鼎力支持，故冠冕堂皇、花销惊人的“高端论坛”来，这种具体而微的“国际合作”，学者间的良好沟通与相互借鉴，更容易得到落实与呈现。

在中国，“走出去”一旦上升为国家战略，必定是粮草充足、兵强马壮。于是，不断地签协议、开大会、发通稿、编列预算、出版丛书、周游列国等，很是热闹。对于这种千军万马齐上阵且“荣辱与共”的感觉，我不是很喜欢。明知这么做可先声夺人，博得更多的掌声；但作为人文学者，我更欣赏“独行侠”的工作方式。

在一个到处渲染全球化、云计算、大数据的时代，我很惬意地享受上几代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生活便利，但又越来越怀念那种个体的、可辨别的、有温度且有感情的学术交流，以及那种剑及履及的低调的学术合作与教诲——行文至此，怀念一年多前去世的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C.T.Hsia，1921—2013 年 12 月 29 日）、原哈佛大学教授韩南（Patrick Hanan，1927—2014 年 4 月 27 日），在阅读这两位先生的著作及实际交往中，我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启示。合

（本文为作者 2015 年 4 月 10 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第四届“中美文化论坛”上的演讲稿，原刊于《中华读书报》2015 年 05 月 13 日 13 版）



东国公主与蚕种西传： 一个丝绸之路上的传说

王邦维（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

丝绸之路近来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所谓丝绸之路，指的是古代起始于中国，向西延伸，连接中亚、西亚、欧洲，乃至东非的商路。这些商路，最早主要是陆路，后来也包括海路，于是又被分别称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不过，把这些商路统称为丝绸之路，其实很晚。19世纪70年代，德国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最早提出“丝绸之路”一名。这个名称一经提出，就被广泛接受。因为古代在这些商路上贸易的商品，丝绸确实占了很大一部分，把这些商路称作丝绸之路，不仅恰如其分，而且确实能突出古代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物质文化交流的一大特色。

只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这些商路，早就存在，至少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过去没有被称作丝绸之路而已。

丝就长在树上， 欧洲博学者的想象

发明养蚕和制作丝绸的技艺，是古代中国对于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丝绸在中国生产出来，源源不断地输出到其他的国家或者地区。丝绸的生产，包括几个最重要的环节，首先是养蚕，其次是缫丝，再是织成丝绸，中间还包括染色，或者加入一些特殊的工艺，例如织花、压花等等。其中，养蚕是第一步。在中国，传说中最早养蚕的是嫫祖。历史上嫫祖是不是实

有其人，仍有争议。养蚕、缫丝和纺织丝绸，作为一套完整的生产技术，前后发展，会有一个过程，很难说是某一个人的发明。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嫫祖确实是中国最早养蚕缫丝的代表人物。嫫祖是中国人，嫫祖的传说，不仅是我们对祖先的一种追思和纪念，也代表了古代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有意思的是，欧洲人最早并不知道丝绸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当欧洲人见到如此精美华丽的丝绸，又知道这是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的时候，对于丝绸的来历不禁生出一些奇异的猜想。

公元初，罗马最博学的学者普林尼（Pliny “the Elder”，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年），在

他堪称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中专门讲到过丝和丝绸。普林尼把中国称作“赛里斯”（Seres）。他说，在“赛里斯”，丝就生长在树上，人们把丝从树叶上取下，经过漂洗，再纺织成丝绸，然后再经过几万里艰辛的路途，最后才运到罗马。到了罗马，丝绸的价值倍增，成为罗马贵族们最豪华最珍贵的衣料。

很长一段时间，欧洲人都不知道，丝绸从蚕丝而来，更不知道还有养蚕缫丝一说。“赛里斯”这个词，拉丁语的意思就是“丝”。两千多年前，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就是丝之国。

丝绸路上的“文成公主”： 东国公主和蚕种西传

但在亚洲，情形则不大一样。从中国发端的丝绸之路，首先连接到周边的地区，有关养蚕和织造丝绸的知识和技术，不需要很久，就有可能传到这些地区和国家。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讲到瞿萨旦那国，其中一段，就提到一个

与蚕和蚕种相关的故事：

王城东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蓝，此国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也，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

“瞿萨旦那”是梵文 Gostana 的音译。“瞿萨旦那”的意思，玄奘解释是“地乳”。瞿萨旦那国即今天新疆的和田，古代又称于阗。瞿萨旦那的王城确切地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做考古研究的学者之间有一些争议，不同的学者指定在不同的地方。一种说法是在今和田城西约十公里处的约特干遗址，另一种说法是在今和田城北边约二十公里处的阿克苏比尔古城。僧伽蓝的意思是佛寺，麻射僧伽蓝即麻射寺。“麻射”一名，藏语文献中可以找到一个对应的词 Ma-za。

玄奘在故事里讲，瞿萨旦那国这个地方，先前不知道养蚕，听说“东国”有桑蚕，于是派了使节去求取。可是东国的君主不愿意让蚕种传出国外，为此还下达了严格的命令，禁止任何

人把蚕种带出国。瞿萨旦那王只好另想办法，他准备了礼品，用恭顺言辞，请求东国君主把公主下嫁给自己。东国君主为了笼络瞿萨旦那王，就答应了后者的请求：

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

于是瞿萨旦那王派出使节，到东国迎娶公主。瞿萨旦那王让迎亲的使节告诉公主，瞿萨旦那国没有丝绵，更没有蚕种，请公主把蚕种带来，以后才好自己制作衣裳。东国公主听了这话，悄悄地在帽子的丝絮中藏放了一些蚕卵。这样做了以后，公主出嫁的队伍就出城了：

既至关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验。遂入瞿萨旦那国，止麻射伽蓝故地。方备仪礼，奉迎入宫。以桑蚕种，留于此地。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复事采养。初至也，尚以杂叶饲之，自时厥后，桑树连阴。

队伍到了城门关，守城的官员一一检查，所有的地方都检查完了，只有公主的帽子不敢查验。于是蚕种就被带到了瞿萨旦那国，先放置在麻射僧伽蓝，然后经过一番仪式，迎请到王宫。于是瞿萨旦那国从此有了蚕种。到了春天，人们种上了桑树，桑树渐渐生长。养蚕的季节来临之时，人们又养上了蚕。只是最初时桑树不多，也用了一些其他的树叶喂养桑蚕，后来桑树多了，连成了一片树林。这个时候，公主——现在已经成为王妃——下达了命令，不准伤害桑蚕：

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杀。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明神不佑。遂为先蚕建此伽蓝。数株枯桑，云是本种之树也。故今此国有蚕不杀。



蚕种西传木板画局部——东国公主

窃有取丝者，来年辄不宜蚕。

王妃的命令，刻在石碑上，成为制度，不让任何人伤害桑蚕。只有在蚕蛾飞尽，才可以处理蚕茧。如果违反，神不保佑。王妃为这些最早的蚕种修建了一座寺庙，就是麻射僧伽蓝。最早的那几棵桑树已经枯萎。因此，在瞿萨旦那国，是不杀蚕虫的。如果有人偷着从有蛾的蚕茧取丝，来年的蚕就养不好。

斯坦因的考古发现： 千年以后的西域神话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历史上蚕种以及养殖桑蚕的技术什么时候传到西方，怎么传到西方，从来没有确切的记载。玄奘所讲，虽然只是故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蚕种西传中的某些事实。古代东西方之间的丝绸贸易，获利甚大，“东国”方面，因此不愿意养蚕、缣丝和织造丝绸的技术外传，这也可以想象。但人类历史上的事都是一样，到了最后，先进的技术总是会通过某种途径传到世界的各个地方。

记载这个故事的，不仅是玄奘的书。《新唐书·西域传》有一节专门讲于阗国，在介绍了于阗国的一般情况后，也讲到这件事：

（于阗国）初无桑蚕，丐邻国，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许之。将迎，乃告曰：“国无帛，可持蚕自为衣。”女闻，置蚕帽絮中，关守不敢验，自是始有蚕。女刻石约无杀蚕，蛾飞尽得治茧。

不过，从《新唐书》编撰的时间看，这一段话，很有可能就是根据玄奘的书改写而来。二者之间最值得注意的不同之处是，《大唐西域记》中讲的是“东国”，而《新唐书》里则



丹丹乌里克斯坦因编号为 DVI 的佛寺遗址

说是“邻国”。

这个故事，同样也记载在藏文的佛教经典中。藏文丹珠尔中有一部书，名称是《于阗国授记》（Li'i yul lung bstan pa），书中也讲了类似的故事，只是情节稍有不同。和田地区与西藏相邻，西藏的佛教，在早期阶段接受过和田佛教不小的影响。藏文佛教文献中讲到和田，保留了有关和田历史的一些资料，也是很自然的事。

不仅如此，在和田，与蚕种西传的故事相关的，还有考古的发现。

20 世纪之初，匈牙利裔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来到和田，做广泛的考古调查。斯坦因深入到和田东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当地人称作丹丹乌里克（Dandan-Uiliq）的地方，发现

一大片古代居民的遗址。斯坦因在这处遗址发掘出大量古代的物品，有佛像和神像，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来自一处佛寺的木板画。

木板画中有一幅画的正是蚕种西传的故事。画上有四位人物，三位是女子，一位看起来像男子。从左边数的第二位女子在画面上最为显著。她戴一顶很大的头冠，头冠上满缀珠宝，身份看起来非同一般。从左边数的第一位女子则左手高举，指着她左边的这位头戴宝冠、身份显贵的女子，似乎在说，这宝冠中有什么东西。她的右手下垂，手臂里还挎着好像是一只竹篮。画的最右边，也是一位女子，



蚕种西传木板画



和田出土的四臂蚕神像，手持织机的箴和梭

坐在一架织机旁，手执纺织工具，织机上布满经线。她的后边，似乎也还有其他纺织的器具。在她与头戴宝冠的女子之间，则坐着一位男子模样的人，头有光环，四只手臂。男子跏趺而坐，四只手中，一只手平置，三只手各执一件器物，看起来有些像剪刀、纺锤和锥子。

这位头戴宝冠的女子，显然就是玄奘所讲故事中的“东国公主”。手指公主宝冠的女子，应该是公主的随从或者侍女。最右边的女子，正在纺织，可以认为是织女。那位男子，头有光环，身有四臂，则是一位天神。从手执的器物看，这位天神主管或保护的，应该就是桑蚕与纺织。

这一幅画，画中人物的形象和所有的装饰，除了那位男子，都与玄奘讲到的故事配合无间。斯坦因因此很快就做出判断，认为画的内容，讲的就是东国公主与蚕种西传的故事。木板画的年代，至少在千年以上，画的发现，用实物证明，玄奘讲的，确实是当年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和田北面的一处古庙的遗址，斯坦因还发现过一幅与木板画中的那位四臂天神类似的壁画，画面上也是一位四臂的天神，手中所执的器物也有锥子和剪刀。斯坦因认为，这里画的，也是西域神话中的蚕神。

谜一般的东国公主： “东国”在哪？

这位公主，来自“东国”，“东国”究竟是哪一个国家，是中原的国家吗？玄奘没有讲得很明白。大概故事原来就是这样讲，玄奘不过是重新叙述了一遍而已。就整个中国而言，汉族人最早发明了养蚕、缫丝和纺织丝绸技术，但在汉文文献中，对于蚕种西传的过程，没有更多的记载，也没有类似的故事。

对于和田的人而言，和田以东的国家都可以是“东国”。在今天的新疆地区，和田以东，古代曾经有过大大小小的国家。这些国家，不同时期由不同的民族或族群所建立，它们都可能是“东国”。即使我们把故事坐实，也很难说“东国”究竟是哪一个国家，也许是古代的楼兰，也许是古代的吐鲁番。

不过，故事就是故事，无论如何，故事中要说明的一点很清楚，养蚕和纺织丝绸的技术从和田东方的某个国家传来，如果追溯到最后，这个国家指的一定是今天中国的中原地区。蚕种西传的故事发生在和田，也并非偶然。因为古代的和田或者说瞿萨旦那国，自古以来都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国家。东西方之间的商贸往来，无论对于哪一个方向而言，和田都是一个关键的地点。养蚕和织造丝绸的技术传到和田后，到了玄奘的时代，和田不仅“桑树连阴”，而且当地人“工纺绩绝”。 “绝”是古代的异体字，写成简体字就是“丝绸”。和田出产优质的丝绸，到今天还是如此。

但玄奘讲的故事中有一个细节，似乎需要说明一下，这个细节往往被人忽视。玄奘讲，“蚕蛾飞尽，乃得治茧”。了解养蚕缫丝过程的人都知道，如果蚕蛾从茧中飞出，蚕茧的质量就要大打折扣。出过蚕蛾的蚕茧，是不能缫丝，但难以缫出好丝。或许玄奘当时听到的故事就是如此，或许这只是和田佛教徒的一种说法，他们希望在缫丝过程中尽量保全蚕虫的生命。或许在当时的和田，人们养蚕缫丝，确实就只用出过蚕蛾的蚕茧。当然，真要这样做，也不是不可能。

无论这中间究竟是怎样的情形，在他的伟大著作《大唐西域记》里，玄奘仍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动听的传说，一个已经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传了至少一千多年的传说。合

（本文转自《文史知识》2015年第4期）



美国大学没有围墙？

秦春华（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 斯坦福大学

暑假期间，许多朋友带孩子来美国，少不了要到各个世界一流大学游历一番。一来美国大学校园风景秀丽，是放松心情的好去处；二来名校的氛围对孩子也有励志作用，至少可以为将来上大学做些准备。大凡每到一校，大家照例要找找校门，拍张照片，以示留念，但遗憾的是，这个愿望往往落空，不要说校门，连带有校名的标志都难找。闲聊时，朋友们往往感叹，美国大学真是自由开放，不但没有围墙，连个校门也没有，更不要说守在门口查验证件的保安了。想什么时候进就什么时候进，想从哪儿进就从哪儿进。不像你们北大、清华，进门还要排队，简直没有一点儿大学的气度和胸怀，仿佛就是一个衙门。就从这

一点来看，国内大学要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国外大学没有围墙，并非一个新的发现；由大学有没有围墙引申出大学是否自由开放，并进而批评中国大学的封闭与官僚，也不是一个新的观点。然而，我遍查所能见到的讨论大学围墙与大学精神的文章，都把大学没有围墙作为一个先验存在的前提，却没有一篇试图去问一问：为什么国外大学没有围墙？

围墙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现实中存在的物理意义上的空间隔断结构，用以离合、分割或保护某一区域；另一种是由前一种引申出的比喻，寓意某种产生阻隔作用的力量。比如，钱钟书先生最著名的“围城”即是对人

生的比喻。比喻的好处是形象，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但也往往容易混淆事物的本质。就大学而言，有没有围墙是一回事，是不是开放自由是另一回事。在我看来，围墙和大学精神风马牛不相及，用围墙来隐喻大学之自由开放，恐怕是某些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的牵强附会了。

为什么美国大学没有围墙？许多美国教授听到我的问题很愕然，他们压根儿就没想过这是一个问题，更没有人把围墙和自由开放的大学精神联系在一起。听完我一番罗哩罗嗦的解释，他们也觉得这个现象很有趣，并且对中国大学的围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同时也很坦率地告诉我，美国人并不认为这二者之间有什么意义重

大的相关性。

围墙的作用在于提供安全保障。换句话说，如果安全能够得到保障，围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据我观察，美国大学之所以没有围墙，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不需要，同时也是历史形成的自然结果。这和大学是否具有自由开放的精神毫无关系。在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麦卡锡时代”，大学并没有围墙，但那时的大学里充斥了监听、搜查和迫害，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自由。普林斯顿是全美极其罕见的既有栅栏又有校门的大学，但却丝毫没有因此而变得不自由。

根据地理位置的不同，美国大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类是像斯坦福这样校园面积极大的大学，占地达35平方公里。一旦进入校园，轻易别想走出来。如果把校园全部用围墙围起来的话，不要说建造成本很高，就连维护费用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对于斯坦福这样资金雄厚的大学来说，钱不是什么问题，关键是这笔支出既无必要，也没有意义。第二类是像威尔斯理女子学院这样坐落在威尔斯理小镇里的大学。大学即小镇，小镇即大学，二者融为一体。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就是小镇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样的大学，当然没有必要用围墙把自己和小镇隔离开，事实上也无法真正实现隔离。这一类大学多建于美国早期，其实是欧洲大学传统在美洲大陆的延续。欧洲历来喜欢在风景如画、静谧安详的小镇建立大学。有时候，小镇反而因为大学而在世界上享有盛誉。比如，德国最顶尖的大学哥廷根大学就坐落在哥廷根市。在这个只有12万人口的小城市里，居然有近3万人是哥廷根大学的学生，是名副其实的大学城。此外，还有一类是像哥伦

比亚大学这样坐落在大城市中心的大学。所谓校园其实就是街道两旁的一栋栋楼宇而已。这一类大学建校伊始就依托城市而存在，一方面是租用城市的建筑物作为校舍，同时分享了城市的安全、交通和市政等公共设施的便利；另一方面，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大学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与所在城市的联系极为紧密，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例如，哥伦比亚大学最负盛名的学院有商学院、新闻学院、教育学院，等等，这和它坐落在集全球经济、金融、艺术和传媒中心于一身的纽约关系极大。难怪人们说，“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在华尔街学经济，在联合国总部学政治，在百老汇看戏剧。”与此类似的还有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这所全美最顶尖的艺术院校的发展得益于芝加哥的时尚与现代，它甚至因此拒绝搬迁到市政府免费为之建设的郊区。这样的大学，当然更不会用一道围墙来把自己和城市隔开了。

和中国相比，美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口少。除了少数几个大城市外，许多地方人烟稀少。正因为平时见不到什么人，所以人和人之间很亲切，彼此友善礼让。人们总是要创造各种机会聚在一起，沟通交流，又怎么会用围墙进行自我隔离呢？美国人之所以显得热情好客，喜欢聚会聊天，都和这个因素有关系。另一方面，美国的社会和家庭安全系统相当发达。尤其在西部的多个州，不但家庭安全系统和警察局直接相连，许多人也合法拥有枪支。按照美国法律，他可以随时击毙任何企图非法闯入的入侵者，当然必须是正面射击——这属于正当防卫。因此，围墙作为安全屏障的意义并不存在。美国人也不喜欢在房屋

周围垒砌高高的围墙，至多种一圈树墙而已。这种没有围墙的文化自然也会影响到大学的建设。至于那些坐落在城市中心的大学，本身就属于城市警察管辖的范围。大学里的师生均为年满十八岁的成人，不需要额外特殊的保护——这正是虽然美国大学没有围墙，但美国中小学却都有围墙的原因——一旦出现危害校园安全的事件，警方会立即采取行动。也就是说，围墙并不能使校园变得更加安全，大学自然没有修建围墙的需要和动力。

与美国不同，中国素有砌墙的传统。早在春秋时期，即有“城郭之制”。20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大学也由学术性社区变成了事业“单位”，由此砌起了围墙。但这种文化是否一定意味着封闭、保守和官僚，是值得学术界和知识界认真思考和研究考证的问题。同样，自由开放是大学建设的应有之义，但这一点不需要由没有围墙来加以体现。20世纪90年代初，北大拆除南墙，曾经引起一时轰动，但此举除了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之外，北大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十多年之后，北大把曾经拆除的南墙又重新垒起来，也无非出于现实性的需要。南墙拆建前后，北大依然还是北大。由此看来，围墙就是围墙，也许并不需要赋予它多么重大的文化意味，即使它是大学的围墙。任何一种文化必然根植于自身传统和特点。多年来，我们隔岸看花，总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去解读美国教育，不光闹了不少笑话，恐怕对于中国教育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并不会带来多少有价值的思想和推动。合

（本文原刊于2014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

韩毓海教授解读马克思新著 同时在中美推出

纽约时间 5 月 28 日上午 9 时，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和美国奔驰教育出版集团（Benchmark Education Company）联合出版的《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Karl Marx For Young Readers）一书亮相纽约国际书展，为此书发布举办的“好故事，一起讲”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媒体和读者的参与和关注。

《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是美国出版的第一本面向青少年的有关马克思的著作，也是由中国人撰写的马克思思想传记第一次输出美国。该书作者韩毓海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马克思主义学院双聘教授，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他曾撰写的《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一书，获中宣部、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中央电视台颁发的“2014 年中国好书奖”，《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一书获得 2013 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一等奖。

